

北京文博

文丛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 2013. 第4辑 / 陈晓苏主编.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2-3499-7

I. ①北... II. ①陈... III. 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②博物馆—工作—北京市—文集 IV. 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1655号

责任编辑: 刘少辉

ISBN 978-7-5402-3499-7



北京文博文丛 (2013 *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邮箱)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 16开本 7.5印张 181千字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15.00元

北京文博



目 录

2013年第4辑（总74期）

● 文物工作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战略思考 刘保山（1）

● 博物馆学

建设高效率的博物馆理事会 宋向光（12）

论当今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的困境与机遇 黄雪寅（21）

收藏身边的历史 留存城市的记忆

——谈首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资源的调查与征集 章文永（24）

● 考古简报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30）

● 文物研究

明代服饰文献举要 谢大勇（45）

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小考 庾华（49）

● 北京史地

从雪山三期陶器看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异同 韩嘉谷（53）

北京地区唐代窑址初探 张智勇（71）

元代抱玉里文靖书院	杨亦武 (77)
明清时期通州城垣修建考	李伟敏 (89)
论正阳门禁灵柩通过之规制	李 晴 (94)

● 文物保护

国子监辟雍池桥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	姜 玲 (98)
-------------------------	----------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 君 (108)
《北京文博文丛》2013年总目录	(113)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舒小峰 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志平

王 岗 王培伍 王清林 巴爱民 卢迎红 田淑芳 白 岩 吉晓平 向德春 刘建业

刘素凯 刘超英 齐东发 祁庆国 关战修 许立华 许 伟 杨玉莲 杨曙光 李 青

李建平 李 晨 吴志友 吴梦麟 何小平 何 沛 沈其顺 宋大川 张若妮 张树伟

张 展 范 军 赵建明 郝东晨 哈 骏 侯兆年 侯 明 郝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徐 明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郭 豹 姬脉利 崔国民 葛英会 谭烈飞 薛 俭

主 编：陈晓苏 执行主编：韩建识 编辑部主任：高智伟

本册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126.co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4, 2013

Contents

● *CULTURAL RELICS WORK*

Think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Famous City and the Strategy of City Development.....by Liu Baoshan(1)

● *MUSEOLOGY*

To Establish the Museum Council with High Efficiency by Song Xiangguang(12)

On the Dilemma and Opportunity of Collection Management Work of the Museum Currently
.....by Huang Xueyin(21)

Collect the History around Us, Retain the Memory of the City——on the Survey and Solicitation of the Modern Cultural Relics Resources of the Capital Museum by Zhang Wenying(24)

●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omb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Old Village of Banbidian, Liyuan Town,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City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30)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mportant Examples of the Dress Documents of Ming Dynastyby Xie Dayong(45)

Study on the Plaque of the Imperial Decree to the Libation and Secretary for Industry and Other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in the Second Year of Yongzhengby Yu Hua(49)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Datuotou Culture and the Xiajiadian Culture from the Pottery of the Xueshan Third Stage Cultureby Han Jiagu(53)

Tentative Studies of the Kiln Site of Tang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by Zhang Zhiyong(71)

Wenjing College in Baoyuli of Yuan Dynasty by Yang Yiwu(77)
Study of the Building of City Wall of Tongzhou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Li Weimin (89)
On the Regulation of Banning Caskets from Passing through the Zhengyangmen Gate
..... by Li Qing(94)

●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Security Detection Assess and Reinforcement of Bridge on the Piyong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by Jiang Ling(98)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3rd Quarter of 2013) by Yin Jun(108)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in 2013..... (113)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Shu Xiaofeng, 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Zhiping, Wang Gang, Wang Peiwu, Wang Qinglin, Ba Aimin, Lu Yinghong, Tian Shufang, Bai Yan, Ji Xiaoping, Xiang Dechun, Liu Jianye, Liu Sukai, Liu Chaoying, Qi Dongfa, Qi Qingguo, Guan Zhanxiu, Xu Lihua, Xu Wei, Yang Yulian, Yang Shuguang, Li Qing, Li Jianping, Li Chen, Wu Zhiyou, Wu Menglin, He Xiaoping, He Pei, Shen Qishun,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Shuwei, Zhang Zhan, Fan Jun, Zhao Jianming, Hao Dongchen, Ha Jun, Hou Zhaonian, HouMing, Xi Zhiqun, Yao An, Geng Chunwei, Xu Ming,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Guo Bao, Ji Maili, Cui Guomin, Ge Yinghui, Tan Liefei, Xue Jian

Editor-in-chief: Chen Xiaosu

Executive editor: Han Jianshi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Gao Zhiwe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volum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126.com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与城市发展战略思考

刘保山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高端形态，是城市发展建设及文明的最高水平。它既包含了城市建设物质方面的成果，也包含了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其中，城市文明程度和城市文化水平在城市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古都城市的基础上建设发展的世界城市，其传统历史文化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城市、历史名城提供了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条件和特有的文化环境、人文环境。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的枢纽，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北京地区拥有不可移动文物 3840 处，已确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000 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5 处（其中含世界文化遗产 6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16 处。已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 43 片、地下文物埋藏区 56 片，共有 71 处、188 栋建筑被列入北京地区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人文北京”和“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重要资源，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展示首都形象、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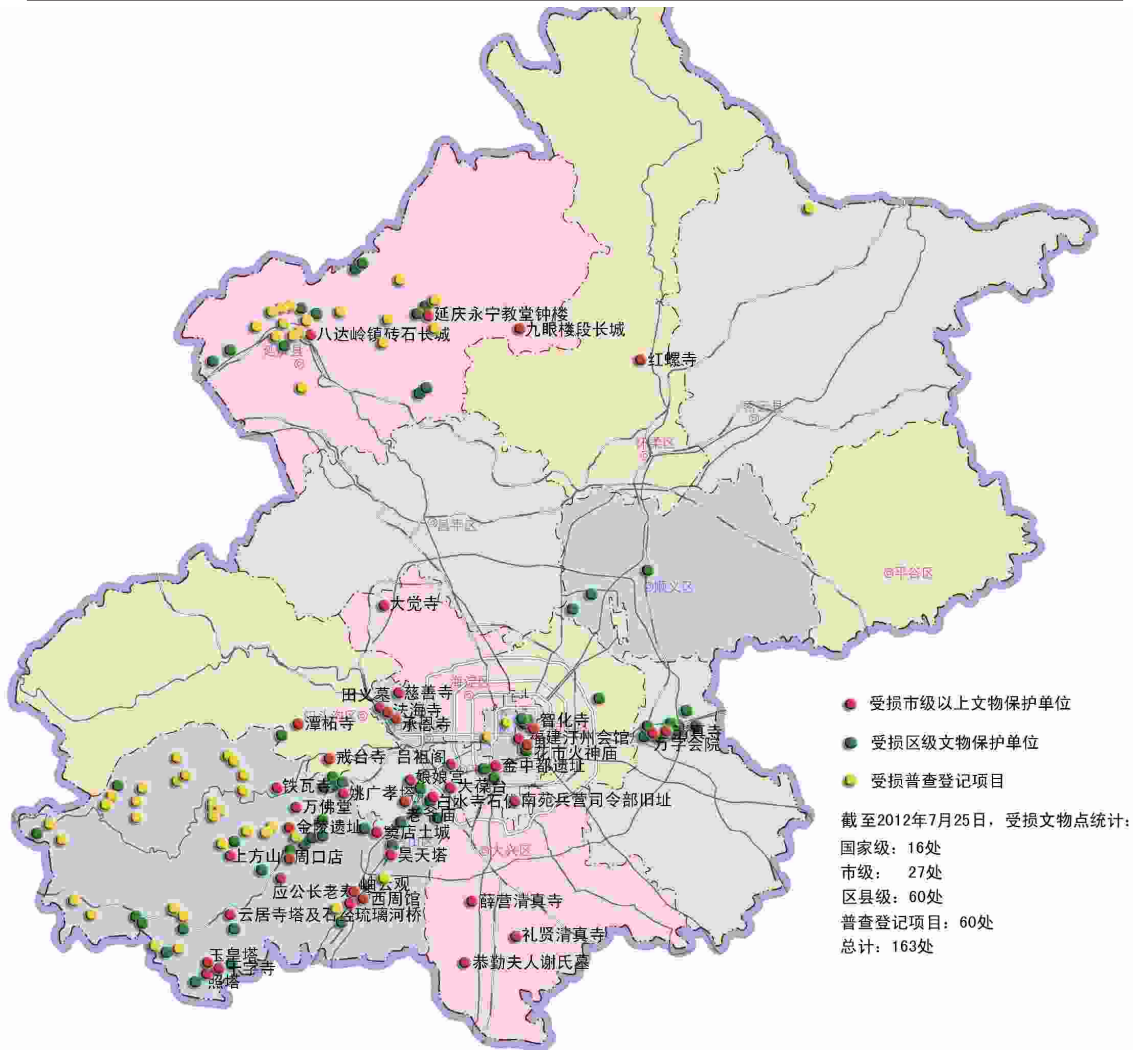
北京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建设文化中心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首都的文化中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又为我们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展望未来一段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将处于非常关键的阶段。如何落实好“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建设的伟大目标，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首都名城与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城市发展战略的实现，是一个需要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意义

（一）名城保护有利于形成科学发展的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了城市的有机、合理、适度发展。2005 年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的批复，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明确了“旧城改造”转变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策略的实施，确立了历史名城作为北京市“四个城市”定位之一。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格局的保



图一 北京市“7.21”特大暴雨受损文物分布示意图

护，旧城功能、人口的逐步疏解，故宫、天坛等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设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严格执行，都客观上合理控制了旧城功能人口、城市建设的总规模。

历史文化产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划定了43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随着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挖掘、传承和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文化创新活力充分彰显，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投入100多亿元

恢复重点历史街区风貌，逐步形成了“一街一品”的发展格局，很多历史街区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什刹海、南锣鼓巷、前门大街、琉璃厂等已经成为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

(二) 名城保护有利于构建安全宜居的城市

一是文物的安全牵动城市的安全。当前还有很多文物和四合院存在不合理占用问题，院内私搭乱建多、环境状况差，且历史建筑易燃材料多，一旦发生火灾，历史街区和平房四合院区域大型消防车难以进入，施救的难度大，危及城市安全。北

京市曾经发生了护国寺大殿、拈花寺、清华学堂等多起火灾事件，均对城市安全构成了威胁。地震、强降雨等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未能及时进行结构加固和抢险的历史建筑也不利于人员和财产安全。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中，部分年久失修的文物建筑也遭到了一定的损害(图一)。此外，文物保护工作也能够为城市避险提供更多场所，皇城根遗址公园等因空间开放、地势平坦、周边高层建筑少，已经成为城市避险场所。

二是文物易于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由于文物景区的知名度高、游客密集，文物已经成为暴力行为攻击的目标对象或者场所之一，各文物保护单位相继增加安检设施、提高防范等级。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很多破坏文物甚至危及人员安全的恶性事件，例如韩国的崇礼门，因恶意纵火被付之一炬；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鼓楼等地也曾发生伤人、跳楼事件；故宫端门因被恶意纵火险些形成重大险情，等等，这些都提醒我们今后应更加注重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文物的安全，将为城市安全做出贡献。

(三) 名城保护有利于构建和谐文明的城市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很多文博单位担负着社会建设的责任，文博单位是社会文化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场所，发挥着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重任。在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深入发掘并展示其蕴含的“厚德载物”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有利于建设文明和谐的城市，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良好氛围。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利于推动文化中心建设，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愉悦人的身心，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说，名城保护事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密不可分，文物古迹等各类文化遗产为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优质资源，旅游、文化活动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离不开文物保护利用。而文物保护利用有赖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提供发挥其教育、展示等作用的环境，并为文物保护和区域发展提供经济、政策支持。可以说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四) 名城保护有利于建设生态自然的城市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历史建筑领域，中国的传统建筑既有等级秩序严格的一面，也有与自然山水融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这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基本审美特征。古人营造城市、营造庭院中所强调的建筑与园林、山水的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场所与功能布置不同的城市功能，历史街区原有建筑的格局、肌理以及建筑、庭院、园林的组合形式，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发扬这些优秀传统思想有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园林、水系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园林、绿地、水系都是文物保护单位，其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绿地。例如以颐和园、圆明园、香山公园等为代表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观；以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日坛、月坛等为代表的皇家祭坛；以北海、景山公园等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以及明城墙遗址、元大都遗址、皇城墙遗址等多处遗址公园。今后，随着天坛内外坛墙之间的天坛医院、简易居民楼等搬迁腾退工作的推进，将会出现更多的园林绿地。

(五) 名城保护有利于建设独具特色的城市

最近，社会各界特别是建筑界关心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城市特色，也就是我们面临的如何改变“千城一面”的问题，做好历史名城、历史街区保护就是保持城市特色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物化成果，古都北京众多优秀

的文化资源，无论其物质形态还是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首都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见证，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标签。

历史沉淀和形态延续的特点决定了城市风貌特色与传统、历史相关的一面，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并在建筑外观、色彩等方面，考虑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有利于提升环境品质和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城市。因此，首都名城和文博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配合国家和北京市的重要外宣活动，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充分展示“人文北京”的独特魅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促进“世界城市”战略的实现。

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及成果

随着首都经济、文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筹备北京奥运会工作的推动下，全市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流散文物管理、考古发掘以及传统建筑的保护等各项工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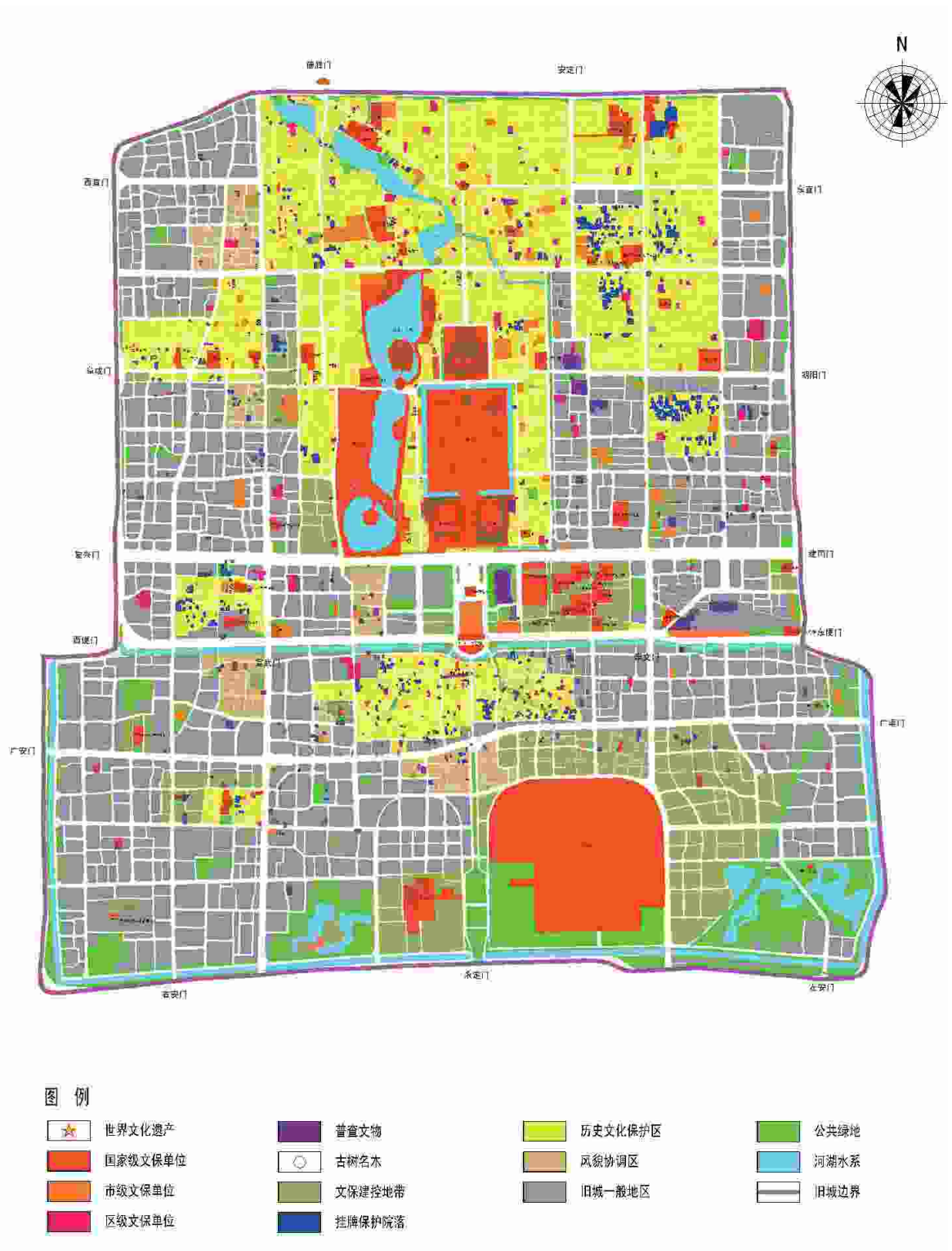
（一）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取得新突破

2005年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批复，明确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正确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了“旧城改造”转变为“整体保护”。市委、市政府组织建设、规划、文物、法制等部门，相继制定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编制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旧城路网调整规划》、《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等各类保护规

划。为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协调管理，北京市于2010年底组织成立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门机构。通过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多年的管理实践，我市初步形成了具有保护价值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四个层次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整体格局逐步形成（图二）。

（二）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取得新成绩

2000年，北京市以“申奥”为契机，三年投入3.3亿元实施了文物抢险修缮计划，对重点位于“两线、一街、一区”内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市又投入6亿元实施了“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按照“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郊六景”的保护思路，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抢险修缮。为加大“后奥运时期”文物保护力度，维护古都风貌，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建筑的社会效益，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北京市编制了《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规划（2008—2015年）》，总体设想是完善“两线”景观、展现皇城格局、维护古都风貌、保护京郊史迹、整治文物环境、实现合理利用，重点是着眼于“后奥运时期”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做到将修缮文物与完善消防等安全设施相结合，将消减文物建筑安全隐患与整治文物环境相结合，将积极保护与开放利用相结合，将风貌保护与城市发展相结合。2012年，北京市继续加大名城保护与文物修缮工作力度，设立文物修缮与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10亿元专项经费，启动了“百项文物保护修缮计划”。截至2013年底，市级财政投入文物保护修缮专项经费已超过35.3亿元，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市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的被动局面；并有效地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带动各区县和相关单位配



图二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图

套资金 60 多亿元。文物建筑搬迁腾退成果突出，搬迁不合理占用单位 880 余个，居民 14200 余户，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和安全状况明显改善（图三）。

（三）全市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取得新成就

依据“优化增量、重点投入”的原则，加大博物馆建设投资力度，新建、改扩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一批标志性博物馆，北京地区博物馆以每年 4-5 座的数量递增，建成开放首都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等博物馆，改扩建了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科技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博物馆。目前全市注册博物馆总数达到 169 座，其中对外开放 155 座，免费开放 49 座，固定展陈 200 项；每年推出各类展览 220 多项，接待观众 3500 万人次，组建了首都博物馆联盟，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

（四）流散文物市场与文物交流取得新发展

在国家 and 北京市一系列有力政策的引导下，鼓励和支持文物拍卖企业将国际通

行的拍卖手段与传统经营方式相结合，大幅提升了中国文物的地位和价值，促进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回流。北京市每年海外回流文物达万件以上，改写了中国文物长期流失海外的历史，丰富了首都地区博物馆馆藏和民间收藏。古玩艺术品行业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识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增长。北京市艺术品拍卖企业达到 121 家，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每年举办拍卖会 200 多场，拍卖额达到数百亿元。中国嘉德、北京翰海等一批文物拍卖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领军企业。文物商店 64 家，其中国营文物商店 11 家，民营 53 家。以北京古玩城、潘家园古玩市场、天雅古玩城为主体的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年交易总额逾 40 亿元。北京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和全国最大的传统工艺品交易集散地、高端文物流通中心。

（五）地下文物保护与埋藏区管理取得新成果

北京历史悠久，地下文物埋藏丰富，



图三 修复后的颐和园耕织图景区

由于其保存方式的特殊性，就更加弥足珍贵，保护责任就更加重大和紧迫。我市1993年就开始了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实践，截至2012年底已划定并公布了四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共计56处，总面积达到11266.61公顷。门头沟区的龙泉务、海淀区恩济庄、石景山区鲁谷等区域被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近年都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此外，我市通过政府储备和入市交易土地联审会议，文物与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加强协调，对相关开发建设项目提出地下文物保护要求，高速公路、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工程均发掘保护了大量的地下文物。这些地下文物埋藏区通过发掘取得的考古成果，为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建设“人文北京”都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妥善处理城市建设和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加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为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的难点和风险点

（一）旧城整体保护工作仍有待加强

在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工作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快速的开发建设，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对名城和文物保护带来的持续压力与冲击不断增大。八百多年来，历尽沧桑，北京集中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随着城市开发建设，旧城功能过于集中，北京明清旧城受到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文物、建筑、规划部门的专家学者，都在呼吁停止旧城内大规模开发。目前北京旧城内仅有三分之一的胡同（430条）完整地保留了原有格局，大部分已经拆除或改造。北京旧城62.5平方公里内的城市功能过度使用，人口过于集中，某些平房区相关市政设施落后，给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显著。另一方面，缺

少资金支持渠道，人力、物力投入不够，软件、硬件配备不足，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应进一步细化旧城的整体保护办法和具体管理措施，特别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完善保护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使北京旧城保护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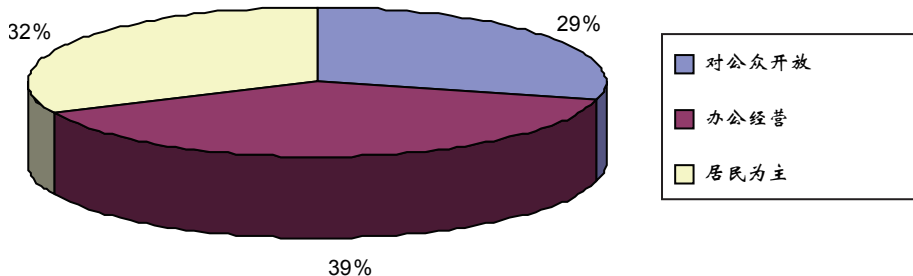
（二）古都历史风貌保护仍面临压力

城市的不断发展建设，与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环境、与文物周边建设之间的矛盾仍然很大。一是旧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世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周边、“三山五园”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区域、十三陵——八达岭等风景名胜区域仍有大量的新建建筑出现；二是旧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区部分平房四合院区域原有高层建筑严重影响历史文化景观和古都风貌，短期内尚难以移除和整治；三是城乡建设给文物保护带来的压力仍然很大，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损毁、破坏文物及其原生环境的现象频频发生，违法现象屡禁不止，2009年以来全市处理的80余起文物违法案件中，大部分涉及开发建设项目。

（三）文物单位安全隐患仍难以根除

由于历史原因，位于北京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涉及中央、军队、市、区县等管理使用单位130多个，居民不合理占用21处，涉及1880户；市级文保单位中，涉及各级管理使用单位227个，居民不合理占用的54处，涉及居民2874户，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不合理占用情况严重，不少文物保护单位被机关或居民占用，难以进行安全整修。据统计，经过多年整改、修缮，北京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仍有7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隐患严重，其中有43处文物建筑因不合理占用难以修缮；150多处消防和避雷设施不完善，其中8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增设消防水设施，6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避雷设施不完善，130处文物保护单位无防火报警系统；26处文物保护单位周边需要打通消防车通道。有

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情况统计



些院落住满了居民，拥挤不堪，私搭乱建严重，即使政府出钱修缮和加装消防设施，也难以施工。太庙后部、皇史宬南院、段祺瑞执政府等处都存在居民占用隐患严重问题，很多居民都使用煤气罐，随时都要用火用电，安全隐患极大。

（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仍存在压力

随着公园和旅游业的发展，文物景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据天坛公园统计，使用年、月票入园晨练的游人日高峰达6万之众。大量游人集中时间锻炼，公园绿地和局部景区超负荷承载情况严重，折枝、蹭古树、踏草坪、蹬踏古建等现象经常发生，造成了对天坛文物与环境“利用性”的破坏。节假日等高峰期间，尽管采取了限流措施，故宫、颐和园等各世界文化遗产地每日参观人数甚至达到10万之众，危及文物安全，也容易造成踩踏事故，而且一旦发生火灾等需要人员积极疏散的危急情况，大量聚集的游客根本无法迅速撤离，安全隐患很大。

（五）历史建筑保护机制仍有待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功能定位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旧城的办公、商业、居住等功能过于集中，人口较为密集，部分平房四合院地区市政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给旧城保护乃至整个北京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保护与改造、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改造维修和商业开发行为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改造与保护的矛盾突出。由于历史文化街

区部分房屋年久失修，使历史文化保护区进入了修缮改造的高峰时期，部分单位和居民对原有传统房屋进行翻建，建设二层甚至是高层建筑，改变了原有的院落格局。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还面临着商业化的问题，沿街房屋普遍存在破墙办商业的现象，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居住性质发生改变，商业气氛过于浓重，破坏了原来的胡同四合院传统格局和肌理。文物古建筑凡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和要求，但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大量的挂牌保护院落、四合院传统建筑、优秀近现代建筑和有价值建筑等历史建筑，至今尚缺乏明确的保护制度、审批程序和保护管理要求。

（六）地下文物保护法规仍有待完善

虽然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地下文物保护做出了规定，但是对“大型基本建设”没有界定，对考古勘探发掘具体操作程序和处罚没有明确且严格的规定。随着城市化、乡镇化建设，地下文物埋藏区之外的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前未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许多珍贵的地下文物、遗迹遭到破坏。例如2006年，德内大街的扩建设没有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在施工过程中出土大量明清瓷片，被文物贩子收购倒卖。2007年9月，北京西站南广场在地下车库改造过程中，挖掘机手发现万历皇帝舅舅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夫妇的墓葬，不停工反而晚间带人盗抢，致使玉带、金簪等珍贵文物遭到哄抢，大批文物至今无法找回。因此，随着北京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不断出现，

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制定加强地下文物保护的专项规章，已成为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四、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对策、思路

(一) 坚持整体保护，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在旧城地区做到“三不”，即在旧城地区不再安排重大建设项目、不再拆建历史街区、不再增加人口密度，实现旧城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坚持整体保护的方针，推进旧城功能和人口疏解。应该基于地域文化特色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用文脉延续的手法缝合各类已有的城市空间，使新旧城区共同组成和谐的整体，采取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策略。在城市文化的公共性、公益性日益加强的今天，应当更注意将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城市规划和社会生活，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丰富它们的综合价值。继续推进中轴线、北海、大运河等保护与申遗工作，实施文物申遗战略，推动中轴线纳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和相关申报工作，确定遗产申报名单、保护范围缓冲区。按照中轴线申遗要求，编制保护规划，继续开展中轴线保护研究，深化皇城的整体保护和旧城的传统空间格局及建筑形制的保护等整治，加强中轴线、朝阜大街等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整治工作。同时，加大重点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力度，继续保护展示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多彩的传统资源，加强重点文物建筑修缮保护。改善文物保护状况和历史文化名城环境景观，协调沿线各区县继续实施运河大环境整治，加强什刹海、北运河周边环境整治。打造首都特色运河水系景观体系，实施“三山五园”、“香山二十八景”等历史名园和文化景观保护工程，统筹规划“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文化景观区，抓好香山二十八景、颐和园须弥灵境遗址、圆明园遗址等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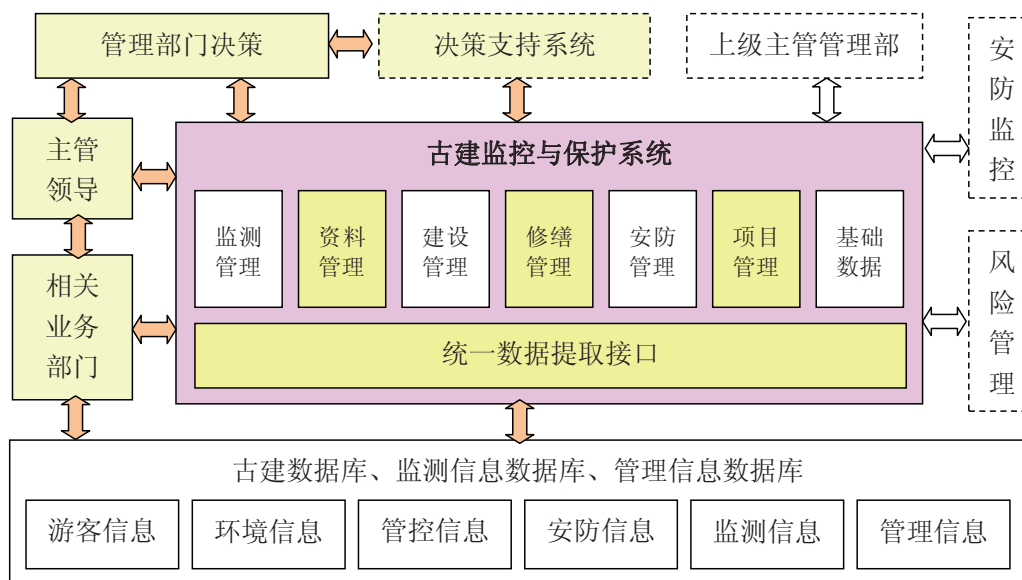
的保护修复工作，恢复古都历史文化景观，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二) 编制保护规划，改善古都风貌环境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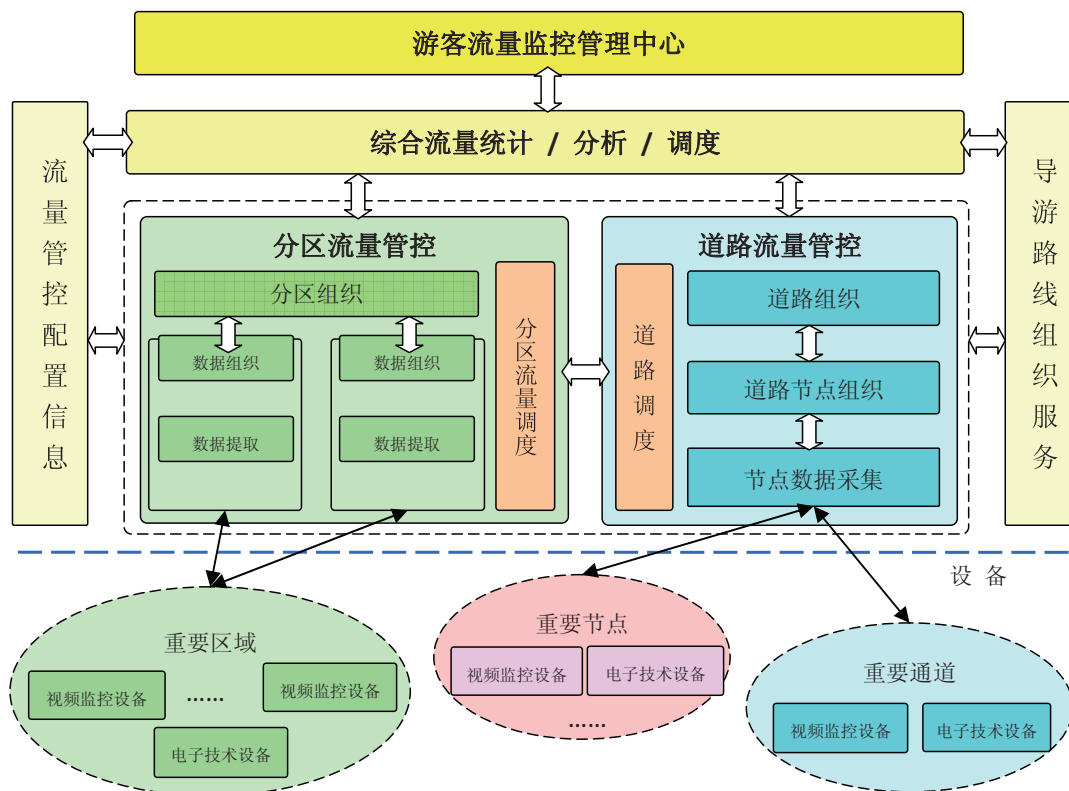
更加严格控制缓冲区内的建设，编制完善文物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要求，控制范围内的建设全部要严格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在缓冲区内兴建新建筑和构筑物，必须符合建设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体量、色调、风格都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对不符合建设控制要求的建筑逐步整治，使改造后的建筑在规模、空间尺度、建筑形式、色彩等方面与传统风貌保持一致。历史街区保护与城市设计实践中，应延续原有的建筑格局、肌理以及建筑、庭院、园林的组合形式。学习古人营造城市、营造庭院中所强调的建筑与园林、山水的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场所与功能布置不同的城市功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 加大投入力度，构建文物安全防范体系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安全是前提、是底线，容不得半点闪失，没有安全就什么都没有了，安全问题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一是落实安全责任。安全工作归根到底是靠人，靠人的责任心、使命感。即使设施再先进，也要靠人来管理和操作。核心是监管督察机制的建设，是各级领导责任制的真正落实。二是要深化科技创安。不断完善文物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安全预防水平，努力实现“人防、技防、物防、联防”的无缝隙链接；推广文物科技创安工作经验，加大科技创安投入，不断提升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三是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文物安全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文物执法专项经费投入及安全执法力度，推进信息化建设，坚决查处文物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四是下大力气解决文物不合理占用问题，逐步建立历史街区居民住户外迁



遗产监测与保护系统功能组成



游客流量监测与管理系统功能组成

机制,改善居住条件。可制定疏解分期计划,采用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偿等多种形式,增加居民外迁的吸引力,分不同区域、分轻重缓急,根据点、线、面相结合的方针稳步推进。市、区政府可设立腾退专项经费,鼓励民间投资介入,并鼓励参照历代帝王庙等成功的腾退案例,“建新腾旧”,多种方式共同推动腾退保护利用。

(四) 加强监测预警,合理开发利用文物景区

近年来,国际组织对于世界遗产监测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规范,在反应性监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强化监测机制,并频繁启动世界遗产除名程序,给相关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造成了强大的国际压力。2009年,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强化监测机制的报告》,对强化监测机制实施情况及实施以来汲取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评估,并首次根据反应性监测信息,将德国的德累斯顿河谷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应尽快在标准、资金、人员、政策等方面提供保障,对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能力建设和科技支撑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合理制定和控制游客总量,科学谋划和建设统一规划、覆盖全面、机制完善、保障有力的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既有利于全面提升保护管理水平,又有利于及时发现可能影响世界文化遗产的威胁因素,预先发出警示信息,便于保护管理机构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遗产安全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 完善政策机制,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发展

当前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受体制问题影响,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应在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的统一协调调度下,加紧出台相关措施和标准,加强统一协调部署,逐步完善历史街区保护的规划、法规、机制,形成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促进街区保

护与产业发展的融合。更多地关注相关利益者的使用,改造更新与不断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加强统一规划,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使遗产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融入社区生活、融入城市建设。针对北京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应该有具体的管理措施和标准,可以放宽对修缮标准的要求,只要保留基本格局、风貌和色彩就可以了。首先应满足居民生活功能的要求,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质量的房屋,在《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的基础上有个具体规范的可操作文件,加强监督管理机制。再者,应进一步增加投入,参考其他城市成功的经验,考虑对居民提供适当的修缮保护补助,鼓励自主修缮,规范修缮行为。

(六) 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地下文物保护管理

完善出台加强地下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土地储备和入市交易前解决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问题。这样的实施方式既有利于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也有利于保障城市建设发展的顺利进行。一是成本透明,纳入土地征地拆迁成本;二是可操作性强,土地整理储备和入市交易前有充足的考古调查、勘探时间;三是尽量规避建设单位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早在一级开发阶段完成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在二级开发阶段若发现重要地下遗址需要保护,建设项目很有可能需要另行选址,建设单位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也浪费社会资源。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二级开发单位工期延误付出的时间、经费成本远远超出考古调查勘探的经费。因此,有必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尽可能在土地一级开发阶段完成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彻底将“生地”变为“熟地”,避免文物与建设的矛盾,防范二级开发单位的风险,同时也防范施工中发现文物而出现的盗掘、哄抢事件。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干部)

建设高效率的

博

物

馆

理

事

会

● 宋向光

一、博物馆理事会

“理事会”管理体制，在国际博物馆界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或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是由经选举产生的3个或以上理（董）事组成的集体管理机构，以集体负责形式执行领导决策权力，是组织内部最高权力机构。

博物馆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是根据所在国的法律，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向其所有者分配组织收益，依法享受税收减免优惠，并可向社会开展募捐的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后期快速发展，在社会改革、社会救济、社会公益、社区建设、公众互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博物馆属于非营利组织，其出资人或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是公众个人，其直接受益者是非特定的公众。在博物馆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中，集体负责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多称为理事会，其目的是履行博物馆资产（特别是博物馆收藏）的公共信托责任，保证博物馆在实现自身目标过程中维持健康状态。

20世纪末,非营利组织发展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撰写《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对非营利组织的性质、特点、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式进行了系统论述,奠定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的基础。德鲁克指出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四大角色是决策者、公共关系维护者、资金筹集者和顾问,他认为理事会是首席执行官的重要助手^①。美国博物馆学学者博寇在《博物馆工作入门》中指出:“不论谁(市政府、州政府、民间基金会、大学)拥有博物馆,都应设立顾问委员会或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馆长对他们负责。……理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基本政策以及保障博物馆的财务状况。”^②1994年,美国博物馆学学者玛丽·玛拉若(Marie Malaro)撰写《博物馆治理:使命,伦理,规则》,指出博物馆理事会应关注博物馆核心职能,为公众提供政府、企业所不能提供的专业服务^③。加拿大盖尔·洛德、拜伦·洛德在《博物馆管理手册》中定义“理事会”是“一个受信任的主体,承诺对于博物馆的利益,如同处理其私人事务般,以努力、诚实和慎重的态度执行管理”^④。

理事会通常是由代表博物馆利益相关方的代表组成,一些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还包括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代表,理事会成员作为公众代表履行对博物馆社会公共资产的托管责任,维护公众的文化权益,保障公众利用博物馆公共资产促进社会发展意愿的实现,运用博物馆增进社会福利,提高公众的文化生活质量。为此,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必须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主动避免可能会影响社会信托责任的行为。理事会必须明确理事不是博物馆雇员,不领取博物馆的薪酬,不享受博物馆员工福利,不干预博物馆行政管理的日常性和业务性工作。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或董事会)借鉴了企业董事会的运作和内部治理经验。非营利组织和经营性企业有显著差异,企业

出资人也是企业发展的直接受益人,而非营利组织则是所有者缺位,其出资人和直接受益人不同。简言之,获利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利润可分给出资人(即股东),出资人(即股东)是直接受益人。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组织运营的收益是手段,经营收益不能在组织内(不论组织内的人是否是组织的出资人)分配,必须再投入到实现组织所承诺的社会公益目标及为实现该目标而提供的社会服务中,其经营收益的直接受益者是公众。非营利性组织的治理架构中,多数情况下理(董)事长与馆长(行政主管)由不同的人担任,理事长负责理事会运作及博物馆宏观决策、馆长负责执行理事会决策、管理馆内日常事务,且理事长不受薪,而馆长受薪。

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博物馆的理事会都是作为治理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其主要职能是对博物馆的使命、资源、运营进行监督,并承担对外沟通的责任。在多年的管理实践中,在各国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理事会管理体制,但其共同特征是普遍性的。

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870年,纽约市的一些银行家、商人、艺术家倡议建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成立之初的建馆宗旨是“鼓励和发展有关艺术的研究,并将艺术应用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增进民众的艺术知识,此外,还要提供公共教育”。2000年,大都会博物馆修订其组织宗旨为“收藏、保护、研究、陈列和激发对艺术品的理解,增进艺术品知识,这些艺术品高质量地、全方位地综合反映了人类的成就,所有一切工作都是为公众服务,都要达到最高的专业水平。”该馆主要依靠社会人士的捐助,由理事会承担对博物馆收藏和社会捐助的信托管理责任。该馆理事会由90余人组成,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3名。理事成员包括选举理事、非选举理事、退休理事和名誉理事,其中有选举权的理事只有40名。理

事成员多以商界和财界人士为主，还有律师、收藏人士等。理事每届任期5年，选举理事每年要更换1/5，理事年龄不得超过72岁。理事会下设10余个专业委员会，如提名、征集、财务、投资、法律、教育、审计等^⑥。

又如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县的米苏拉堡历史博物馆（县级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宗旨是“保持米苏拉县鲜活的历史”，博物馆的财政和人事事务由米苏拉县政府管辖，理事会负责制定博物馆政策和业务方案，批准年度预决算并提交给县议会，批准米苏拉堡历史博物馆聘用和解聘馆长等。理事会成员共5位，其中3位有投票权，2位候补理事无投票权，这些理事和候补理事均由县议会任命。理事（候补理事）任期3年，每年有1/3的理事再度被委任。理事不领取博物馆薪酬，但有合理的补偿，如参加理事会的活动产生的旅行费用等。理事会规定要定期开会，并明确规定如理事连续3次不参加理事会会议，将被理事会终止理事资格。理事长有义务提醒已连续2次缺席会议的理事。

我国学者对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也给予更多关注。刘春湘结合治理理论，指出理事会是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承担着界定组织使命、监督组织运行、制定组织战略规划等职能，对组织绩效负有最终责任^⑦。王名认为非营利组织的产权基础是基于捐赠等公益资源的“公益产权”。公益产权的财产及其运作财产的收益属于社会，其治理模式应该是利益相关方“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组织章程等制度保障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参与组织的决策和监督，由代表利益相关方的人士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必须与管理者的职责有明晰的区别，理事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组织的使命和目标，主持制定发展战略，选择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组织运营的效率^⑧。程晋武深入讨论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治理结构和理事会制度，提出非营利组织治理模式。为保证理事会切实发挥作用，

应在组织的规模、理事素质、理事构成、理事任期、议事规则、分支机构、信息披露等事宜做出制度安排^⑨。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按照社会功能将事业单位分为行政、经营和公益类，国有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等服务，应属于公益类。国有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建立是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选项。近年来，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政策、法规和评估等手段，积极审慎推动博物馆理事会治理体制的实践探索。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博物馆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设立博物馆，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中必须有“章程”草案，其章程草案中须涉及“博物馆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办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则等”。2008年3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全国博物馆评估办法（试行）》和《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该标准第7.1.1.1款“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理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能按照工作章程积极开展活动，运行机制效率高。”2010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物博发〔2010〕8号）》，明确要求公共博物馆、纪念馆要逐步实行理事会决策、馆长负责的管理运行机制。2011年6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创新博物馆管理机制。以中央地方共建

国家级博物馆和国家一级博物馆为重点，逐步构建公益目标明确、投入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健全、治理结构规范、微观运行高效的现代博物馆制度”。“推进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探索建立博物馆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

博物馆理事会管理体制在民办博物馆领域先行一步。2004年后，民办博物馆成立的审批注册单位为民政部门。根据1998年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2005年民政部制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章程示范文本》，其中第十条至十八条即是针对理事会制度。2005年后，民办博物馆在行政部门登记时，必须设立决策机构的理事会。2012年11月5日，国家文物局印发了《民办博物馆章程示范文本（文物博函〔2012〕2051号）》，该示范文本第三章“法人治理”中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理事会是本博物馆的决策机构”。

二、理事会职能和任务

理事会职能包括对内治理、对外沟通两个方面，对内治理主要包括决定组织愿景，确定宗旨，制定政策，规划战略，遴选、任免、监督、评估理事和高级管理层，审核工作和财政预结算报告，协调和仲裁组织内部的冲突；对外沟通包括筹款，发展合作伙伴，提升组织公共形象，维护与外部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机构）及公众的良好关系。理事会实施从内到外的治理，确保博物馆发展不出现大的偏差，达到防范重大风险的结果。

理事会主要发挥博物馆治理作用。治理目标是确保博物馆及其资源管理具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理事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治理作用，不能只是由理事会中的个别人决定重大事项。理事会的职责主要包括：

- 确保博物馆具有使命、发展战略及长期目标。
- 代表博物馆利益相关方监督馆长（或

行政主管人员）及高层管理者的工作。

- 确保建立完善的制度和规则体系，使博物馆确保组织公信力和运行的透明度，特别是财务方面。

- 确保博物馆合法运行，不违反任何国家法律，根据博物馆章程、宗旨和规章制度开展工作。

- 确保博物馆制定所有相关政策，并且不断修订。

- 确保博物馆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仅用于根据博物馆章程规定开展的工作，确保博物馆运营的足够资源。

- 确保理事会工作顺利，理事会会议高效进行，且所有成员全力参与。

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

- 修改博物馆章程。
- 审议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 审议博物馆收藏、展览、科研、教育的方针政策。

- 听取博物馆馆长（或行政主管）对规划执行情况的汇报。

- 遴选和任命博物馆行政主管并定期评估其绩效。

- 审议博物馆业务部门设置方案。

- 确保博物馆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开展博物馆各项业务。

- 为博物馆发展提供专业知识、智慧和支持。

- 增加博物馆开办资金的方案。

- 审议博物馆年度财务预算、决算。

- 审议藏品征集相关事宜。

- 审议处置藏品的方案。

- 代表博物馆开展公关活动。

- 听取并评估博物馆年度运行报告及其他重大事项报告，保证博物馆运行的透明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和资源使用。

- 帮助博物馆行政管理团队处置影响博物馆发展的重大问题。

- 制定理事会治理方案，制定理事会工作制度。

- 决定本博物馆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三、理事会组织

理事会的组成应有利于博物馆的发展,有利于理事会的科学决策,有利于理事会与行政管理团队的协调合作。

理事会规模大小,应根据博物馆的规模、资源、社区关系、利益相关方等条件适当考虑。从管理角度,为保证决策的科学,加强理事会自身治理,一般规模博物馆的理事会在4人到12人之间,特大型博物馆理事会规模可适当扩大。从科学决策考虑,少于4人易产生独断现象,人数过多则可能出现共谋集团或派系,影响理事会决策的公正性和工作效率。理事会成员的总数一般为单数,以方便理事会投票表决。

理事的遴选应该从博物馆相关利益方、有助于博物馆发展的专业群体和热心社会公益的人们中选择,如博物馆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或举办单位推选的代表、社会贤达、相关专业领域专家学者、企业家、教育人士、特定社群代表等,如果工作需要,也可以从本博物馆专业人员、职工代表中遴选理事。博物馆理事的身份应该多元化,反映和代表博物馆所在社区、服务对象和从业人员的特点,如博物馆当地社区成员、博物馆藏品原属地社区成员、少数民族成员代表等。博物馆理事的专业素质、智力、社会条件、专业技能应有利于博物馆发展,如法律、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文化、新闻媒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当选理事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为作为博物馆理事会成员做出的决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当选理事应具有利他主义和社会公益精神,愿意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奉献,愿意为维护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此外,他应有兴趣、有能力和时间承担理事工作。

博物馆首届理事会的成立,由博物馆举办者、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协商决定理事会名额,产生理事人选。此后,根据博物馆章程或博物馆

理事会章程,每届理事会都要强制性更换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量的理事。新理事人选一般由理事长或提名委员会提名,经理事会全体会议根据议事规则批准。新理事人选应考虑他在理事会中的角色和作用,考虑他的专业背景和个人才干,要有助于为理事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可以弥补不足、强化优势。

理事应忠诚于博物馆,必须对博物馆的使命做出承诺,关心博物馆的发展,为实现博物馆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理事应切实了解博物馆的优势和不足,了解博物馆发展目标、任务和策略,了解博物馆业务流程,从战略全局的角度判断博物馆的运营和发展状况,运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资源,使博物馆更健康地发展。理事应遵守博物馆职业道德,切实履行理事职责义务,维护博物馆社会形象。理事应恪守职责,每年理事会会议出席率不得低于75%。理事要自觉主动避免可能对博物馆社会公益属性造成损害的行为,如不得利用博物馆名义为个人谋利,不得利用博物馆建设发展机会为个人或相关企业谋利,不得利用与博物馆的关系为个人收藏谋求好处,不得私下或优先购藏博物馆注销处置的藏品。理事不应将博物馆的机密信息透露给理事会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机密信息指博物馆理事会会前准备的材料、会议讨论内容、任何涉及博物馆改建维修及藏品征集或捐赠、其他博物馆未经公开的重要信息。理事会成员个人不应公开批评本理事会其他成员或本博物馆工作人员。

理事应履行职责至本届理事会任期满。理事因身体状况、利益冲突、异地就职、迁居他地、所属单位提请更换等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经理事会投票后予以同意。如在担任理事期间不能履行理事职责与义务的,如多次不参加理事会会议、因个人原因造成博物馆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或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触犯法律受到法律处罚的,不再适宜担任博物馆理事的,经理事会多数(或绝对多数)理事

投票通过予以免职。

理事会有确定任期，一般一届理事会任期为3-5年。理事可以连选连任，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届，且连续任期不得超过10年。也就是说，每届理事会要更新1/2或1/3的理事。

理事会设理事长1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秘书（或秘书长）1名。首任理事长由博物馆举办者与首届博物馆理事会协商提名，经理事会投票表决通过。此后的理事长由前任理事长与利益相关方、博物馆业务主管单位协商，提出建议人选，经理事会投票通过。副理事长由理事长提名，经理事会投票通过。秘书（或秘书长）人选由理事长提名，理事会审议通过。

理事长主要负责理事会的组成和发展，管理理事会日常工作，引导理事会完成其职责，领导理事会支持博物馆实现其各项目标。确保理事获得有关博物馆运行和发展的适宜信息，规划和组织理事会会议，与理事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激励并要求理事对理事会负相应责任。确保理事积极参加理事会活动，并就博物馆发展关键问题提出中肯、专业的建议。确保理事会顺畅运作，持续增进理事会工作业绩。与博物馆馆长沟通，支持馆长的工作，就博物馆主要管理决策进行协商，并对博物馆馆长工作状况进行监督。

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完成理事会赋予的具体职责，在理事长缺席时代助理事长职能。

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若干常设委员会，如财务审计、藏品征集、公共关系、法律咨询、社会筹款、理事提名遴选等，为理事会提供专业咨询，完成理事会委托的事务。常设委员会成员并不限于理事，可以吸收社会专业人员、志愿者参加，这既为社会人士参与博物馆发展提供途径，也有利于为博物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每位理事只可参加一个常设委员会，不得同时参加两个委员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必须是

重要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并有投票权。

四、理事会运作

理事会发挥其职责的主要方式是理事会会议。考虑到理事多为社会人士，有各自的专业事务，且理事工作是社会公益性的，不可能占用理事过多的时间。博物馆理事会会议要精心准备，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最大的效率。每年召开博物馆理事会会议的次数，通常要考虑到博物馆的规模及需要理事会决策事项的数量，至少每年要召开两次理事会。会期可参考博物馆财务年度的起始时间进行安排。

理事长或秘书负责理事会筹备工作，与理事长、副理事长、博物馆行政主管协商，确定理事会要决策、审议、讨论的主要事项，确定会议日程，安排会场和相关活动场地，安排理事交通食宿，准备会议议程、背景资料和有关文件。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应在会议前10天，将会议议程、时间、地点等信息通知所有理事，将议程背景资料送给所有理事。理事会的主要议程包括（但不限于）：

- 博物馆的宗旨、使命、目标。
- 博物馆章程修订。
- 博物馆战略发展规划。
- 博物馆财务预算、决算。
- 博物馆财务状况。
- 超出预算的大额支出。
- 博物馆组织机构变动。
- 博物馆重要高管人事变动。
- 博物馆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 博物馆职业道德规范修订。
- 理事会治理事项。
-

每次会议出席理事不得少于半数（或法定人数），以保证议事充分，所做决策有效。根据理事会讨论议题，理事会会议可以邀请博物馆相关专业人员列席，并提供专业咨询。理事如有事不能出席理事会会议，应事前告知理事长，并书面委托其

他理事代为行使理事会的投票权，委托书必须明确说明授权事项及范围。

为应对突发事件，理事会可以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紧急会议需有至少2名（或法定人数）理事提议，理事长认可，即可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

理事长主持理事会会议。理事长应尊重每位理事，激励每位理事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理事长要控制好会议节奏，掌握会议进程，先讨论需要理事会决策的事项。理事长要把握会议氛围，鼓励理事根据各自专业发表意见，鼓励不同见解的沟通，避免争论。理事会会议不是辩论的场所，而是达成广泛一致的机会。理事在发言时要集中到主要问题上，简明扼要地说明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意见应该是建设性的，不应是破坏性的和恶意的。理事要相互尊重，认真倾听，考虑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沟通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理事会开会时间以3到3个半小时为宜。

理事会会议应制定议事规则，“议事规则”应明确会议主要议题范围，规定与会者应积极参与，发言应简明扼要，应尊重所有与会人员。“议事规则”要规定会议议题的表决方式。理事会表决通常遵循简单多数原则，即与会有投票权理事人数的过半数，包括出席理事和依照章程规定书面委托投票的理事。对一些重大事项，如博物馆合并、终止等事宜，可规定须绝对多数通过。一般来说，对需要达成决议的事项，理事长可以在多数理事表态同意的情况下，不需票决即可宣布通过，以加快会议进程。如理事意见相左，或一些理事强烈要求保留意见，理事长可采取投票表决方式。对于重大事项的决议，或应一些理事的要求，应当场制作会议纪要，并由出席会议的理事审阅、签名。理事长的投票有重要意义，当理事“赞同”、“反对”票数相同时，理事长的投票具有决定作用。为避免表决发生对立，理事长应事先就重大议题与有关理事沟通，避免在理事会上出现僵持局面，影响理事会工作效率。理

事会会议议事情况应详细记录，由理事会秘书负责，或安排专人负责。负责记录的人员应在会后及时整理理事会会议纪要，纪要稿经理事长审阅后，及时发送各位理事。理事会会议纪要可根据理事会章程，或发布在博物馆公开刊物上，或公布于博物馆网站中。也可留存备查，如公众提出查阅要求，应提供查阅。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本博物馆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理事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可免除责任。

理事会确定博物馆馆长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任职目标，以及应具备的学识、任职经验和才干，明确规定馆长与理事会、管理部门及博物馆员工的关系。理事会聘用（或任命）馆长，授权馆长管理博物馆行政、业务等日常性事务，负责组建博物馆专业队伍，管理博物馆员工。馆长应出席（或列席）理事会会议，根据理事会章程可以有（或没有）投票权。理事会坚定支持馆长按照理事会批准的政策和计划有效地开展工作，并对馆长的管理绩效进行评估。

馆长需对理事会负责，尊重并高效执行理事会的决策，为理事会决策提供正确的信息和政策建议。理事会和馆长应相互尊重对方的职责范围，并相互支持。馆长应定期向理事长汇报工作，定期在理事会会议上报告理事会决策执行情况，博物馆业务和发展情况，博物馆的重大财务支出和效益，当前经费、预算情况和存在问题等。馆长确保博物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博物馆章程开展工作。应及时了解相关专业人员情况及法律、技术、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并对这些情况进行战略评估。馆长规划、监控、评估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制定所有必要政策、制度和业务规范，对博物馆机构部门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建高效稳定的员工队伍，加强对员工从业能力的教育培训。馆长要代表博物馆与社会各界交往，及时就博物馆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与媒体和公众代表进行沟通，保证博

物馆运行的透明度。

理事会与博物馆员工关系。理事会负责制定博物馆的人事政策，确保博物馆藏品管理、展示、教育等功能的发挥。馆长负责按照理事会批准的政策招聘所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并对其进行培训、激励和评估。理事长、理事不应越过馆长直接干涉员工的业务活动，不应以理事身份干预博物馆日常工作，不应干涉行政管理人员对员工的管理。理事会成员从事志愿者服务时，其身份是志愿者，而不是作为理事会成员。

五、理事会自我治理

理事会要加强自我治理，提高理事会的工作效率，维护理事会的公信力。理事会应制定《理事会章程》及《章程细则》。《理事会章程》是关于理事会基本结构、工作原则的基本文件，也是理事会自我治理的重要依据，应就下列各项做出原则规定：

- 理事会规模及职责。
- 理事资格及责任。
- 每年度召开理事会会议的次数及时间。
- 通过决议的方式及法定人数。
- 修改理事会章程的程序。
- 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的条件及程序。
- 理事被解职的理由及程序。

- 理事递补的方法。
- 理事福利及是否应有薪酬。
- 利益冲突政策。
- 专门委员会设置。
- 理事会治理。

根据《理事会章程》的原则规定，可就上述条款制定具体执行细则。

为帮助新任理事尽快熟悉博物馆情况，尽快承担理事职责，理事会应编制《理事会工作手册》并提供给每位新任理事。《理事会工作手册》主要包括：

- 博物馆的宗旨、使命和任务。
- 博物馆背景资料及历史沿革。
- 与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法规、博物馆章程（或其他授权文件）。
- 理事会组织结构和议事程序。
- 理事职责说明。
- 理事会会议时间表。
- 理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结构和职权范围。
- 理事会章程细则。
- 博物馆职业道德。
- 博物馆组织机构图。
- 博物馆财务简报：每年的财政预算、财务报表和最新审计。
- 博物馆战略发展规划及正在执行的项目。
- 理事会成员简介及联系方式。
- 过去一年的理事会会议纪要。

理事履职自我评价表

作为博物馆理事，我是否（在横线上填“是”或“否”）：

1. ____ 参加理事会组织的培训？
2. ____ 在参加理事会会议之前阅读理事会提供的材料？
3. ____ 参加全部的理事会会议？
4. ____ 积极参加理事会的讨论？
5. ____ 要求博物馆提供所需的信息和财务数据，以确保自己全面了解情况？
6. ____ 当感到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声誉时，要求将自己投反对票的情况写进会议纪要？
7. ____ 在理事会决议被公开之前严格保密？

8. _____ 不介入员工之间的摩擦冲突?
9. _____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支持或推动博物馆的筹款活动, 并且本人量力而行给博物馆捐款?
10. _____ 支持理事会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尽管本人并不同意这一决议)?
11. _____ 了解理事会职责, 对理事会和博物馆行为的合法性保持警觉?
12. _____ 不参与任何可能导致或被理解为有利益冲突的活动?

- 最新的博物馆年度报告。
- 业务主管机构、注册机关要求的年审报告或其他报告。

理事会应安排对新任理事进行理事会情况介绍, 安排新理事与其他理事的联谊活动, 使新理事与其他理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了解各自的专业背景和专长, 尽快融入理事会, 尽快适应和履行理事的职责。理事会应安排新理事与博物馆馆长及主要业务部门高管见面, 参访博物馆主要业务区域, 了解博物馆运行状况, 熟悉博物馆业务流程和工作方法。可安排新理事参加博物馆的社会活动, 如展览开幕式、新闻发布会、社交联谊活动等, 让新理事与博物馆利益相关方代表沟通, 与公众接触, 了解社会对博物馆发展的期望和评价, 掌握社会对博物馆的资助情况。这些活动有助于新理事尽快熟悉情况, 更称职地履行理事职责。

大型博物馆的理事会可成立监事会, 监事在举办者(包括出资者)、本博物馆职工或有关单位(主要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推荐的人员中产生或更换。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博物馆全体职工推举产生。理事、馆长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小型博物馆的理事会可设立治理主管。监事会(或治理主管)负责审议理事会、委员会、理事长及每位理事的绩效, 考察理事会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并对违规违纪的理事提出处理建议。理事长可任命工作组, 或由监事会对理事会运作状况进行全面检查, 主要对理事会组成情况、理事会承担事务、理事会运行风格、理事会关注焦点

等事项进行评估。理事长还可请理事对理事会效率和理事会职责完成状况进行评分, 以评估理事会效率和运行状况。理事可通过自我评估, 参考“理事履职自我评价表”(见上表), 改善自己的理事履责状况。

应及时修订理事会章程中不再适应或阻碍理事会工作的条款。进行修改前, 应将理事会章程修订建议文本发给每位理事会成员。修改条款需经理事会会议审议, 且经全体理事的2/3(绝对多数)以上通过, 方可生效。

①彼得·德鲁克著, 吴振阳译:《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9月。

② G. Ellis Burcaw,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third edition). AltaMira Press, 1997. 张云等译, 李奉栖审校:《新博物馆学手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③ Marie Malaro, *Museum Governance: mission, ethics, policy*. Smithsonian, 1994.

④(加)盖尔·洛德、拜伦·洛德:《博物馆管理手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年10月。

⑤段勇:《当代美国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

⑥刘春湘:《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7年。

⑦王名编著:《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⑧程昔武:《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论当今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的困境与机遇

黄雪寅

面对人类文化遗产，作为博物馆工作者，我们必须问自己：在当今博物馆事业中，博物馆人究竟是什么角色？我们如何作为才能对得起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在职业道德的培养与坚守中又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从长远来看，是否有完整的藏品登记和能否妥善地保管是衡量一个博物馆管理水平最基本的标准。如何保管好藏品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教育功能，是博物馆职责所在。保护藏品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利用藏品是为当代人服务的职责。时代在发展，博物馆事业前进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如何在工作中求思变、促发展，是对博物馆管理者的考验。

一、我们是藏品本体的守护者

博物馆藏品的归属权是全人类，而博物馆工作者是它的守护者。藏品征集、保管和技术保护部的首要职责是保存好这些不可再生的遗产。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博物馆对待藏品的态度只有一个：任何违背藏品保护的行为，都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

1. 建筑与藏品管理的关系：博物馆建设时应该把藏品的保存和保护作为这座建筑设计的出发点，而不是以建设者的主观意愿决定。专业的博物馆团队加入设计讨论，符合国家有关博物馆建筑的规定所产生的专业意见，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从建筑之始，这座博物馆在藏品保管、保护和展览开放等许

多方面都已经先天不足，这座博物馆的实用功能和寿命将会大打折扣。目前有些地区的博物馆建筑存在着先天的功能不足或缺失，有的使用者在建设的全过程中处于失语状态，甚至有一些交钥匙工程现象。如有的库房和展厅之间没有封闭式通道和电梯，从库房到展厅之间全靠工作人员人工运输；还有的博物馆技术保护的药品存放点和文物库房相近，如果出现药品事故首先受到危害的就是文物。如此等等，我们所担心的是藏品如何更安全。

2. 文物征集与藏品管理的关系：在博物馆，与文物接触的首要岗位是文物征集，它是博物馆藏品不断增加的源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不仅仅要懂得文物鉴定，更重要的是要坚定自己的职守。随着文物市场的不断活跃，我们这个原本在象牙塔里的群体，与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博物馆需要收藏家这个群体输送文物给我们，另一方面收藏家也需要博物馆专家为他们的收藏“掌眼”，社会需要博物馆人专业的话语。“社会收藏热”对于保护人类文物遗产是必要的导向，文物市场也需要真正懂行的专家为收藏界服务；但同时，对于博物馆而言，要规范文物征集的各项流程，严格职业规范和制度约束，加强文物征集工作的力度，使真正好的文物进入博物馆成为永久的收藏品。

3. 库房与藏品管理的关系：藏品长期的存放地点是在专门的文物库房内，博物馆应有最具专业水平条件的库房，但也有些博物馆并不具备条件。不同质地的文

物共处一室，不同藏品所需温湿度保存条件不能够同时满足，使得不应受损的文物受损。按质地分类存放是博物馆藏品保管的必要条件，按不同藏品的温湿度需求保存不同的文物，是科学保管的首要条件。同时，不同的藏品应有不同的柜架装置，如瓷器和书画的保存条件和置放方法应不同，纺织物的柜架也绝不同于其他类别的文物，挂毯类、油画类和乐器类的存放方法也各有不同。博物馆库房的柜架不仅在用材上要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在柜架的形式上也要根据文物量体裁衣。除了柜架与文物直接相关外，库房内的所有设置都要符合所存放文物的特性，如消防器材的安装，不同质地的文物需要不同的灭火方式，如书画库房就绝不可以用喷淋灭火。库房内所有与文物直接接触的如囊匣和文物的包装箱、包装用材，一定要选择和使用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材料，确保一切与文物直接接触的材料不会对文物有损害。甚至包括文物吊装时的吊带，都需用无酸纸包裹起来后才能接触文物。现在一些囊匣制作开始采用非传统方法和材料，用一些压缩板代替棉花作为内囊材料，贴近文物的丝绸或棉布也换成了化纤材料。这些材料直接接触文物，其伤害非常大。如果这些囊匣没有很好地晾干，在投入使用后返潮变质，更会直接对文物造成损害。

4. 保管员、文物修复保养人员与藏品管理的关系：假如博物馆的建筑、库房等与文物相关的硬件条件与藏品的保护有着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与藏品保护关系最密切的应是人。在博物馆职业中，选择与文物接触的人员是非常严格的，除职业道德等基本条件外，其对文物工作的热爱与本人的性格等因素，都会涉及文物安全。一个性情不稳定，或抑郁或动辄暴躁的人，是绝不能安排在文物库房工作的。加强对博物馆保管保护从业人员的关怀和教育，是管理者必须做的功课。一方面尽可能关怀同志，避免人际关系的暗流。另一方面，工作岗位最大的尺子是制度管理，而不是

问题出了才去制定方案。应围绕着藏品安全去开展其他相关工作，而不是考虑个人得失，这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反复强调的从业原则。

二、我们是藏品内涵的挖掘者

藏品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基础，如何让观众知道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要深入研究的。只在说明牌上标出它的身份和年代，并不能体现出一个博物馆对藏品的研究能力。换言之，文物征集、保管和保护人员是直接有机会长期与藏品对话的群体，这些业务人员是藏品内涵的发现者和研究者。因为他们的解读，才产生出文物的基本信息、卡片和档案。展出信息的来源也在于此。这也是博物馆研究专家大量出自征集、保管和保护部门的原因。文物内涵的发掘，要有长时间的知识积累。要吃透每一件文物的信息和内涵，需要与文物长期对话。同时，也需要有驾驭史料和其他知识的能力。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在研究一个项目或做好一个展览的时候，通常会由专业研究人员就每一件藏品做一份完整的学术档案，包括藏品所有的基础信息，并收集全球关于这件藏品的所有发表资料，穷其所有汇聚一体，形成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所有史料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当下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访问学者时，就得到了这样国际化的学术方法训练。由此产生出来的自创展览，一定会有学术高度和研究价值。博物馆的研究力量源于此，博物馆的专业化展览也源于此。

三、我们是藏品信息的传播者

无论是征集、保管还是文物保护工作，无一例外要为博物馆的展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件文物的完整信息，包括的不仅仅是它的基本要素，也包括征集过程中所获得的流传经过等文物背后的故事，同时

在修复保养过程中对它的质地、制作工艺以及清理过程中有些深层次的历史信息的发现，为文物鉴定和判定它的身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同时，一个好的展览并延伸出来好的讲解和宣传，都有赖于掌握这些资源的藏品部门为其提供准确的资料，并使其基础信息数字化，开展网络化服务，这些都有赖于藏品基础工作，做得越早越完备，这个馆的研究力量能够越早提升。反之，会拖全馆研究和展览的后腿，致使一个馆的人才成长放慢速度。在目前全国博物馆事业大发展的形势下，各个馆都在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这是一项博物馆事业的大工程，借此机会盘点家底、锻炼队伍、增强专业力量的水平，对于提升一个博物馆在业内的专业地位，对于本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对于社会教育都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文物不会说话，但我们有责任宣传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魅力。博物馆的展览和社会教育以及网络时代所必须具备的数字化功能，都要求从事藏品管理的人员更新思想，放下包袱，在保证藏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文物自身的作用，使文物在流动中得到合理使用。一座博物馆不同于银行金库，藏品的利用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责任，让民众因为读懂它们而更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必须完成的任务。传播什么？如何传播？如何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大前提下利用文物，是博物馆的老话题。当我们花力气把它们研究透的时候，既成就了自身，也成就了一个博物馆教育社会的职能。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让我们陷入困境，值得反思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当下博物馆事业飞速发展，全国的博物馆展览异常活跃，有的国内展览时间长达半年或者更久，文物在流动过程中多点运输与多处迁徙，温度湿度及展厅、展柜等条件都有明显差异性。尤其有些地区新建的博物馆，其馆舍的安全、库房及展厅的设备设施条件等

都难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文物的安全保护确实有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博物馆界必须建立完整的行业规范并真正执行行业规范，对不符合条件的馆绝不可以轻易送展。

同时，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各级博物馆都想尽办法从藏品身上挖掘历史和艺术信息，用于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本身没有问题，反而是当今博物馆学理念非常重要的体现。但如何建立一套机制，让藏品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开展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仅仅限于复、仿制品的开发。同时，也必须避免盲目复、仿制，以免导致藏品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损坏，过度复、仿制只能降低藏品的价值。用好文物元素开展博物馆类型创意性产品的开发，实用于大众，才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好出发点。

飞速发展的博物馆事业给了我们机遇，让我们从困境中能够走出来，在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中，学习世界上先进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体系和管理理念，并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藏品管理体系，冲破固步自封、只保不用观念的同时，也不可盲目迈向“无知无畏”的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有失败的教训，但这些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类文化遗产，它的生命只有一次。

尽管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博物馆的展览、活动、服务及文化创意产业要以观众为核心，但也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将藏品管理的职能边缘化。相反，在本世纪，要想很好地完成公众赋予博物馆的使命，藏品管理的职能需要整合和完善。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文物普查工作开展的当下，作为博物馆藏品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藏品必须在保护中进行实操，不可为了抢时间完成任务而使文物受损。我们保护它，要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

收藏身边的历史 留存城市的记忆

——谈首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资源的调查与征集

章文永

博物馆的定义和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尤其是随着人类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化时代来临，博物馆的类型、内涵、核心价值等方面的理念探讨和实践案例都纷纷涌现。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时对博物馆的定义偏重于它是一个“藏品的机构”，20世纪50年代该定义进一步修订，视博物馆为科学研究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与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1961年的定义强化了博物馆应执行长期教育的使命。1974年博物馆定义指出了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战略方向。1989、1995、2001年则对博物馆的组织形态做了越来越宽泛的定义。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把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这次定义在将“教育”调整到了博物馆各项业务目的的首位，以之为“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出”等各项博物馆基本业务的首要目的的同时，又将博物馆工作对象延伸到“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这无疑反映了博物馆在传承地域文化传统、培养基本价值观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一定义指引下，2009年在东京举办的国际博协亚太分会年会的主题是：“重新思考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与区域文明遗产”，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

博协第22届代表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先生在其专著中，就博物馆职能的调整、完善及与城市文化、教育、民众生活、社会发展的关系，博物馆的创新类型等方面，提出了自己有关“广义博物馆”的思考与见解^①。

理论源于实践，更重要的是理论要指导实践。博物馆及博物馆的从业者要主动积极地去践行这些理念，竭诚地去完成新时代下的使命。在此前提下，作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类型的城市博物馆，在现代化、城市化的烟尘中，必须在各个环节中适应变化、变更方法，为城市的明天保存物证和记忆，让城市的历史文化尽可能鲜活、生动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从而使博物馆更好地成为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客厅”和城市人的精神家园。本文拟从博物馆近现代（自晚清以后，含当代，下文同）藏品的征集入手，阐述首都博物馆在近现代藏品征集中的理念、实践和反思，及为完成城市博物馆的使命、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一、近现代藏品征集的紧迫性

至2011年底，首都博物馆的近现代藏品只有1.5万件（套）。藏品门类不系统、重点不突出、优势不明显，甚至与发生在北京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藏品也不多。现有展览中有关北京近现代部分的内

容同样面临展品缺乏的窘境——近现代史的展览不够精彩、少亮点，不吸引人。

现实是流动的历史。每天发生在这座近 2000 万人口的城市内的纷繁故事中总有值得我们记住并将融进城市历史的人、物和事。而他们中的有些人、物和事极有可能在飞快的现代节奏中、在推土机的碾轧下、在主流话语的打压中流散，湮灭和被遗忘。此时，博物馆就应该尽早地介入其中，主动地去寻找和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市民生活有关的载体，甚至预判某件事情的意义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得到彰显，而提早收藏相关藏品。

另外，我们知道，值得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资源越是久远，越是稀少，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征集。而近现代的文物资源则相反，它更多地考验的是我们应该征集什么和如何征集，因此，越早开展近现代藏品征集，收获越大。

二、对近现代藏品征集类别的思考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能代表和记录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文明成果及其载体也随之进步。有形的、可触摸的传统藏品已不能满足现代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方面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就是对这种状况的反映。声音、影像及其制品就自然地成为了博物馆的藏品。特别是数字化的声音、影像类的虚拟藏品突破了传统的有形文物，给博物馆的征集、收藏、展示及教育的承载量、影响的范围和时效等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征集工作正是要适应这种变化。比如首都博物馆通过各种方式录制、采集了一些能够代表半个多世纪前老北京文化、极具北京特色的声音——有轨电车的鸣笛声，胡同里贩夫走卒的吆喝声，天空的鸽哨，邻里街坊的寒暄问候等，并曾用“胡同的一天”、“四季的声音”等主题进行分类和“展示”。收藏“声音”就体现了这种变化。

三、近现代藏品征集的目标和范围

加拿大学者盖尔·洛德与拜伦·洛德认为：“藏品征集的策略是为哪一年准备的，这需要定下来。通常提前 20-25 年，超过这一年限，计划似乎就很不现实了”^②。我们在实践中也有此体会。藏品征集不是采购物品，列好清单就可按图索骥了；也不是树上的果子在等我们去采摘。在一个时段内征集什么是有目标和规划的，但当下能征集到什么往往是未知的，或者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正因为如此，征集的规划应是相对长时段和方向性、概略化的。基于此，首都博物馆近现代藏品征集的长远目标是形成与自身功能、定位相适应的近现代藏品体系，近期目标是基本满足馆内近现代基本陈列、民俗陈列的展品需求。

国家文物局 2003 年 5 月曾颁布了《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参照这个文件，首都博物馆规划了本馆近现代藏品的征集范围：反映近现代以来发生在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物品；反映北京城市现代化的相关物品；反映近现代北京民族民俗、普通人生活变迁的具有典型时代、地域特点的各类物品；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商业发展、市民生活、市政设施、思想风貌的显著变化与巨大成就的相关物品；反映近现代以来社会思潮变迁、社会生活水平提高、风俗变迁、科技文化、文学艺术成就的各类物品等。

四、近现代藏品征集的方式

（一）开展工业遗产调查

北京的近代工业起步于一个多世纪前，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东郊棉纺织业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工业区、城南化工区、宋家庄化工区及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的布局。这些工厂曾经对北京的社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业

绩,某些企业甚至成了北京的标志之一。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产业调整以及环保需求,特别是为践行2008年北京“绿色奥运”理念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居的世界城市的需要,原有的工业格局要进行重大调整。城区内150家工业企业要以各种方式退出城市,其中不乏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厂要与这座城市告别。但是这些已经融进北京城市肌理的工业企业是这座城市成长的一个个“年轮”,企业里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城市一部分,是曾经的“主人”。城市博物馆应该留下他们生产、生活和奋斗、奉献的物证、身影和声音。

首都博物馆联合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铁路局等单位,成立了京西工业遗产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重点调查了京西门头沟煤矿(1883—2000年)、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1897—)、清河毛纺厂和制呢厂(1907—2006年)、石景山钢铁厂(1919—2010年,现已迁往河北曹妃甸)、北京火柴厂(1905—2006年)、北京焦化厂(1951—2006年),对这些工业遗址进行现状拍照和录像,保留影像资料,进行工业文物征集。征集到的重要实物藏品有制呢厂的清末英国马烤呢机、1924年的文献《北京地毯业调查记》、1930年英国制牛头刨、1905年的铁轨、民国时期火柴厂的保险柜、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制搓呢机等(部分为个人捐赠)。

除进行上述工作外,我们还进一步拓宽视野,借鉴国外对工业遗址利用的理念和案例,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英国铁桥谷、德国鲁尔工业遗址、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遗址等,对于厂房的再利用、如何改造、如何保留部分有代表性的厂房、机械设备等进行前瞻性分析和评估。如对我国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干线铁路——京张铁路青龙桥火车站遗址提出了详细的规划方案,并参与策划、筹建青龙桥火车站展览馆。

总之,开展工业遗产调查有助于拓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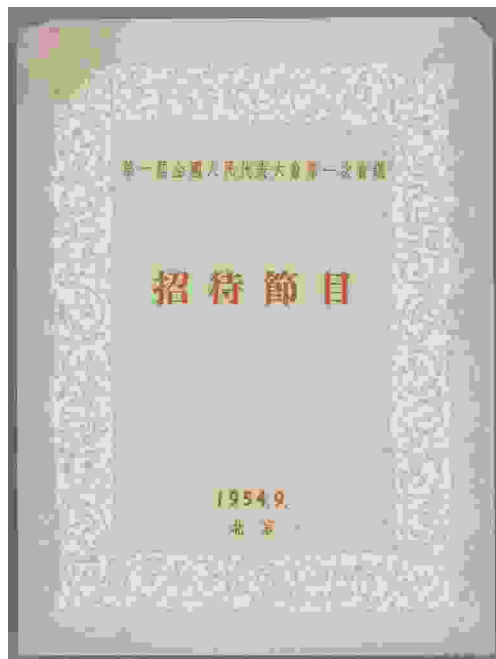
博物馆藏品征集的视野,特别是可以进行现场式的影像采集、物品征集,并为今后研究、利用这些虚拟藏品、实物藏品取得了原始的资料,相对于考古发掘文物和征集各类传世文物,具有一种特殊的“现场感”。

(二) 举办捐赠展

博物馆是一个高雅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展示场所,这一特点对艺术家和收藏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也是藏品征集可以利用之处——以博物馆的展览宣传,带动和换取对博物馆进行藏品捐赠。

201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2周年的时候,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祝福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62周年百名画家献礼长卷展”。展览结束后,130余位北京知名书画家的参展作品全部捐赠给首都博物馆。

2012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粉墨留痕——岳春生节目单收藏展”。岳先生是北京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自小受家庭熏陶,爱看戏,更懂戏,特别对节目单感兴趣。从上世纪60年代起,岳先生已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招待节目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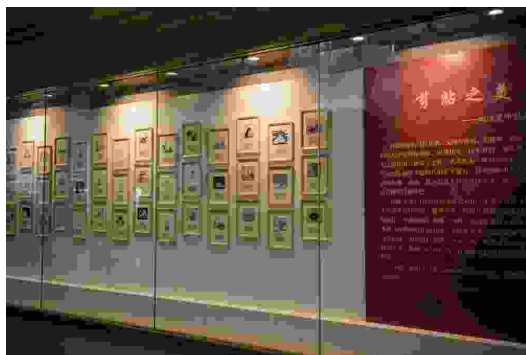
攒了 2000 多份各类节目单。节目单是文艺演出的名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特有的文化记忆功能越发突显出来。而岳先生最大的希望是能在有生之年举办一次节目单的收藏展，并为自己的收藏找一个稳妥而永久的“家”——因为“节目单是有生命的”，只有在博物馆中，节目单的生命才能更好地延续，服务更多的人，要让节目单“得其所”，而不是以之谋取经济利益。因此，首都博物馆利用展厅的橱窗，精选了 200 余份代表各时代标志性演出的节目单，举办了这次展览。该收藏展以独特的形式勾勒了 60 多年来北京文艺舞台发展变化的轨迹，堪称一本首都戏剧文化的微观史。而且这与首都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是很契合的。首都博物馆不仅获得了捐赠品，而且展览的社会反响也非常好，特别能体现城市博物馆为市民服务的宗旨。这次展览还是践行让博物馆“走出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理念的一种尝试。

目前，我们正在举办田冰灵女士布贴画捐赠展。布贴画是中国一项古老的艺术形式，据称萌生于唐朝。田女士长期从事舞台美术设计、书刊装帧设计及美术教学工作。她将自己《布贴画艺术》^⑧一书所利用的百余幅布贴画全部捐赠给首都博物馆。我们已将这些布贴画在 2014 年 1 月展出。该展览既是一个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展，也是想借此触动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博物馆。

（三）关注时事，主动寻找收藏品

对当下发生的有重大影响和重要意义的事件，博物馆人要训练特有的职业嗅觉，主动去寻找相关物品进行有预见性的收藏。

2003 年春天，“非典”肆虐北京。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的时候，我馆征集人员就与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有关单位、个人沟通，准备收藏与抗击“非典”相关的藏品。最终，我们从北京佑安医院、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地坛医院、小汤山医院、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人



田冰灵布贴画捐赠展

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北京市民政局、部分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及一些个人手中，共征集到有关“非典”的藏品 2322 件（套），并随即举办了抗击“非典”的专题展览。

2008 年，北京举办了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首都博物馆除收藏了奥运会徽宝——“中国印”之外，还从奥组委信息中心自购了 30 件藏品，另外接受了社会捐赠的奥运藏品数十件。

2012 年，北京金隅女篮和男篮分别夺得联赛年度总冠军。这是有关北京当代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我们在球队夺冠的第一时间就和首钢篮球中心联系，分别收藏了女篮队员、教练员签名的总冠军纪念篮球，男篮队员、教练员签名的冠军球衣。因为队里的外籍球员在赛后很快就回国了，因此凑齐全部队员的签名必须行动迅速，这也要求我们的征集工作要有一定的预判性，要提早与相关人士沟通，提前疏通渠道。

2013 年年初，北京汽车男子排球队获得了全国排球联赛年度总冠军。我们同样收藏了一件签名冠军球衣。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一个摄影展中，有几幅和球队夺冠相关的摄影作品。我们正在联系作者，希望取得这些照片的使用权。照片和实物都是记录这些事件的载体。

2012 年 7 月 21 日，61 年一遇的大暴雨突袭北京，很多地方遭遇洪灾，灾情严重，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 2011—2012 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总冠军签名纪念 T 恤衫

遇难人数达 79 人之多。当晚 7 时许，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 17.5 公里处南岗洼铁路桥下严重积水，水深平均 4 米，最深处达到 6 米。惊恐的人们聚集在巴士车顶。附近 150 多名农民工在这个漆黑的大雨滂沱的夜晚，在不断上涨的洪水、激流中共救出 200 多名被困者。他们的事迹感动了这座城市。著名媒体人崔永元、歌手韩红宴请这些救人的英雄们，并在纪念 T 恤衫上签名。职业的敏感告诉我们，这些 T 恤衫值得博物馆收藏。通过媒体朋友的联系，我们找到了部分农民工，劝说他们把 T 恤衫捐给我们。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把 T 恤衫寄回老家了，又让家人寄到北京，捐给我们。这些行为再次感动了我们。

（四）现场采集藏品

城市建设的脚步越来越快，旧城保护与改造之间的矛盾似乎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博物馆不是处在这种争论的核心，但在拆迁、改造中有所收获、征集一些藏品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这些藏品以建筑构件为主。如在南城贾家胡同 66 号院的拆迁中，我们现场采集了十几块带有“天立窑”、“宝丰窑”、“西通合窑停泥”等字样的砖。据考证，贾家胡同 66 号院应在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故居范围内。其中西通合窑应是北

京的老字号之一，归属京城旧时马家所有。老北京匠作行里的马家，是指明清时期的大木匠人马天禄及其后裔。马天禄参与了明代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其后开办木厂、窑厂，明、清两朝一直为朝廷服务。民国十九年（1930 年）北平齐化门外马记琉璃砖瓦厂曾向“西通合营造厂”输出琉璃制造技术人员。老北京人称西通合窑烧制的砖为“西通砖”。再如，我们在颐和园北宫门外的拆迁工地上采集了一块掇石，上面有“重一百八十斤”等字样。掇石是古代武举考试测验臂力的石头。这块石头虽然有点残损，但很有文物价值，填补了馆藏的空白。

（五）鼓励社会捐赠的宣传与征集信息的采集

博物馆人要积极主动地去告知社会公众，他们可以将哪些物品捐赠给博物馆收藏。博物馆应该利用好现代的传媒手段为藏品征集服务。首都博物馆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征集的需求，公布电话、电子邮件等信息，建立与公众互动的官方微博。在一些有关博物馆的专题片中，我们也遴选了一些话题，宣传本馆的征集意向。我们还在博物馆的入口处放上醒目的标牌，发布征集信息；在博物馆的门票上印上接受社会捐赠的需求与联系方式。近期我们还与部分当年赴北大荒的北京知青进行了



崔永元签名的“7.21 抢险英雄团队”纪念 T 恤



“西通合窑停泥”砖

座谈，动员他们将手边保留的当年的照片、生活用品、证章、证书等捐献给首博。在不久的将来，首博有望获得为数不少的有关知青的各类藏品，进一步丰富、健全有关知青题材的藏品系列。上文提到的捐赠展也是我们的宣传方式之一。

除用上述方式进行宣传以获得征集信息外，我们还与北京收藏家协会及社会上若干文物保护志愿者保持联系，一旦获得信息后，迅速回应，进行有效的互动。我们积极的回应是对他们热忱参与的一种报答和感恩。如果我们懈怠了，会打击他们的热情，我们就错失了许多机会。我们正营造着首都博物馆藏品征集的良好社会口碑。

五、对近现代藏品征集的一些思考

经过我们数年的努力，首都博物馆近现代藏品的征集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初步架构了征集网络，有了不菲的收获。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摸索解决办法。

如对当代艺术品捐赠的评估，如何制订具操作性的评估细则？再如藏品的销账

问题在征集阶段就要考虑到^①。捐赠者捐赠的物品中有一部分符合展示或科研要求，符合我们收藏标准，而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不需要的。捐赠者要求我们全部接受，既不能因小失大，似乎也不能降低收藏标准。如将那部分不需要的藏品销账，是不符合常规的。1990年国际博协关于职业道德相关法规中是这样说的：“对于博物馆已经拥有的正式藏品，在考虑销账时，一定要持强烈质疑的态度”。如何说服捐赠者就是藏品征集环节的工作了。

多数近代藏品是富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而在市场上属于低价位的文物。目前市政府的文物征集专项资金还无法利用来征购这些低价位的近代藏品。因为价位太低，资金审批手续复杂、过程长，卖家不会为了几百元、数千元的交易等半年时间，而市场又瞬息万变；征集流程中涉及的各部门也不会为了几百元、数千元的经费举办几重评估会。经费的阻滞让我们失去了好多机会。

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最终也会在实践中被解决。我们相信，不懈地努力、积极地行动始终是推进博物馆事业不断前行的内在力量。

（此文是2013年在首尔举办的“中日韩博物馆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文章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①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

^②〔加拿大〕盖尔·洛德、拜伦·洛德：《博物馆管理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0月，第61页。

^③田冰灵：《布贴画艺术》，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3月。书中的布贴画分动物、花果、人物、山水、鱼鸟五类题材。

^④〔加拿大〕盖尔·洛德、拜伦·洛德：《博物馆管理手册》，第58、59页对此问题有探讨。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为配合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一级项目用地开发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文物管理所协助下对其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古代墓葬。2009年7月10日至8月7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一级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古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项目用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东中部，梨园镇的西北部，东临怡乐中街，南临怡乐南街，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6^{\circ}37'33.82''$ 、北纬 $39^{\circ}53'00.10''$ ，海拔高度27米（图一）。本次发掘清理古墓葬52座（图二），其中明代砖室明堂2座、墓葬21座，清代墓葬

29座。现将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明、清明堂、墓葬简报如下。

一、明代明堂与墓葬

明代砖室明堂共发掘2座、墓葬2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可分为单棺墓、双棺墓、三棺墓、四棺墓。下面分类介绍如下。

（一）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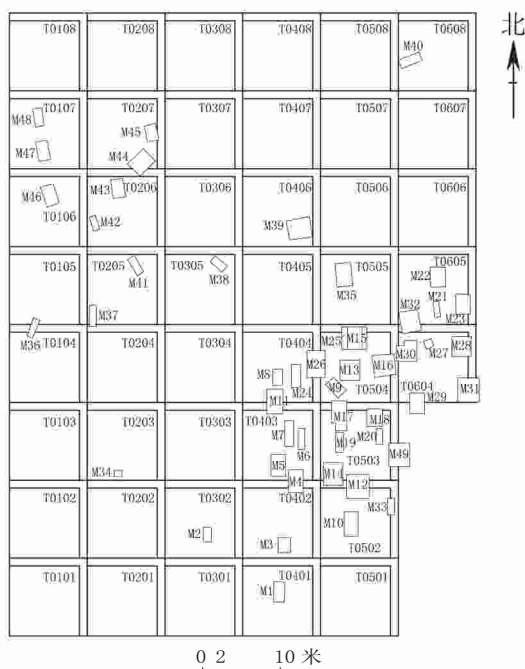
2座。为竖穴土圹砖室结构。编号为M27、M34。

M27位于发掘区I区的中东部，T0604的北部，西邻M30，开口于第②层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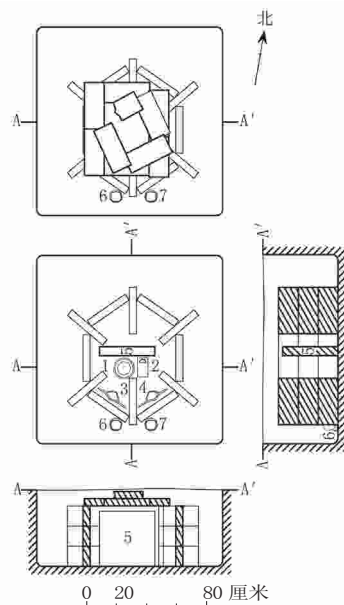
六角龟形砖室结构，南北向，方向 350° 。土圹边长1.24米，口距地表深0.8米，底距墓口深0.5米。上部用青砖封顶，东、西两侧用平砖呈南北向顺砖平砌而成；中部南、北两侧用平砖呈东西向平砌相互错缝砌制形成龟背形状，残存顶砖一层。室平面呈六角形状，东、西两角对立间宽0.86



图一 通州半壁店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二 墓葬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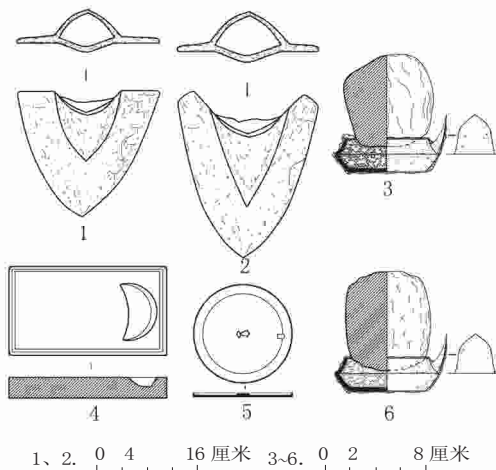


1. 铜镜 1件 2. 石砚台 1件 3. 铁犁铧 1件
4. 铁犁铧 1件 5. 铭文方砖 1块
6. 椭圆形石 1件 7. 椭圆形石 1件

图三 M27 平、剖面图



图四 M27 出土铜镜 (M27:1)



- 1、2. 铁犁铧 (M27:3、M27:4) 3、6. 椭圆形石 (M27:6、M27:7)
4. 石砚台 (M27:2)
5. 铜镜 (M34:1)

图五 M27、M34 出土器物

米，南北长 0.9 米，高 0.4 米。每个角外各用一块立砖形成龟脚、头、尾部的形状。室的周围用立砖围砌，形成六角形，共砌制三层。室内中部偏北有一块铭文方砖（M27:5），边长 0.37 米，厚 0.062 米。正面残留有少许红色痕迹，字迹不清。“龟头”立砖东、西两侧各有一直径约 0.05 米的椭圆形石。

出土随葬品有铜镜（M27:1）1 面、砚台（M27:2）1 件、铁犁铧（M27:3、M27:4）2 件均位于砖室内南部，椭圆形石（M27:6、M27:7）2 块位于“龟头”立砖东、西两侧（图三；照片一）。

随葬品

该明堂出土器物 7 件（面）。其中铜器为铜镜 1 面，铁器为铁犁铧 2 件，石器为砚台 1 件、椭圆形石 2 件及铭文砖 1 块。

1. 瑞兽葡萄纹铜镜 1 面（照片二）。标本 M27:1，残缺，锈蚀，圆形，兽形圆钮，无钮座，内高圈弦纹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外区同高，弦纹高缘，内区铸浮雕状瑞兽六组、葡萄枝蔓九组，外区为八鸟、四兽栖息、奔驰于葡萄枝蔓之间，葡萄粒十二组，边缘二周凸起弦纹内饰草叶纹。直径 13.7 厘米、缘高 1 厘米、钮径 2 厘米、钮高 1 厘米（图四）。

2. 铁器 2 件。铁犁铧 2 件。标本 M27:3，锈残，平面呈三角形，三角状鼻梁，向上凸起，背面外鼓，背面有二圆形穿孔，弧边，两边内夹角 60° ，翼展呈雁翅状。长 21、宽 23、厚 0.4~8 厘米（图五，1）；标本 M27:4，锈残，平面呈三角形，三角状鼻梁，向上凸起，背面外鼓，有二圆形穿孔，弧边，两边内夹角 50° ，翼展呈雁翅状。长 26、宽 21、厚 0.4~9 厘米（图五，2；照片三）。

3. 石器 3 件。石砚台 1 件。标本 M27:2，残，青石磨制而成。平面呈长方形，石质坚硬、质密。正面一端为月牙状半圆形墨池，正面四边饰长方形阴刻线刻两周；背面光素无纹。长 12.5、宽 7、厚 1.7 厘米，墨池直径 2.2~4.7、深 0.8 厘米（图五，

4；照片四）。

椭圆形石 2 件。标本 M27:6，青石质，经过加工打磨，表面粗糙，置于小铁碗内，与之粘连。通高 9.2 厘米，直径 7 厘米，高 7.1 厘米，铁灯碗口径 6.5、底径 6、高 2.6 厘米（图五，3）；M27:7，青石质，经过加工打磨，表面粗糙，置于小铁碗内，与之粘连。通高 9.2 厘米，直径 6.6 厘米，高 7.8 厘米，铁灯碗口径 6.5、底径 6、高 2.6 厘米（图五，6；照片五）。

4. 铭文方砖 1 件。标本 M27:5，残损，泥质灰陶，青灰色，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37 厘米，厚 6.2 厘米。正面光滑，背面粗糙有窑裂，无铭文。正面残见朱砂红色，推断应写有墓志铭文，现已脱落殆尽，无法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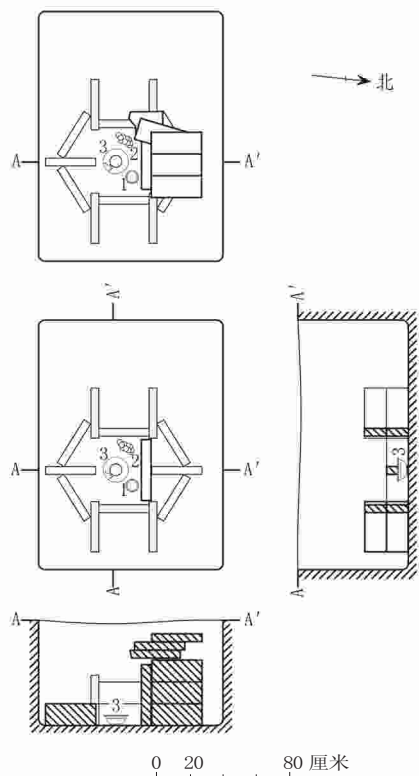
M34 位于发掘区 II 区的中南部，T0203 探方的南部，东邻 M5，开口于第②层下，为六角龟形砖室结构，方向 350° 。土圻东西长 1.52 米，南北宽 1.12 米，口距地表深 0.5 米，底距口深 0.65 米；墓室南北长 0.7 米，东西宽 0.52 米，高 0.4 米。周壁用小青砖立砌，三层砌砖保存较完整，南部仅残留砌砖一层，周壁拐角处各用一块直向立砖砌制。室内北部有一方形铭文砖，已破坏严重，无法提取，边长 0.36 米。墓室上部用三层青砖封堵，采用东西向青砖错缝平砌而成。底部用青砖斜向平砌呈龟背状。墓室内用砖规格为长 0.3、宽 0.15、厚 0.04 米，均为素面（图六）。

出土随葬品有铜镜（M34:1）1 面、铜钱（M34:2）10 枚、青花瓷碗（M34:3）1 件，均位于室内中部。

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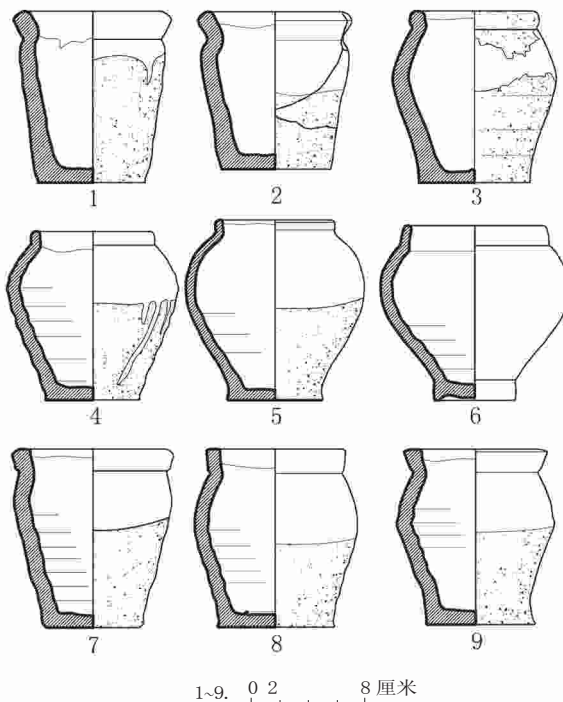
该明堂出土器物 2 件。其中瓷器为青花碗 1 件，铜器为铜镜 1 面，另出土铜钱 10 枚。

1. 瓷器 1 件。青花松竹梅石纹碗 1 件。标本 M34:3，残，撇口，深弧腹，平底凹，圈足，灰白胎，胎质坚硬，通体施青白色釉，釉匀净明亮。器表饰青花松竹梅石纹，边饰龟背锦纹两层；器内底饰青花团形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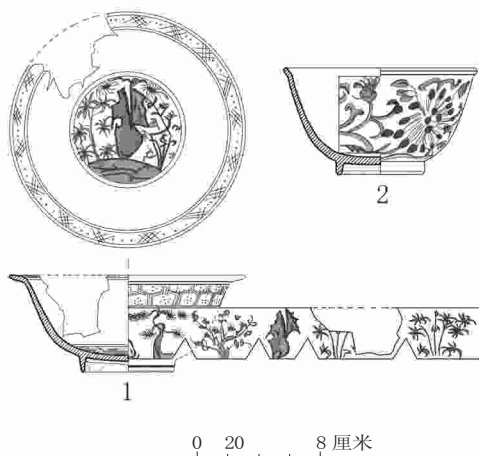
1. 铜镜 2. 铜钱 10 枚 3. 青花瓷碗 1 件

图六 M34 平、剖面图



1~4、7~9. 半釉陶瓷 (M1:1、M1:2、M2:1、M7:1、M11:2、M13:4、M13:5) 5、6. 陶瓷 (M12:2、M12:1)

图八 M1、M2、M7、M11、M12、M13 出土陶罐



1、2 (M34:3、M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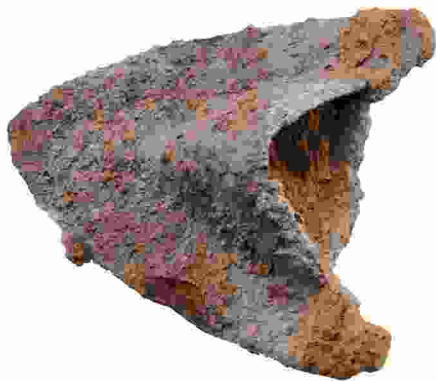
图七 M34、M13 出土青花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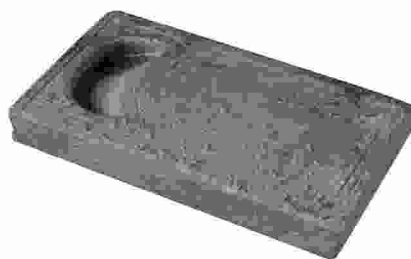
照片一 M27 俯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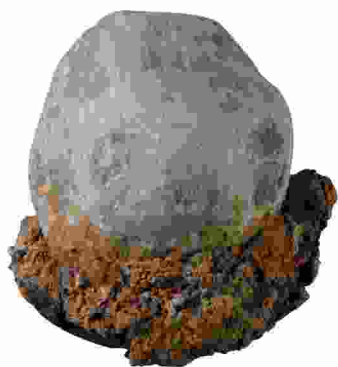
照片二 瑞兽葡萄纹铜镜 (M27: 1)



照片三 铁犁铧 (M27: 4)



照片四 石砚台 (M27: 2)



照片五 椭圆形石 (M27: 7)



照片八 青花花蝶纹罐 (M11: 1)

竹梅石纹，口饰复式菱格纹。口径 15.2、底径 5.8、高 6.2 厘米（图七，1；照片六）。

2. 铜镜 1 面。标本 M34:1，残，锈蚀，圆形，银锭形圆钮，无钮座，内高圈弦纹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高于内区，弦纹高缘，内区钮两侧铸“为喜最乐”四字，楷书，竖读。镜面微凸，光素无纹。直径 7.2、缘高 0.3 厘米、钮高 0.1 厘米（图五，5）。

3. 铜钱 10 枚

铜钱有北宋“天禧通宝”1 枚、“元丰通宝”1 枚、“景佑元宝”1 枚、“绍圣通宝”1 枚、“政和通宝”1 枚、“圣宋元宝”1 枚，有金代“大定通宝”1 枚；另 3 枚锈残，钱面无法辨识。

（二）单棺墓

8 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编号为 M2、M6、M7、M9、M20、M33、M41、M42。选取 M2、M7、M33 介绍如下：

M2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西南部，T0302 东部，东邻 M3，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单棺墓。南北向，方向 0°。墓圹南北长 2.3 米，东西宽 1.2~1.4 米，墓口距地表深 0.3 米，墓底距墓口深 1.0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单棺，棺木已朽，仅残留底部棺痕，棺长 1.6 米，宽 0.7 米，残高 0.06 米。棺内未发现骨架。

出土随葬品 1 件：半釉陶罐（M2:1）位于棺木北部外侧。铜钱（M2:2）位于棺木内中部偏北。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半釉陶罐 1 件。另出土铜钱 3 枚。

1. 半釉陶罐 1 件。标本 M2:1，残，轮制。直口，方唇，束颈，折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外口至腹部施绿釉，器口及外腹壁釉面与胎结合不紧密，局部脱落。器体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9、最大腹径 12.3、底径 8、高 12 厘米（图八，3）。

2. 铜钱 3 枚。皆为明代钱币“万历通宝”。

M7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西南部，T0404 中部，东邻 M6，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单棺墓。南北向，方向 3°。墓圹南北长 2.96 米，东西宽 1.12~1.34 米，墓口距地表深 0.5 米，墓底距墓口深 0.8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单棺，棺木已朽，棺长 1.9 米，宽 0.5~0.6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性别为男性。

随葬品半釉陶罐（M7:1）1 件位于棺木的北侧、铜钱（M7:2）13 枚呈“S”状分布于棺内。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 1 件器物，器形为陶罐。另出土铜钱 13 枚。

1. 半釉陶罐 1 件。标本 M7:1，残，轮制。敞口，圆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酱色釉，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及窑裂。口径 8.5、最大腹径 12.1、底径 6.6、高 11.5 厘米（图八，4）。

2. 铜钱 13 枚。能辨识的有“至道元宝”1 枚、“天圣元宝”1 枚、“永乐通宝”1 枚。

M33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东南部，T0502 东部，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单棺墓，南北向，方向 0°。墓圹南北长 1.88 米，东西宽 0.8~1.0 米，墓口距地表深 0.6 米，墓底距墓口深 0.6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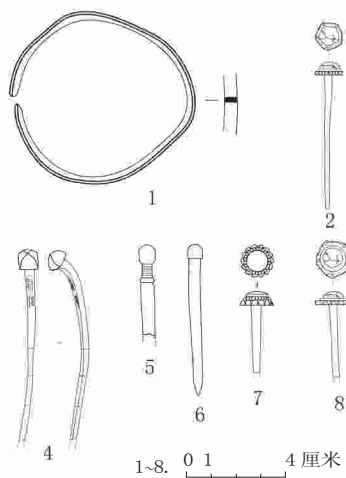
内置单棺，棺木已朽，棺长 1.7 米，宽 0.54~0.7 米，残高 0.2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为女性。

随葬品铜簪（M33:1）1 件位于头骨北侧，铜钱（M33:2）1 枚位于头骨东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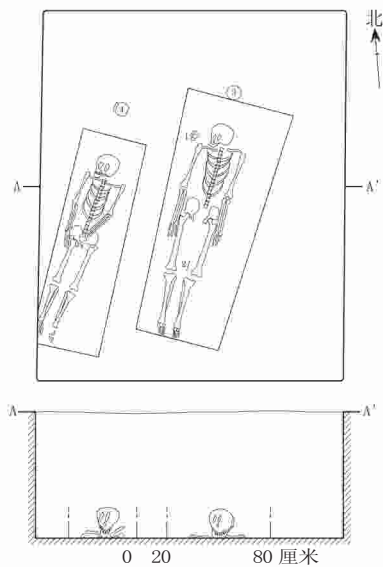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铜饰 1 件，另出土铜钱 1 枚。

1. 铜簪 1 件。标本 M33:1，残，蘑菇首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残断。簪首最大径 1.3 厘米，残长 3.4 厘米（图九，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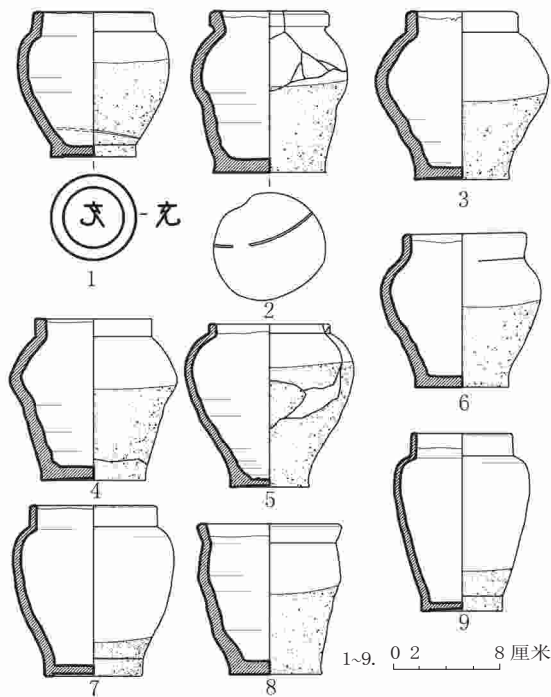
1. 铜镜 (M1:3) 2、3、7、8. 铜管 (M30:1、M30:4、M12:4、M33:1) 4. 鍍金银管 (M14:2)
5、6. 骨管 (M12:5、M30:2)



1. 铜钱 5 枚 2. 鍍金银管 1 件
3. 半釉瓷罐 1 件 4. 半绿釉罐 1 件

图九 M1、M12、M14、M30、M33 出土器物

图一〇 M14 平、剖面图



1. 半釉瓷罐 (M14:3) 2-6、8 半釉陶罐 (M14:4、M30:5、M31:1、M31:2、M36:1、M44:2) 7. 黑釉瓷罐 (M44:1) 9. 白釉瓷罐 (M44:3)

图一一 M14、M30、M31、M36、M44 出土器物

2. 铜钱“万历通宝”1枚。

(三) 双棺墓

6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编号为M14、M15、M22、M26、M28、M49。选取M14、M22介绍如下：

M14位于发掘区I区的中南部，T0503南部，东邻M12，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双棺墓，方向5°，南北向。墓圹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5米，墓口距地表深0.7米，墓底距墓口深1.0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1.94米，宽0.68~0.86米，残高0.3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为男性；西棺长1.76米，宽0.52~0.58米，残高0.3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为女性（图一〇）。

东棺出土半釉瓷罐（M14:3）1件位于东棺北部外侧，铜钱（M14:1）5枚、鎏金银簪（M14:2）位于东棺两大腿骨中部；西棺出土半釉陶罐（M14:4）1件位于棺木北部外侧。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3件。其中半釉陶罐1件、半釉瓷罐1件，鎏金银簪1件。另出土铜钱5枚。

1. 半釉陶罐1件。标本M14:4，残，轮制。直口，方圆唇，束颈，折肩，弧腹，下腹内曲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略变形。口至腹部施绿釉，釉层稀薄。器体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8.6、最大腹径17.7、底径8.3、高11.9厘米（图一一，2）。

2. 半釉瓷罐1件。标本M14:3，完整，轮制。直口，方唇，短颈，溜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假圈足，灰褐色胎，胎质坚硬，下腹沾有窑渣一周。器表仅颈、肩部施酱色半釉，器内满釉。器体修坯规整。外底中部印一反“充”字，阳文，字体不规范。口径8.7、最大腹径11.1、足径6.3、高10.7厘米（图一一，1）。

3. 鎏金银簪1件。标本M14:2，残，盃式簪首，四棱形簪体，尾部残断缺失，簪首局部见鎏金，簪体上部有阴刻“新楼”二字。残长7.6、宽0.2~0.7厘米（图九，4）。

4. 铜钱5枚。皆为明代钱币“天启通宝”。

M22位于发掘区I区的东北部，T0605中部偏北，东南邻M23，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双棺墓，南北向，方向0°。墓室中部有一盗洞。墓圹南北长2.8米，东西宽1.6米，墓口距地表深0.5米，墓底距墓口深1.0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2.0米，宽0.58米，残高0.1米，棺内骨架残留少量下肢骨，头北脚南，直肢，为男性；西棺长1.94米，宽0.6米，残高0.1米，棺内骨架残留少量下肢骨，头北脚南，曲肢，为女性。

东棺出土铜钱8枚（M22:1）位于下肢骨东南部；西棺出土铜钱30枚（M22:2）位于下肢骨中间。

随葬品

该墓东、西棺仅出土铜钱38枚。锈蚀严重，部分残碎。能辨清钱面的有唐代钱币“开元通宝”1枚、“乾元重宝”1枚；北宋钱币“天圣元宝”3枚、“绍圣元宝”1枚；金代钱币“大定通宝”1枚；明代钱币“永乐通宝”1枚、“弘治通宝”8枚。

(四) 三棺墓

5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编号为M12、M13、M23、M31、M32。选取M12、M13、M31介绍如下：

M12位于发掘区I区的中南部，T0502的北部，西邻M14，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三棺墓。南北向，方向3°。墓圹南北长2.84米，东西宽2.16~2.64米，墓口距地表深0.5米，墓底距墓口深0.74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三棺，棺木已朽，东棺长2.04米，宽0.6~0.74米，残高0.1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

为男性。棺底铺有草灰。中棺长 1.72 米，宽 0.67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棺底铺有草灰。西棺长 1.94 米，宽 0.5~0.64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棺底铺有草灰。

东棺出土红陶罐（M12:2）1 件位于东棺北侧；西棺出土红陶罐（M12:1）1 件位于西棺北侧、铜钱（M12:3）8 枚位于西棺头骨东侧、铜簪（M12:4）1 件位于西棺头骨东侧、骨簪（M12:5）1 件位于西棺内。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 4 件。其中红陶罐 2 件，骨簪 1 件，铜簪 1 件。另出土铜钱 8 枚。

1. 陶罐 2 件。标本 M12:1，残，轮制。直口，方圆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隐圈足，砖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9.6、最大腹径 12.2、底径 5.7、高 12.2 厘米（图八，6）；标本 M12:2，残，轮制。敛口，方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青绿釉浆水。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8.4、最大腹径 12.5、底径 6.8、高 12.6 厘米（图八，5）。

2. 铜簪 1 件。标本 M12:4，残，蘑菇首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尖锐。簪首最大径 1.3 厘米，残长 3.4 厘米（图九，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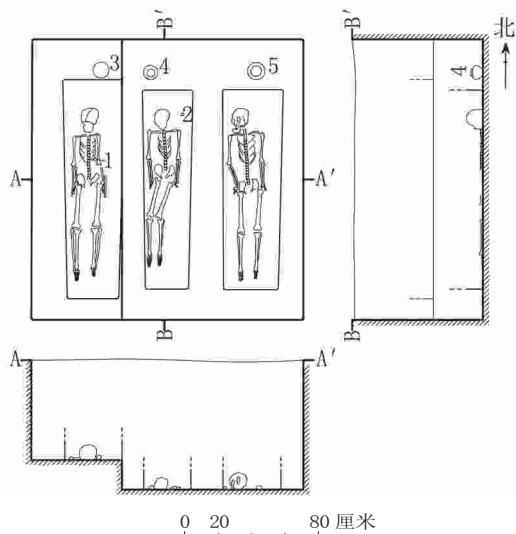
3. 骨簪 1 件。标本 M12:5，残，球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残断，颈部略细，刻螺旋状弦纹六周。残长 3.8 厘米，直径 0.6 厘米（图九，5）。

4. 铜钱 8 枚。皆为明代钱币“嘉靖通宝”。

M13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中部，T0504 中部，东邻 M16，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圹三棺墓，南北向，方向 0°。墓圹南北长 2.8 米，东西宽 2.76 米，墓口距地表深 0.3 米，墓底距墓口深 1~1.3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三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2.0 米，

宽 0.5~0.6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为男性；中棺长 2.0 米，宽 0.4~0.5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西棺长 2.2 米，宽 0.5~0.6 米，残高 0.2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图一二）。



1、2. 铜钱 3. 青花缠枝莲纹碗 1 件
4. 半釉陶罐 1 件 5. 半釉陶罐 1 件

图一二 M13 平、剖面图

东棺出土半釉陶罐（M13:4）1 件，位于东棺北侧；中棺出土铜钱（M13:2）1 枚位于头骨东侧、瓷碗（M13:3）1 件位于棺木北侧；西棺出土铜钱（M13:1）1 枚位于臂骨东部、半釉陶罐（M13:5）1 件位于棺木北侧。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 3 件。其中半釉陶罐 2 件，瓷碗 1 件。另出土铜钱 2 枚。

1. 半釉陶罐 2 件。标本 M13:4，残，轮制。直口，方唇，束颈，折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绿釉，釉薄，光亮，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9.6、最大腹径 11.4、底径 8.1、高 12.4 厘米（图八，8）；标本 M13:5，残，轮制。

直口，方唇，束颈，折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酱色釉，釉薄，光亮。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10、最大腹径11.3、底径7.8、高12.2厘米（图八，9）。

2. 青花缠枝莲纹碗1件。标本M13:3，残，敞口，深弧腹，平底下凹，圈足，灰白胎，胎质坚硬，通体施灰青色釉。器表饰青花缠枝莲纹；器内底饰青花团形莲花纹，口饰几何纹。器表及底部见九处铜钉孔。底部残，有方形青花图记款。口径12.3、足径6.2、高6.8厘米（图七，2）。

3. 铜钱2枚。皆为明代钱币。西棺出土“泰昌通宝”1枚；中棺出土“万历通宝”1枚。

M31位于发掘区I区的东南部，T0604东南部，西邻M29，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三棺墓，南北向，方向10°。墓坑南北长3.08米，东西宽2.34~2.72米，墓口距地表深0.6米，墓底距墓口深1.4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三棺，棺木已朽，东棺长1.84米，宽0.46~0.52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为女性；中棺长1.83米，宽0.62~0.74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男性；西棺长1.86米，宽0.6~0.68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

中棺出土半釉陶罐（M31:2）1件位于棺木北侧、铜钱（M31:3）1枚位于左臂骨东侧；西棺出土半釉陶罐（M31:1）1件位于棺木北侧。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2件。皆为半釉陶罐。另出土铜钱1枚。

1. 半釉陶罐2件。标本M31:1，残，轮制。直口，方唇，束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绿釉，釉薄，光亮，

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8.6、最大腹径12.2、底径7.7、高11.9厘米（图一一，4）；标本M31:2，残，轮制。敞口，圆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青绿釉浆水。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8.9、最大腹径12、底径5.8、高12厘米（图一一，5）。

2. 铜钱1枚。北宋钱币“元祐通宝”1枚。

（五）四棺墓

2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M16、M30。选取M30介绍如下：

M30位于发掘区I区的中东部，T0604西部，东邻M27，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四棺墓。南北向，方向15°。墓坑南北长2.44~2.62米，东西宽2.84~3.2米，墓口距地表深0.6米，墓底距墓口深1.42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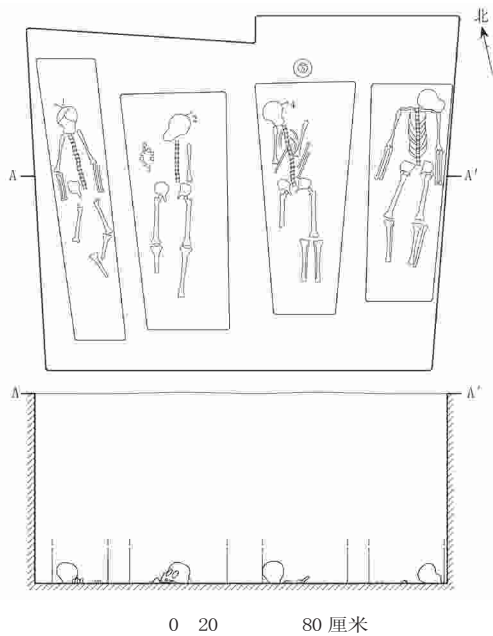
内置四棺，棺木已朽，由东向西排列分别编成1~4号棺。1号棺棺长1.62米，宽0.5~0.6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男性；2号棺棺长1.7米，宽0.46~0.74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3号棺棺长1.76米，宽0.6~0.8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4号棺棺长2.1米，宽0.38~0.44米，残高0.2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图一三）。

3号棺出土骨簪（M30:2）1件位于头骨北侧、铜钱（M30:3）8枚位于脊椎骨西侧；4号棺出土铜簪（M30:1）1件位于头骨北部；2号棺出土铜簪（M30:4）1件位于头骨东北部、半釉陶罐（M30:5）1件位于棺木北侧。

随葬品

该墓出土器物4件。其中半釉陶罐1件，骨簪1件，铜簪2件。另出土铜钱8枚。

1. 半釉陶罐1件。标本M30:5，残，轮制。直口，方圆唇，束颈，丰肩，弧腹，



1、4. 铜簪 2. 骨簪 1件 3. 铜钱 8枚
5. 半釉陶瓷 1件

图一三 M30 平、剖面图

下腹弧收外曲，平底略凹，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绿釉浆水，局部脱落。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8.3、最大腹径 12.9、底径 7、高 12.4 厘米（图一一，3）。

2. 铜簪 2 件。标本 M30:1，残，蘑菇首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残断。簪首最大径 1.2 厘米，残长 5.9 厘米（图九，2）；标本 M30:4，残，蘑菇首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尖锐。簪首最大径 1.2 厘米，残长 10.2 厘米（图九，3）。

3. 骨簪 1 件。标本 M30:2，残，球状簪首，圆柱形簪体，尾部尖锐。簪首直径 0.7 厘米，残长 6.1 厘米（图九，6）。

铜钱 8 枚。锈残。皆为明代钱币。有“嘉靖通宝” 6 枚、“万历通宝” 2 枚。

二、清代墓葬

清代墓葬共发掘 29 座，可分为单棺墓、双棺墓、三棺墓。分类介绍如下。

（一）单棺墓

13 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 M8、M18、M19、M24、M25、M36 ~ M38、M40、M48、M50 ~ M52。选取 M36 介绍如下：

M36 于发掘区 II 区的中西部，T0104 北部，东北邻 M37，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棺墓。南北向，方向 40°。墓坑南北长 2.34 米，东西宽 0.8 ~ 0.92 米，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墓底距墓口深 0.5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单棺，棺木已朽，棺长 1.74 米，宽 0.5 米，残高 0.2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男性。棺木底部铺垫有一层青灰。

出土半釉陶罐（M36:1）1 件位于棺木北侧。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 1 件器物。另出土铜钱 1 枚。

1. 半釉陶罐 1 件。标本 M36:1，残，轮制。敞口，圆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腹部施绿色釉，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及窑裂。口径 9、最大腹径 11.8、底径 7、高 11.4 厘米（图一一，6）。

2. 铜钱为清代钱币“康熙通宝” 1 枚。

（二）双棺墓

15 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 M1、M3 ~ M5、M10、M11、M15、M17、M29、M35、M39、M43、M45 ~ M47。选取 M1、M11、M39 介绍如下：

M1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西南部，T0401 中部，北邻 M3，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双棺墓。南北向，方向 355°。墓坑南北长 2.42 ~ 2.62 米，东西宽 1.36 ~ 1.5 米，墓口距地表深 0.6 米，墓底距墓口深 0.3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72 米，宽 0.5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为男性，东棺底部铺垫木炭；西棺长 1.75 米，宽 0.38 ~ 0.52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头北脚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为女性，西棺底部铺炉渣。

另外在墓圪东北壁上距墓口约 0.65 米处有一小壁龛，壁龛高 0.15 米，宽 0.22 米，进深 0.2 米，壁龛内放置有一件瓷罐。

东棺出土半釉陶罐（M1:2）1 件位于东棺北侧的墓圪东北壁、铜钱（M1:4）1 枚位于肋骨中部；西棺出土半釉陶罐（M1:1）1 件位于西棺北侧、铜镞（M1:3）1 件位于西指骨部。

随葬品

该墓出土 3 件器物。其中半釉陶罐 2 件，铜镞 1 件。另出土铜钱 1 枚。

1. 半釉陶罐 2 件。标本 M1:1，残，轮制。直口，方唇，束颈，筒形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青绿色釉，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11、最大腹径 10.3、底径 7.5、高 12 厘米（图八，1）；标本 M1:2，残，轮制。直口，方唇，束颈，筒形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青绿色釉。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径 10.7、最大腹径 10.8、底径 7.6、高 11 厘米（图八，2）。

2. 铜镞 1 件。标本 M1:3，锈残，扁条状镞体环形对接。直径 7.5 厘米（图九，1）。

3. 铜钱为清代钱币“康熙通宝”1 枚。

M11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中西部，T0404 南部，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圪双棺墓。南北向，方向 0°。墓圪南北长 2.9~3.06 米，东西宽 2.02~2.26 米，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墓底距墓口深 1.0

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内置双棺，棺木已朽，东棺长 1.9 米，宽 0.8 米，残高 0.3 米，棺内骨架凌乱，性别、葬式不明；西棺长 1.84 米，宽 0.76~0.8 米，残高 0.3 米。棺内骨架凌乱，性别、葬式不明。

东棺出土半釉陶罐（M11:2）1 件位于东棺内北部；西棺出土青花瓷罐（M11:1）1 件位于西棺北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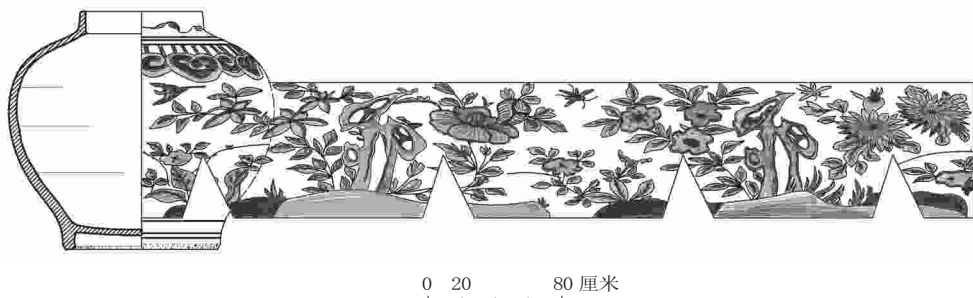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器物 2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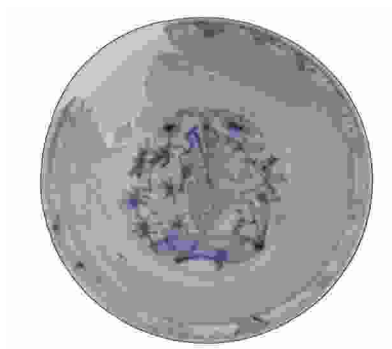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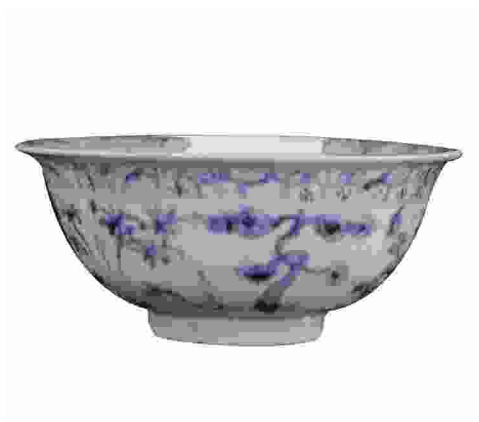
1. 半釉陶罐 1 件。标本 M11:2，残，轮制。敞口，方唇，束颈，溜肩，筒形腹，下腹弧收，平底，褐红色粗胎，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青绿色釉，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口、腹部沾有窑渣。口径 11.3、最大腹径 11、底径 7.6、高 12.5 厘米（图八，7；照片七）。

2. 青花花蝶纹罐 1 件。标本 M11:1，完整，轮制。直口，圆唇，短颈，丰肩，弧腹，下腹弧收近底外曲，平底略凹，隐圈足，灰褐色胎，胎质坚硬。器内外施青白釉，釉色莹润、光亮，足底刮釉露胎。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及胎接痕一周。主体饰青花花卉、蝶、石纹，颈、肩部分别饰草叶纹及变形莲瓣纹各一周。口径 6.4、最大腹径 13、底径 8.2、高 12.7 厘米（图一四；照片八）。

M39 位于发掘区 I 区的西北部，T0406 的东南部，西南邻 M38，开口于第②层下，为长方形竖穴土圪双棺墓，东西向，方



图一四 青花花蝶纹罐（M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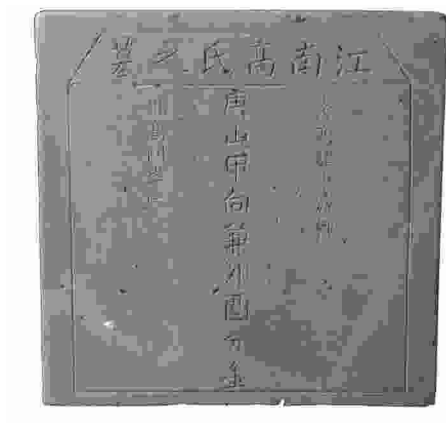


内底

照片六 青花松竹梅石纹碗 (M34: 3)



照片七 半釉陶罐 (M11: 2)



照片九 墓志方砖 (M39: 1)



照片十 白釉瓷罐 (M44: 3)

东棺南侧、铜钱 (M44:4) 1 枚位于东棺内盆骨下部；中棺出土半釉陶罐 (M44:2) 1 件位于中棺南侧；西棺出土白釉瓷罐 (M44:3) 1 件位于西棺南侧。

随葬品

该墓仅出土器物 3 件。其中半釉陶罐 1 件，瓷罐 2 件。另出土铜钱 1 枚。

1. 半釉陶罐 1 件。标本 M44:2, 残, 轮制。直口, 方唇, 束颈, 筒形腹略鼓, 下腹弧收, 平底, 褐红色粗胎, 胎质疏松。器口至上腹部施酱色釉, 有滴釉现象。器体内外见明显的修坯旋痕, 口部见椭圆形窑粘痕两处。口径 10.6、最大腹径 10.9、底径 7、

高 11.1 厘米（图一一，8）。

2. 瓷罐 2 件。

黑釉瓷罐 1 件。标本 M44:1，完整，轮制。直口，圆唇，短颈，溜肩，弧腹，下腹弧收外曲，平底，隐圈足，灰褐色胎，胎质坚硬。器体饰一层白色化妆土，器口至下腹部施黑釉，器内施黑色釉浆水，底内沾有窑渣。器底见一半圆形刻划纹。口径 9.3、最大腹径 11.9、足径 7.2、高 12.6 厘米（图一一，7）。

白釉瓷罐 1 件。标本 M44:3，完整，轮制。直口，方唇，短颈，溜肩，弧腹，下腹弧收，平底，隐圈足，灰褐色胎，胎质坚硬。器体饰一层白色化妆土，胫底露胎，器口至下腹部施白釉，釉层表面有细密开片纹，器内施酱褐色釉浆水，底内沾有窑渣。器体修坯规整，底足有三块椭圆形化妆土痕。口径 7.3、最大腹径 10.1、足径 6、高 13.1 厘米（图一一，9；照片十）。

3. 铜钱 1 枚，为清代钱币“康熙通宝”。

三、结语

M2 出土陶罐与北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86 出土陶罐（M86:1）形制相似^①，且出土明代铜钱“万历通宝”；M7 出土明代铜钱“永乐通宝”，且出土陶罐与北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76 出土陶罐（M76:1）形制相似^②；M12 出土陶罐与北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97 出土陶罐（M97:1）形制相似^③，且出土明代铜钱“嘉靖通宝”；M14 出土明代陶罐与北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34 出土陶罐（M34:1）形制相似^④，有明代铜钱“天启通宝”；M13 出土的陶罐（M13:5）与海淀东升乡明代墓葬 M14 出土陶罐（M14:1）形制相似^⑤，且出土明代铜钱“万历通宝”、“泰昌通宝”；M33 有明代铜钱“万历通宝”；M22 出土铜钱最晚时间为明代“弘治通宝”；M30 出土明代铜钱“嘉靖通宝”、“万历通宝”，且出土陶罐与北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76 出土陶罐（M76:1）形制相似^⑥；M31 出土宋钱，且出土陶罐（M31:1）与北

京射击场明代墓葬 M10 出土陶罐（M10:4）形制相似^⑦。以上墓葬均为明代墓葬。

M27、M34 均为六角龟形砖室结构，据相关研究^⑧，可知其不是墓葬，而是明堂。明堂 M27 出土墓志方砖上的字迹已经不能辨识，而出土器物也缺乏判定时代的依据，因此仅据 M27 周围的墓葬为明代墓葬，推测 M27 时代也是明代。明堂 M34 出土宋、金铜钱，且出土了具有明代中期典型特征的青花松竹梅石纹碗，因此判断其时代为明代中晚期。

M1 出土陶罐与北顶娘娘庙东侧清代墓葬 M15 出土的陶罐（M15:5）形制相似^⑨，且出土有“康熙通宝”，M36、M44 也出土有清代铜钱“康熙通宝”，均为清代墓葬。M39 出土墓志，为康熙年间墓葬。

本次发掘清理 52 座明、清时代古墓葬。墓葬种类较为全面。通过对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明、清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该地区明清墓葬的形状、结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该地区丧葬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①④⑦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 612 页。

②③⑥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 610 页。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明清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2013 年第 2 辑。

⑧崔学谙：《明清砖穴综述》，载于《首都博物馆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2 年。

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北顶娘娘庙东侧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博》2009 年第 3 期。

发掘：于璞 刘凤亮 曾祥江
摄影：王殿平 于璞
修复：古艳兵
绘图：刘晓贺
执笔：于璞 刘凤亮 曾祥江

明

代

服

饰

文

献

举

要

谢大勇

一、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 (1368—1398)

1. 《明实录》，100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有关服饰记录文字甚多，但材料分散，整理不易。其中《明太祖实录》如卷三十，洪武元年（1368年）有“诏复衣冠如唐制”。又“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袞冕。”如卷三十六，洪武元年十一月“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如卷五十二，洪武三年（1370年），令“服色所尚于赤为宜”。如卷五十六，洪武三年，“《大明集礼》书成。”如卷七十四，洪武五年（1372年），“定内命妇服制”。如卷一百五十五，洪武十六年（1383年）“更定冕服之制”。如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等。

2. 《大明令》，洪武元年奉旨发布礼令，内容包括文武官员公服品从、服色冠带及庶民禁令等。收于张鹗《皇明制书》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号。

3. 《明集礼》，洪武三年书成，嘉靖九年（1530年）刊行。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卷三十九为“冠服”，参酌古制，定皇帝以下至庶民妻冠

服之制。卷四十为“冠服图”，有黑白线描图七十一幅。

4. 《孝慈录》，洪武七年（1374年）成书。为凶礼丧葬孝服制度。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缙麻的衣冠带履制度，并附有图解。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十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号。又有《御制孝慈录》见《记录汇编》。

5. 《洪武礼制》，洪武间成书。内容包括文武官员朝服的梁冠、衣裳、服色、中单、蔽膝、大带革带、佩绶、袜履的等第；陪祭服的冠、带、佩、绶等第；常服的乌纱帽、圆领衫的束带等第；并服色禁忌。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七，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号。

6. 《礼仪定式》，洪武二十年（1387年）成书，内容包括官员冠带、官员服色花样；并服色禁忌。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八，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号。

7. 《诸司职掌》，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从成书时间来看，本应总结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大讨论的成果。但是从书名来看，《礼部职掌》则只是阐明当时礼部的礼仪岗位责任。故书中关于皇帝冕服、东宫皇太子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文武官冠服、命妇冠服中，有些与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大讨论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诸司职掌》为翟善等编，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卷，并收录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四，也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号。

二、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1403—1424）

1. 《冕服卤簿仪仗图》。《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七记载：“永乐三年冬十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

《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更改，即令颁之所司，永为仪式。’”朱棣所说的“祖宗成宪”当指完成于洪武时期的《冕服卤簿仪仗图》等。

2. 《冕服图》一部一册、《冠服图》一部二册、《朝服图》一部二册、《卤簿图》一部七册。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一著录。此四图系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由南京取来，原于左顺门北廊收贮，后贮于文渊东阁，杨士奇曾参与整理。此四种图似应为永乐三年（1405年）进呈的《冕服卤簿仪仗图》之析出散件，当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由南京秘府运至北京的，但原本今人已不得见。

3. 今人所说的《中东宫冠服图》，其主要部分应是来源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遗存部分，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察研究。但明《中东宫冠服图》中所反映的无疑是洪武时期形成和确立的服饰制度，而于永乐时，才大规模普遍地予以执行。

三、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1488—1505）；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1506—1521）

1. 正德本《明会典》，180卷。《明会典》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徐溥等奉敕纂修。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德四年（1509年）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等重校，正德六年（1511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世称《正德会典》。其中卷五十七、卷五十八为冠服，引用《明集礼》、《诸司职掌》时而附有“事例”。见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四、明世宗朱厚熹，年号“嘉靖”（1522—1566）

1. 《燕弁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1528年）定，为皇帝燕居服，冠如皮弁，服如

古玄端深衣之制。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写本《大明冠服图》。燕弁冠服在于求古朴端庄之意。

2. 《忠静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定，亦如古玄端深衣之制。《礼部志稿》称，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国子监行人服用。在外许方面官及府堂官、州县正官、儒学教官服用。武官止都督以上服用。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写本《大明冠服图》。忠静冠服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提倡尊贤、臣效忠于君之意。

3. 《保和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定，据光泽王的提议参酌《燕弁冠服图》、《忠静冠服图》之制为之。为皇帝宗亲中的亲王、郡王、世子、长子将军、中尉等所服。原为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后因编《四库全书》而献于朝廷。《保和冠服图》提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但原书今不知所藏。《保和冠服图》在于明上下、别亲疏，增强宗室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达到“保斯和，和斯安”的目的。

4. 《千顷堂书目》，黄虞稷撰。书目中卷九著录有《大驾卤簿图》一册、《中宫卤簿图》一册、《仪仗图》三册、《东宫仪仗图》一册、《亲王仪仗图》一册、《东宫妃及公主郡主仪仗图》一册、《乘舆冕服图说》一卷、《乘舆武弁服制图说》一卷、《中宫以下及郡王冠服图式》一卷、《朝服图》一册、《巾帽局图》四册、《针工局图》四册。以上皆为嘉靖九年（1530年）绘进。但是这些图文今已不知在何方。

5. 《天水冰山录》，为世宗嘉靖晚年，严嵩及其子严世藩被抄家时，在其祖籍江西分宜的财产籍没清册。明刊本曾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为周石林所得，因刊本残缺，周氏手成此书，取太阳当空，冰山骤涣之意，命名为《天水冰山录》，因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中被籍没的有关服饰的财产甚多，包括有织金妆花缎、绢、绫、罗、纱、绉、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一匹，各色织金妆花缎、绢、绫、罗、纱、绉、改机、绒、宋锦、

蟒葛、貂裘、丝布等男女衣服一千八百零三件，头箍围髻二十一条，耳环耳坠二百六十七双，坠领坠胸六十二件，金银珠宝簪三百零九根，钗钏一百零五件，杂色金首饰七百七十六件，帽顶三十五个，缘环二百零八件，缘钩六十八件，玉带二百零二条，金银各色带一百二十四条，带环三十三件。其细部命名是研究明代服饰名物制度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天水冰山录》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五、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20）

1. 《宪章类编》，42卷，劳堪撰。万历六年（1578年）自刻本，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号。卷九有“乘舆冠服诸物”条。卷十一有“国朝书”条，记有永乐三年礼部进呈《冕服卤簿仪仗图》之事。卷十五有“官民礼仪冠服制”条。

2. 《重修大明会典》，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万历十五年（1587年）刊行，共计228卷。其中卷六十一为“冠服”，有图六十一页，引文多不标原书名，以所定年代代之。内容较正德本丰富了很多。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9至792册。题《大明会典》，影印万历内府刻本。另有中华书局1989年一版、2007年二版印刷本。

3. 《三才图会》，王圻纂辑，王思义续集。书中《衣服图会》三卷，卷一为古代冠服，卷二卷三为明代国朝冠服，图多转引于它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0册，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本影印。又有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本。

4. 《皇明典礼志》，20卷，郭正域撰。该书第十七卷为“卤簿仪仗”，或引自《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嘉靖九年绘进本。第十八卷为“冠服志”，引文均标明为何年所定。见《续修四库全书》第八百四十二册，据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影印。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

史部第 270 册。

5.《王国典礼》，8卷，朱勤美撰。该书卷二第四十四页至七十二页为“冠服”。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824 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周府刻天启增修本影印。又见《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 59 号。

六、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1620 年）

《礼部志稿》，100 卷，为泰昌元年（1620 年）官修。《明史·艺文志》有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当即此书。该书卷十八为“仪制司职掌·冠服”，卷二十一为“仪制司职掌·宴礼”，于乐舞服饰记述颇详。卷六十二为“冕服备考”，卷六十四为“章服备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

七、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1621—1627）

《国朝典汇》，200 卷，徐学聚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64 至 266 册，据天启四年（1624 年）徐与参刻本影印。其中第 265 册 740 页至 747 页为“冠服志”。第 2266 册 876 页至 880 页为“采珠宝”。第 197 页为“织造”。冠服定制依照时间顺序编排。

八、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1628—1644）

《汝水巾谱》，一卷，朱术珣撰。郑振铎先生旧藏，《西谛书目》著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子部第 79 册，影印明崇祯六年自刻本。内有线描图样。

九、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弘光”（1645 年）

《朱氏舜水谈绮》，朱之瑜撰。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据 1908 年日本刻本影印。内容包括：“野服图说”、“道服图说”、“披风图”、衣服（附染色）。

十、明末清初

《天府广记》，44 卷，孙承泽撰。卷十五“礼部”有明代朝仪冠服、中宫朝仪冠服之制、宫官之制、内侍之制、宫禁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792 册。据辽宁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史部第 248 册。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 年排印点校本。

十一、清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1679—1739）

《明史·舆服志》，张廷玉等奉敕修。《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为舆服二，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为舆服三。在各种有关明代冠服制度文献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编辑而成，是最为完备的明代冠服制度表述。

附注：

有些明代礼书未见原文，不知有无冠服内容，故未能详列。如《国朝制作》、《大礼要义》、《皇明礼制》、《国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等。

（作者为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

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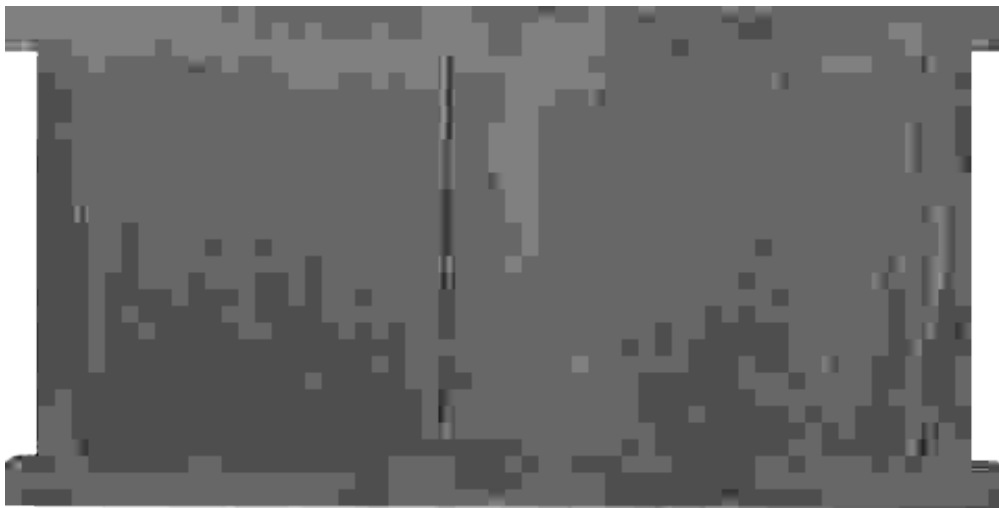
庾 华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的雍正二年（1724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长251厘米，宽126厘米，高75厘米，为横式匾额，通体髹漆，满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字体为金漆小楷，匾额四周装饰有边框。匾额汉文如下：

皇帝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塞楞额、王传等，朕惟圣人之道，昭揭日月，弥纶天地万世。帝王下逮公卿士庶，罔不仰遵成宪，率由教言。我国家尊崇至圣，远迈前代。朕缙承大统，古训是学，惟日孜孜。兹雍正二年三月朔日，亲诣辟雍，祇谒先师孔子，行释奠礼，思以鼓励群英，丕隆文治。尔监臣宜严督诸生，善为导诱；尔诸生亦当殚心肄业，实践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兴谊。勿营奔竞，勿事

浮华。文必贵乎明经，学务期乎济世。俾品成诣进，以副朕教育至意。此尔多士之麻，亦惟尔监臣董率之功也。慎勿怠荒职业，以贻尔羞。诸师生其共勉之！故谕。

国子监即太学所在地，太学是古代最高等级的官学，是封建社会培养治国安邦人才的摇篮，自汉代首创以来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满清皇帝尤其重视，纷纷临雍视学，颁发圣谕，训导国子监祭酒、司业等教学管理人员及全体学员（监生），倡导儒学。《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六中记载了“顺治九年”、“康熙八年”、“雍正二年”（文中错记为“三年”）、“乾隆三年”4块清代早期皇帝的“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事实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共收藏清代皇帝的“敕



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

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7块，除上述4块匾额之外，还完好保存嘉庆、道光、咸丰三位清代中期皇帝的敕谕匾额。皇帝颁发给国子监的圣谕及御制诗文全部记载于《钦定国子监志》卷首^①。

雍正皇帝是继康熙之后又一位清代早期的有为皇帝，十分看重国子监在全国儒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秉承先朝之制，于即位之后第二年的三月初一日驾临国子监视学，在向孔子行释奠礼之后，亲自到国子监的彝伦堂讲学，并对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员及全体监生进行训话。关于此次雍正皇帝临雍视学，文献多有记载，如《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是年春三月乙亥朔，世宗宪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后，御彝伦堂。命祭酒塞楞额、王传进讲《大学》，司业博礼、彭维新进讲《尚书》。既毕，世宗亲授经义，特谕增复先师庙崇圣祠，祔享贤儒。增置先贤先儒裔五经博士。复谕广直省入学额数。其人文最盛州县小学改中学，中学改大学，大学如府学。又命监及直省学政，录科时察实能贯通五经诸生，仍听以五经应试。各氏后裔，送监读书者十五人。广国子监乡试中额十八名。是日，值祀历代帝王庙斋期，驾还宫不作乐。”^②

视学当天，雍正皇帝按照皇帝视学的规定程序，先到北京孔庙向孔子行释奠礼，然后到彝伦堂，在命祭酒塞楞额和王传进讲《大学》、司业彭维新进讲《尚书》之后，又亲自讲解儒家经典的含义，最后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新政，如：在崇圣祠从祀人员中增加先贤先儒；在五经博士中增加先贤先儒后裔；重新颁布各省官学招生人数，并进一步扩大部分学校的规模等一系列教育管理上的新措施。由于当天正值历代帝王庙祭祀的斋戒日期，雍正皇帝起驾回宫时没有奏乐。由此看来，雍正颁发“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并不在此次视学的当天，而是在第二天。

“翼日，衍圣公次子，五经博士孔继溥、祭酒塞楞额等率五经博士、各氏后裔

及国子监官生表谢。命颁敕谕，勉励师生，赐宴于礼部。又赐衍圣公冠服，国子监及五经博士等袍服，诸生白金有差。观礼进士九十五人、举人二百七十五人、荫贡监生、八旗官学生千六百八十五人，并蒙恩赉臣。”^③

第二天，国子监师生在衍圣公次子、五经博士孔继溥和祭酒塞楞额等人的率领下向雍正皇帝谢恩，雍正皇帝为了勉励国子监师生、圣人后裔及监臣等官员，颁敕匾额，赐宴招待，赏赐冠服、袍服和白金等。所颁敕谕匾额即雍正皇帝圣谕，匾文内容旨在表明国家“尊崇儒学”的态度和“文治兴邦”的治国方略，要求国子监的各级学官严格管理监生，善于引导，也要求全体监生刻苦学习，虚心求教，戒除浮华，学业有成，报效国家，不辜负雍正皇帝兴办教育的初衷。

关于雍正皇帝此次亲诣国子监视学，雍正皇帝曾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即世宗宪皇帝《御制诣太学诗》：

礼乐牖民资大化，国家造士在斯文，
临雍观礼崇儒切，视学论经养俊殷，
济济桥门龙旆绕，雍雍璧水凤毛纷，
千官咸庆文明盛，还伫同风率土沂。^④

此外，还有很多朝廷高官和国子监师生在见证这一历史性场面之后也都撰写了诗文歌赋，如王项龄、励廷仪、张廷玉、朱轼、史貽直、汪逢、觉罗逢泰、蔡世远、彭维新、俞兆晟、窦启瑛、伊尔敦、钱陈群、徐本、励宗万、杨椿、帅念祖、尹继善、方苞、汪由敦等^⑤，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够领略当时巍巍壮观的场面。例如大学士王项龄在《圣驾诣学盛典庆成颂》序中如此赞道：“遵成宪，举鸿仪，天人协应，上下欢忻。唐虞时雍之治化，成周太和之气象，未有盛于此时者矣”^⑥。尚书励廷仪在《圣驾亲诣太学大礼庆成颂》序中描写雍正讲学的场面：“三千弟子，钦御座以仰瞻，亿万都人，拥桥门而观听”^⑦。尚书张廷玉则在其《圣驾亲诣太学大礼庆成颂》序中写道：“雍正二年春三月乙亥之朔，皇帝整法驾，

从百官，驻辇桥门，躬亲展祀。恻诚昭格，礼备乐和。乃御彝伦堂，命儒臣进讲《大学》、《虞书》。复宣圣训，崇奖儒先，嘉惠多士。”^①太子太傅朱轼在《圣主亲诣太学礼成诗》序中说：“殊荣异数，亘古未有。圜桥门而观听者万人，无不欢呼动地”^②。国子监司业彭维新也是此次盛大活动的见证者，他在其《圣驾亲诣太学大礼庆成诗》序文中说：“帝道光明，备展先师之礼，宫墙徧焕，筵俎聿新，玉珮垂垂，千官扈从，青衿济济，多士趋跄，感百兽舞而肃拜，广庭无思不服，值四门辟而仰瞻”^③，等等，种种记述兹不赘述。这些跟随雍正皇帝参与视学活动的见证者不仅是朝廷高官，甚至是历官三朝的老臣，而且也多是饱读经书的鸿儒。

雍正皇帝对于国子监教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多次赐书给国子监，《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五“经籍志”记载雍正皇帝赐书情况：雍正二年赐《圣谕广训》一卷，雍正三年赐《钦定清字大清律集解》三十卷、《总类》六卷，雍正四年赐《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雍正五年赐《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钦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雍正八年赐《上谕内阁》、《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雍正九年赐《大清会典》二百五十卷，雍正十年赐《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雍正十二年赐《御制文集》，雍正十三年赐从康熙六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年的《上谕八旗》和《上谕旗务议覆》，从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年的《谕行旗务奏议》^④。

孔庙是古代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学生践行尊孔崇儒的各种祭祀礼仪活动。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进一步加强孔庙祭祀礼仪活动的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颁发“御制追封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公册文”、“御制追封孔子高祖祈父公册文”、“御制追封孔子曾祖防叔公册文”、“御制追封孔子祖伯夏公册文”、“御制追封孔子叔梁公册文”，将启圣祠内奉祀的孔子先祖封号由“公”爵提升到“王”爵地位；颁发“御制文庙增定从祀告祭文”，“特

颁谕旨，博访廷臣，考自有周，逮于昭代，凡在传经之哲，咸跻从祀之班”^⑤，增补孔庙两庑从祀历代先贤先儒，进一步完善了儒学祭祀体系。为了表达他尊崇先师至圣的心愿，避讳孔子名号，下令内阁、九卿更改各省地名，“尔等会议，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⑥。雍正皇帝认为孔子诞辰日的活动不能与佛诞日相提并论，要求内阁大臣们更加虔诚肃静地对待，“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诞之期，亦应虔肃致敬。朕惟君师功德，恩被亿载，普天率土，尊亲之戴，永永不忘，而于诞日尤当加谨，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诞为比拟也。”^⑦雍正皇帝通过对孔庙祭祀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祭祀礼仪的规范管理，昭示他对于儒学的尊崇和国子监儒学教育的高度重视。

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匾文中所说“塞楞额”是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生于1686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为己丑科三甲第三十六名，授内阁中书，后历任翰林院侍讲，刑部郎中、会考府掌印郎中、少詹事、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刑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山东巡抚、户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内阁学士行走、镶蓝旗汉军副都统、直隶提督、陕西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等多个官职，一生仕途顺利，地位显耀。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去世之后，因违反朝大臣百日之内不得剃发的规定，被乾隆帝赐自缢而死。《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圣祖仁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圣训》等文献都有其相关事迹记载。雍正皇帝首次到国子监视学之时，塞楞额担任国子监祭酒，在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因为督导不力，延误了兴修曲阜文庙的工程，受到雍正皇帝的严厉指责，如《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三十二载：“塞楞额又复因循怠玩于后，以致工程迟滞，久未告成”。

匾文中提到的王传（1661—1725年），是国子监的另一位祭酒，《江西通志》卷九十记载：“王传，字绍薪，鄱阳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国子祭酒，丁外艰服，阋以母高年即请终养，家居十五载，养亲课子外，仍手一编。为人沉静，不可干以私，三校礼闱，俱称得士。乙未视学山左，尝曰：学臣清心寡欲不足异，所难者衡才不爽尺寸耳，优不滥俾中材，绝倖获心，劣不苛令，非才有容身地。人服其公平。雍正元年癸卯，特开恩科典试山左，时大旱，榜发，甘霖立沛，人称为‘霖雨榜’，所取中多老成名宿，又号‘先生榜’，复命后眷注优渥恩赉稠叠，御赐‘讲幄清班’四字匾额。年六十五，卒于官，雍正三年春予祭葬。”^⑤

王传于康熙辛未年（1691年）考中进士，始授职庶吉士，后升至国子监祭酒，父亲去世之后，即以母亲年事已高为由辞职回家。王传为人沉稳低调，刚正无私，深得朝野人士的敬重，曾经三次参与主持礼部的进士考试。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开设恩科取士，王传到山东主持考试，为朝廷选拔录取真才实学之士，回京后得到了雍正皇帝御赐“讲幄清班”御笔匾额。王传患病去世之后，葬于家乡，“国朝祭酒王传墓在鄱阳千秋乡。”^⑥雍正皇帝曾为王传钦赐御祭。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通常悬挂于宫室、殿堂、亭榭、书斋、楼阁、堂室等传统建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匾额起源于标记门户的题字，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匾额的制作通常要经过选料、切割、拼接、打磨、防腐、雕刻、填漆、抛光等工序，甚至还要使用烧结、镏金或贴金等装饰手法。精心挑选的材质、古朴的形制、精湛的书法以及精美的装饰等，使匾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匾额共计90块，按照匾额文字的涵义，可分为：

推崇孔子类、教谕劝学类、科举殊荣类、标记建筑类四种类型。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属于其中的教育劝学类，不仅是雍正皇帝重视儒学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优良传统的物质载体，值得我们珍藏、保护和传承。

①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34页。

②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356页。

③④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357页。

⑤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一、卷七十二，《艺文志》五，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36-1268页。

⑥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36页。

⑦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39页。

⑧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40、1241页。

⑨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42页。

⑩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53页。

⑪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145页。

⑫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4、15页。

⑬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5页。

⑭ [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6页。

⑮⑯ [清]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一百十，成文出版社，1989年。

（作者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馆员）

从雪山三期陶器看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异同

韩嘉谷

一、问题的提出

1961年发掘的雪山遗址三期遗存，是燕山以南地区最早确认的夏商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①，但关于它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却长期处在讨论之中。1978年邹衡先生将其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起归入的还有大厂大坨头遗址遗存，称为“燕山型”^②，以示与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区别。1979年李经汉先生改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使其分布范围和地理概念更相贴近^③。1987年张忠培先生等摒弃以燕山为座标的地理概念，按水系划分为“西辽河水系区遗存”和“海河北系区遗存”^④。1990年李伯谦先生又从类型学角度划分为药王庙、大坨头、壶流河三个类型^⑤。这些划分虽然名称有别，但有一点相同，即都把燕山南麓的这类遗存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地区之间的文化异同逐步变得清晰，对燕山南北两类夏商时期青铜文化遗存的关系出现了新的提法。笔者于1982年指出，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特征、器物组合各具特点，各有明确的分布范围，文化渊源和受到相邻文化的影响也不一样，因此燕山南北应是“两个彼此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圈”^⑥。1984年李经汉先生在蓟县围坊遗址的发掘报告中，也改变“燕南类型”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看法，认为是“分布在京津唐地区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⑦1988年吴鹏先生提出燕南、燕北两地夏商时期

考古文化的共性是次要的，差别是主要的，燕南地区相应文化应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独立出来，命名为“围坊第二期文化”^⑧。

1989年笔者根据大厂大坨头遗址发现时间较早、堆积单纯和文化特征清晰的特点，提出命名为大坨头文化^⑨。1993年王立新先生等亦认为，西辽河水系区和海河北系区“不仅在典型器物的种类与出土比例上差异悬殊，更为重要的是两者构成了有自身演变关系的不同器物组合，海河北系区遗存从基本陶器组合的变异程度上，已然游离于西辽河水系区夏家店文化主体特征之外”^⑩，“燕山南北的这两种遗存是渊源有自，并行发展、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⑪2007年李伯谦先生在为《昌平张营》发掘报告撰写的“序”中，也认为“《报告》将张营一类遗存归入大坨头文化，而不采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或大坨头类型的说法，是建立在对其文化内涵定量分析基础之上的，具有更充分的说服力。”^⑫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把原先称作“燕南型”、“大坨头类型”或“海河北系区”的遗存，独立为大坨头文化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⑬。不过把燕山南北夏商时期青铜文化统一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张仍然存在。赵宾福先生认为：“燕山以南壶流河、海河流域和燕山以北辽西山地地区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面貌大同小异……赞同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分为‘西辽河水系区’（药王庙类型）和‘海河北系区’（大坨头类型和壶流河类型）两个小区、三个类型的观点。”^⑭段天璟先

生认为,“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具有多重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受到了先商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其内部仍存留着土著文化的传统,但其主体特征属夏家店下层文化。”^⑩陈平先生认为:“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地方类型的划分,以李伯谦先生的药王庙、大坨头、壶流河三大类型……最为完备而科学。”^⑪有的研究论文或发掘报告仍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或“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名称称呼此类遗存^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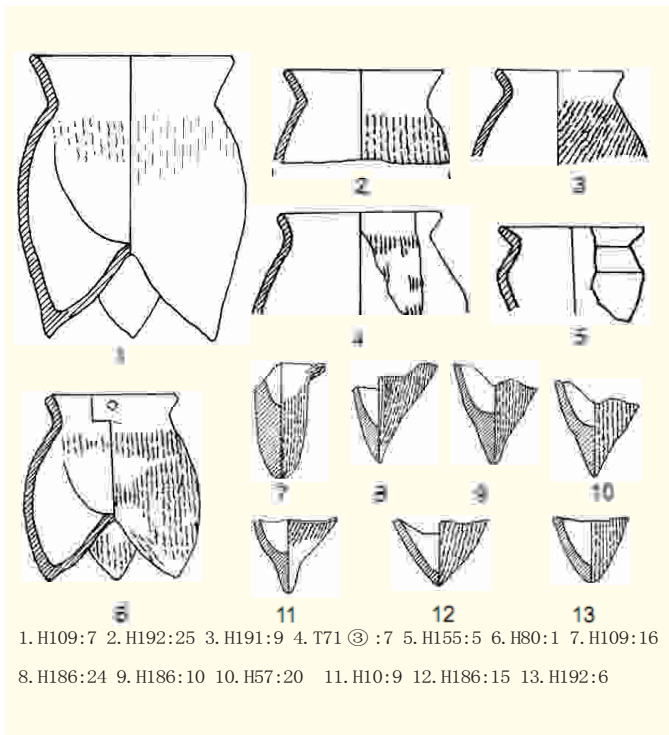
分歧依然存在,问题需继续讨论。雪山三期是燕山南麓最早被确认的夏商时期青铜文化遗存,此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从遗存的发现开始的,只是由于原先的发掘材料被毁,报告未能发表,所以雪山三期的名字虽然在讨论中经常被提及,可是却一直没有真正参与,甚至还被误解^⑬。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不只在厘清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夏商时期燕山南北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源流演变、碰撞交融,以及和此相关联的氏族集团分布、迁徙、势力消长等一系列问题,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笔者曾参加1961年雪山遗址发掘,保存有发掘后初步整理时绘制的器物图像,基本上能反映雪山三期文化面貌,对问题的讨论应有参考价值,故提出参与讨论,亦聊以弥补出土文物被毁而造成的损失。

二、雪山三期陶器

雪山三期陶器分居住址和墓葬两部分,另有少量采集品。

1. 居住址陶器

有鬲、盆、钵、罐、瓮、钵、碗、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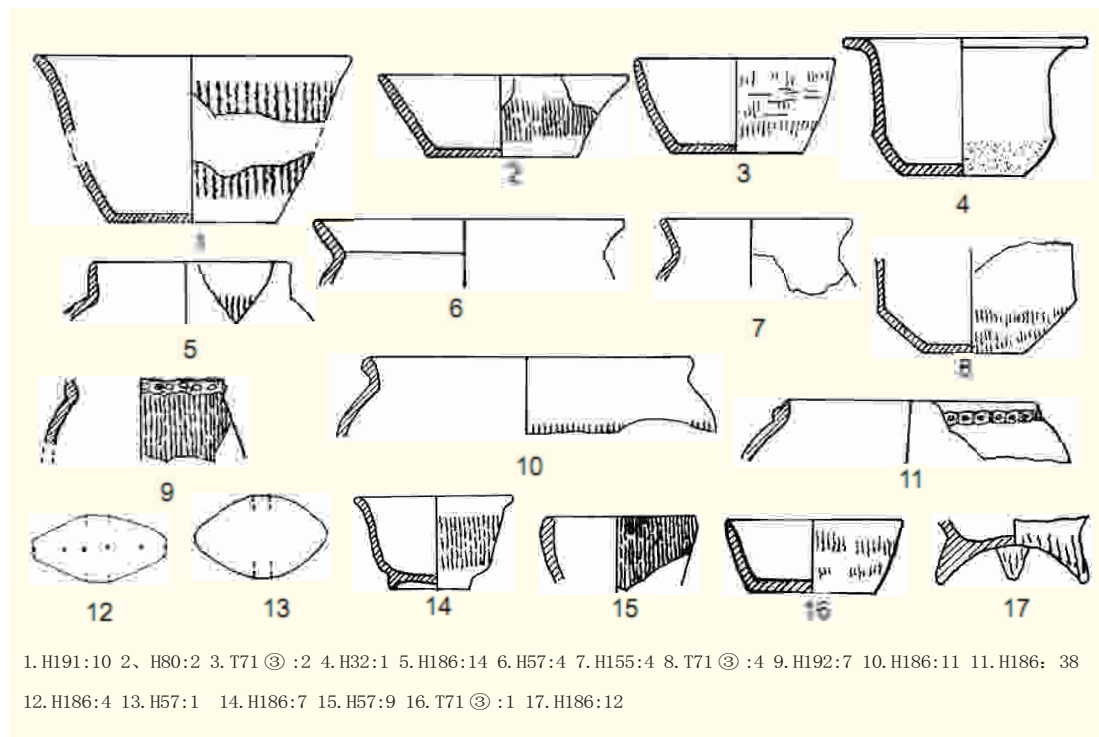


图一 雪山三期居住址出土陶鬲

鼎、纺轮等。

鬲有鼓腹鬲、折肩鬲两种。鼓腹鬲出土数量较多,形制有较大变化。H109:7尖圆唇,折沿外侈,鼓腹,有不明实足跟,器表有括平痕迹,着褐色陶衣,内壁上部有浅绳纹痕迹,口径20、腹径21.6、高28厘米(图一,1)。H192:25折沿外侈,圆唇,圆肩,口径15、残高9.5厘米,饰细绳纹(图一,2)。H191:9方圆唇,卷沿外侈,溜肩,口径12、残高8.5厘米,绳纹略粗(图一,3)。T71 ③:7方圆唇,卷沿外侈,溜肩,口径14.5、残高10.5厘米,饰断续细绳纹(图一,4)。H80:1方圆唇,卷沿外侈,圆肩,肥袋足无实足跟,口径13、腹径17.5、高18.5厘米,沿缘外侧有三个乳突纽,腹部饰略呈间断的细绳纹,内壁上部亦有绳纹痕迹(图一,6)。另有多件鬲足,形状不一(图一,8~13)。

折肩鬲1件,H155:5口部残片,圆唇,卷沿外侈,折肩,器表磨光,着黑陶衣,口径13、残高9厘米(图一,5)。



1. H191:10 2. H80:2 3. T71 ③ :2 4. H32:1 5. H186:14 6. H57:4 7. H155:4 8. T71 ③ :4 9. H192:7 10. H186:11 11. H186: 38
12. H186:4 13. H57:1 14. H186:7 15. H57:9 16. T71 ③ :1 17. H186:12

图二 雪山三期居住址出土陶器

盆有敞口深腹盆和折腹盆两种。敞口深腹盆 H191: 10, 为同一器物上下部残片, 口径 30、底径 11.2 厘米, 圆唇深腹, 夹粗砂, 饰粗绳纹(图二, 1)。

折腹盆 2 件。H32: 1 夹细砂, 着黑陶衣, 圆唇外翻, 筒形腹表面磨光, 下部折收, 表面粗糙, 小平底, 口径 16、腹径 12、底径 8、高 9.5 厘米(图二, 4)。T71 ③: 4 为腹部残片, 腹部磨光, 着黑陶衣, 折腹内收饰细绳纹, 腹径 19.5、底径 10 厘米(图二, 8)。

罐 3 件, 形制不一。H155: 4 口部残片, 夹砂褐陶素面, 尖圆唇, 折沿外侈, 口径 17、残高 9 厘米(图二, 7)。H57: 4 口沿残片, 夹砂褐陶素面, 尖圆唇, 折沿外侈, 口径 30 厘米(图二, 6)。H186: 14 口部残片, 夹砂褐陶素面, 尖圆唇, 立领, 肩部以下饰绳纹, 口径 16 厘米(图二, 5)。

瓮 2 件。H186: 11 口部残片, 夹砂黑陶, 卷沿外翻, 圆唇, 圆肩, 肩以下饰绳纹,

口径 30 厘米(图二, 10)。H186: 38 口部残片, 夹砂褐陶素面, 圆唇矮领, 沿外有附加堆纹, 口径 20 厘米(图二, 11)。

甗 1 件, H192: 7 甗腰残片, 直径 14 厘米, 夹砂褐陶, 接合处有泥条附加堆纹, 捺印小窝, 器身饰细绳纹(图二, 9)。

鼎 1 件, H186: 12 残片, 平底下三锥形实足, 腹部素面, 足部有细绳纹(图二 17)。

钵 3 件, 皆敞口浅腹平底。H80: 2 泥质灰黑陶, 尖圆唇, 腹部饰细绳纹, 口径 21、底径 13、高 7 厘米(图二, 2)。T71 ③: 2 泥质灰陶, 饰断续细绳纹, 口径 16、底径 10.5、高 7.5 厘米(图二, 3)。T71 ③: 1 泥质红褐陶, 饰细绳纹, 口径 12、底径 9、高 5.5 厘米(图二, 16)。

碗 1 件, H186: 7 夹砂灰陶, 圆唇、斜直腹、平底、矮圈足, 饰绳纹, 口径 11、底径 6、高 6.5 厘米(图二, 14)。

小杯 1 件。H57: 9 残片, 夹砂黑褐陶,

圆唇敛口收腹，口径 5.8、残高 6.5 厘米，饰细绳纹（图二，15）。

纺轮 2 件，皆算珠状。H186：4 泥质红陶，素面，周边饰小窝点，直径 3.5、厚 1.8、孔径 1.2 厘米（图二，12）。H57：1 泥质褐陶，磨光素面，直径 3.4、厚 2.2、孔径 0.9 厘米（图二，13）。

2. 墓葬陶器

有鬲、盆、罐、钵、鼎、盂等。

鬲 2 件，皆为折肩鬲。M11：5 夹砂黑陶磨光，圆唇，卷沿外侈，折肩，锥形袋足，原有彩绘脱落，口径 14、腹径 16、高 15 厘米（图三，1）。M11：6 形制略同，泥质灰陶，有红色几何形纹彩绘，口径 11、腹径 14、高 12 厘米（图三，2）。

盆，都为折腹盆，少数形制有较大变化。典型折腹盆 5 件，均宽沿外翻，圆唇，筒形腹，折腹内收，小平底，素面或磨光，着黑色陶衣。M42：1 口径 24、底径 13、高 16 厘米，折腹下饰断续细绳纹（图三，11）。M42：2 口径 26、底径 11、高 15.5 厘米，腹部有绳纹抹平痕迹，下部饰断续细绳纹（图三，

12）。M39：2 口径 25、底径 10、高 17.5 厘米，折腹下饰细绳纹（图三，13）。M39：3 口径 29、底径 10、高 15 厘米，折腹下饰细绳纹（图三，14）。M16：3 口径 23、底径 12、高 13 厘米，宽沿外翻较平，筒腹较直，折腹有棱角，下腹部饰断续细绳纹（图三，20）。M11：7 下腹部呈弧形内收，失折腹的基本特征，下部饰细绳纹，口径 24、底径 9.5、高 15.5 厘米（图三，10）。

罐 6 件，可分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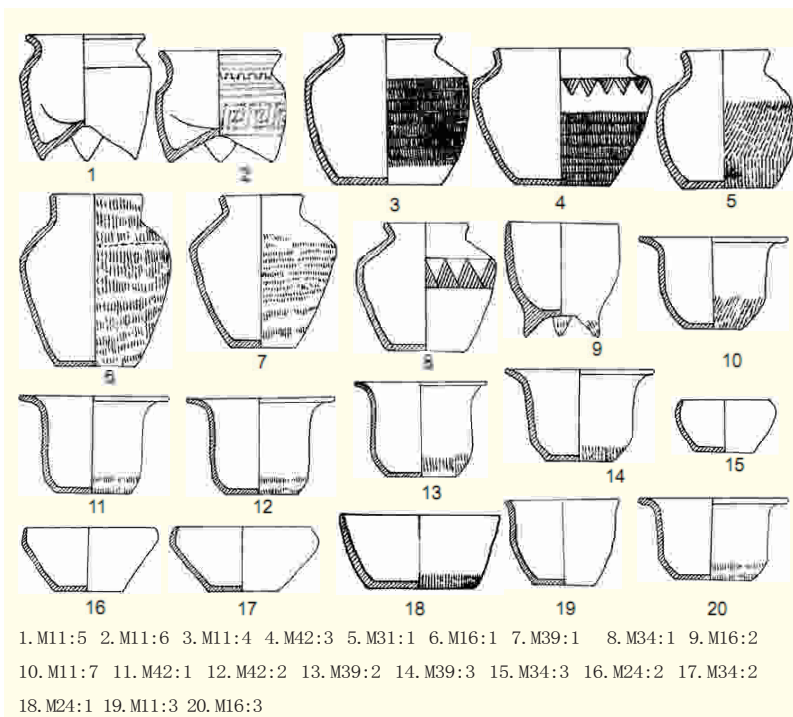
肩和圆肩两类。

折肩罐 3 件，侈沿，折肩，深腹，平底。M42：3 夹细砂着黑陶衣，卷沿略侈，方圆唇，肩部磨光，饰三角划纹一周，腹部饰细绳纹间横划纹（图三，4）。M11：4 泥质灰陶，侈沿方圆唇，腹部饰细绳纹间横划纹，口径 14.5、腹径 21.5、底径 14.5、高 20 厘米（图三，3）。M39：1 夹细砂黑陶，肩部磨光，圆唇直口略侈，肩斜直，腹部饰细绳纹间横划纹，口径 12、腹径 22、底径 9.5、高 26 厘米（图三，7）。

圆肩罐 3 件，M16：1 夹砂褐陶，直口圆唇，深腹，小平底，通体饰断续细绳纹，口径 11、腹径 22、底径 8、高 25.5 厘米（图三，6）。M34：1 夹砂灰褐陶，圆唇侈沿，圆肩下饰一周三角划纹，口径 9.5、腹径 16、底径 9.2、高 14.5 厘米（图三，8）。M31：1 夹砂灰陶，矮颈略侈，圆唇，鼓腹，腹部饰细绳纹，口径 9.5、腹径 14、底径 10、高 16 厘米（图三，5）。

钵 4 件，有敞口、敛口两种。

敞口钵 1 件，M24：1 泥质黑陶，圆



图三 雪山三期墓葬出土陶器

唇，敞口，斜直腹，平底，上部磨光，下部近底处饰细绳纹，口径 18、底径 12、高 11.5 厘米（图三，18）。

敛口钵 3 件，泥质或夹细砂，圆唇，敛口，收腹，平底，皆素面。M34：2 泥质黑陶，口径 16、底径 9、高 7.5 厘米（图三，17）。M24：2 夹细砂黑陶，磨光，口径 14、底径 12、高 13.5 厘米（图三，16）。M34：3 夹细砂黑陶磨光，口径 12、底径 8、高 6.7 厘米（图三，15）。

鼎 1 件，M16：2 夹砂黑陶，圆唇，直口，深腹，圜底，下有三实足，器表磨光，底和足部有细绳纹。口径 14.5、腹径 15、通高 15.5 厘米（图三，9）。

盂 1 件，M11：3 口径 14、底径 10.5、高 15 厘米，泥质灰陶素面，圆唇深腹，口略侈，下腹部内收，器表有刮平痕迹，在形状和器表处理上和折腹盆相近（图三，19）。

3. 采集陶器

共 3 件，有鼓腹鬲和折肩鬲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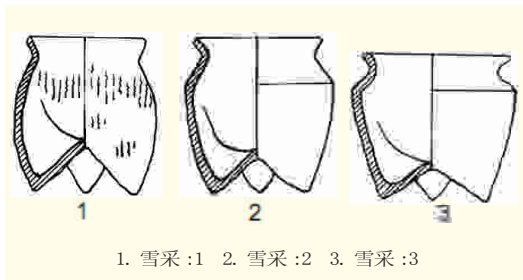
鼓腹鬲 1 件，雪采：1 泥质灰陶，圆唇，侈沿，鼓腹，袋足略肥，器表绳纹抹平，器内有绳纹痕迹。口径 10.5、腹径 12、高 14 厘米（图四，1）。

折肩鬲 2 件。雪采：2 夹细砂灰陶，方圆唇侈沿，折肩，锥形袋足，口径 12.5、腹径 14.5、高 16 厘米（图四，2）。雪采：3 夹细砂，卷沿外侈方圆唇，着黑陶衣磨光，口径 13.5、腹径 15、高 14.5 厘米（图四，3）。

三、谱系源流及其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异同

上述即是 1961 年发掘获得的雪山三期陶器，出土至今已五十多年，在此期间不仅又有大量和此相似或相关的遗存发现，同时还有许多研究论著发表，为讨论此陶器群的文化性质提供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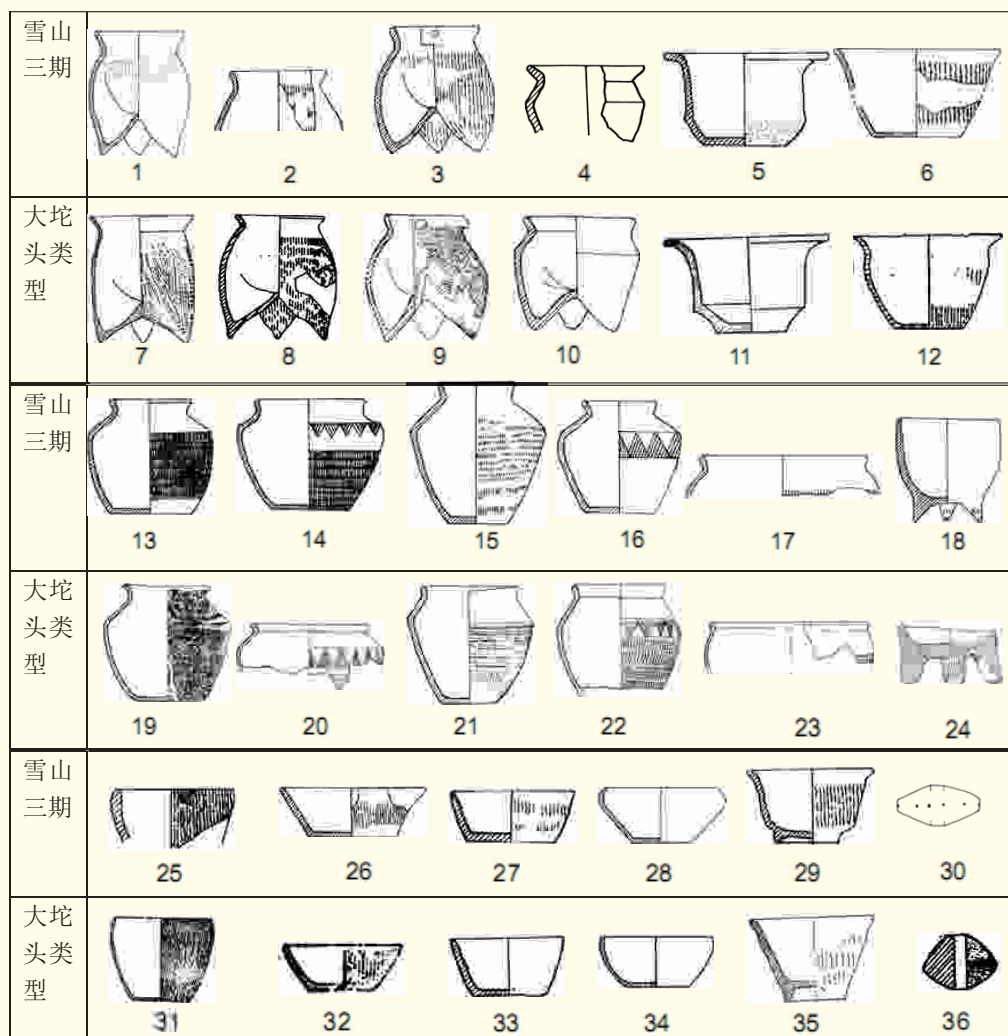
将雪山三期陶器和周围相似或相关遗存相比较，无疑和大坨头文化的大坨头类



图四 雪山三期采集陶器

型相似度最高。大坨头类型遗存，目前所见居住址主要有蓟县围坊^①、张家园^②、大厂大坨头^③、宝坻牛道口^④、歇马台^⑤、昌平张营^⑥等，常见陶器有鬲（包括鼓腹鬲和折肩鬲）、无腰隔甗、盆（敞口盆和折腹盆）、罐、瓮、钵和算盘珠状纺轮等。墓葬有香河庆功台^⑦、平谷刘家河^⑧、昌平张营等，常见陶器有折腹盆、折肩鬲、折肩罐、钵等。雪山三期出土陶器，无论遗址或墓葬，在器类组合或形制特征上，都和大坨头类型相一致，雪山三期属大坨头类型无疑（图五）。但细析此类遗存在各遗址和墓葬的出土情况，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不同遗址因遗存年代参差或部分文化因素有无而呈现差异，较明显的是年代较晚的张营遗址，有学者认为是和大坨头类型有别的又一个“大坨头文化地方类型”^⑨。又如在大坨头类型分布范围内，密云凤凰山^⑩、房山琉璃河^⑪墓葬出土的陶器，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特征，与大坨头类型格格不入，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也需搞清。最主要的还是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大同小异”，涉及雪山三期遗存的最后考古学文化归属。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陶器之间的相同和相异成分，已有许多研究文章论及，不再赘述。本文仅就雪山遗址的堆积特点，以雪山二期和雪山三期出土陶器为起点，追索大坨头文化形成发展的谱系源流，厘析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异同。雪山遗址堆积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具体提供了雪山二期和雪山三期的关系。雪山二期属龙山文化，邹衡先生早有论述，称其



1. 雪山 H109:7 2. 雪山 T71 ③ :7 3. 雪山 H80:1 4. 雪山 H155:5 5. 雪山 H32:1 6. 雪山 H191:10 7. 围坊 T2 ③ :9
8. 大坨头 H2:14 9. 张营 T3 ⑥ :2 10. 张营 T79:55 11. 张家园 64T2 ④ :3 12. 张家园 79T1 ③ :8 13. 雪山 M11:4
14. 雪山 M42:3 15. 雪山 M39:1 16. 雪山 M34:1 17. 雪山 H186:17 18. 雪山 M16:2 19. 张营 M6:6 20. 张营 M13:19
21. 张营 M6:10 22. 张营 T3 ④ :6 23. 张营 T0303 ⑤ :3 24. 张营 H105:6 25. 雪山 H57:9 26. 雪山 H80:2 27. 雪山 T71 ③ :1
28. 雪山 M34:3 29. 雪山 H186:7 30. 雪山 H186:4 31. 张家园 79T2 ② :2 32. 张家园 87F1:2 33. 围坊 T1 ③ :40
34. 张家园 79T ② :14 35. 张家园 64T4 ③ 36. 围坊 T4 ③ :4

图五 雪山三期和大坨头类型陶器

为龙山文化雪山型^⑧。随着相关资料逐渐披露，其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已十分清楚，这是一支十分典型的龙山文化，具有中原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尤以后岗类型因素最为突出，同时还包含有一些晋陕地区和

山东西部地区龙山文化因素^⑨。这些因素和雪山二期有着基本区别，如鬻耳鬲、斝、盃、篮纹和方格纹罐、盆、瓦足盘、双腹盆等龙山文化标志性器物，在雪山二期皆不见。但由于雪山三期对雪山二期有传承

关系，因此陶器群又表现出较多相似因素，如雪山二期的H66灰坑出土的H66④：9鬲，和雪山三期的H109：7鬲十分接近便是一例。有学者认为此鬲“明显出现了腹腔，其形态与张家园F4：1鬲已十分接近，因此‘雪山二期文化’以H66④：9鬲为代表的有关遗存应从龙山时期遗存中划分出来，根据类型学的比较，这种遗存的年代与张家园F4大体相当。”^⑩这显然是在不了解H66出土遗物全貌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不足为凭。而且正是由于H66④：9鬲和H109：7鬲的相似，透露出了雪山三期孕育于雪山二期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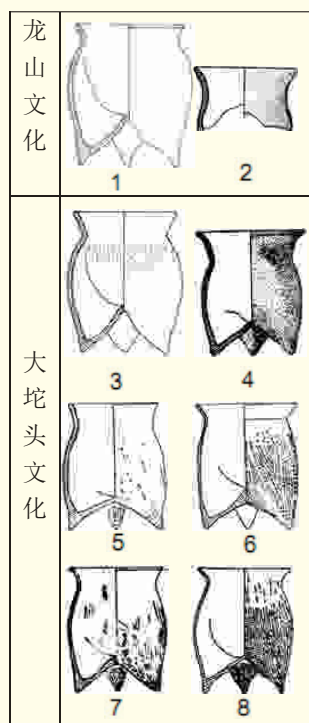
像H66④：9和H109：7那样的鼓腹鬲，在龙山文化和大坨头文化都不是孤例，属于龙山文化的还有镇江营FZH700：8鬲^⑪，属于大坨头文化的还有宝坨牛道口T2⑤：1鬲，这两处遗址都兼含龙山文化和大坨头文化堆积，显示出龙山文化和大坨头文化之间传承关系的普遍性。在大坨头文化中，虽然和雪山H109：7、牛道口T2⑤：1那样器表作素面处理的鼓腹鬲所见不多，但另有一批鼓腹鬲造型和此相似，只是器表饰断续细绳纹而显得风格略异。如围坊T2③：9、T3③：13、张家园79T1③：3、张家园87H1：1等，共同特点是器身较高，略敛口，折沿外侈较宽，鼓腹不突出，锥形袋足有实足跟。其实这些鼓腹鬲所饰的断续细绳纹，在雪山二期龙山文化中亦屡见不鲜，H66出土的陶鬲H66④：233、陶罐H66：33、36、44、37等都是这种纹饰，只是到大坨头类型更为普遍而已，可认为这种风格的绳纹也应是雪山三期对雪山二期的传承因素。这些鼓腹鬲在大坨头类型地层中都处较早层位，多数和龙山文化直接叠压，张家园、牛道口、雪山遗址都有明确的龙山文化堆积，围坊遗址报告没有提到龙山文化，但在其一期遗存的第4层出土物中，像杯形器（T9④：7）、篮纹器耳（T9④：8）等，都有明显的龙山文化色彩，说明这些鼓腹鬲和雪山H109：7、牛道口T2⑤：1一样，与龙山文化关系密切，

并且年代也应相去不远（图六）。

大坨头文化中另有一种鼓腹鬲，形制和上述鼓腹鬲相似，但袋足下有较高的柱状实足跟，如房山塔照商周第一期的FTH92：25鬲。这种鼓腹鬲也源自龙山文化，具体例子是雪山H66④：233鬲。这种鬲在大坨头类型出土不多，大坨头灰坑H2出土一件（H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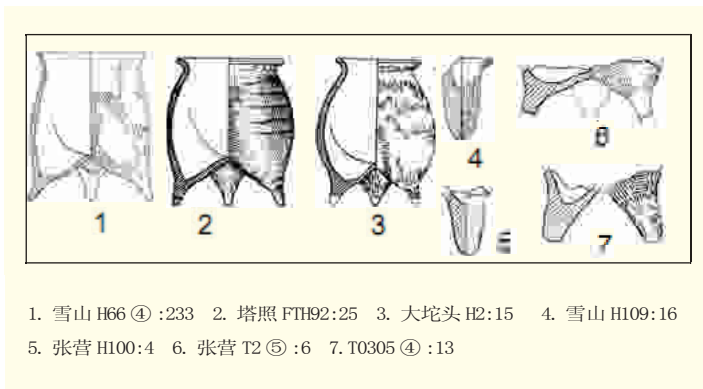
基本完整，共存器物年代稍晚。此种鬲的鬲足出土颇多，雪山H109：16和H109：7鬲共出，年代应较早，围坊T4③：10和此略同。较晚的有张营H100：4、T2⑤：6、T0305④：13等，表明这种鬲在大坨头类型早晚都有分布，只是没有锥形袋足鼓腹鬲那样流行（图七）。

除鼓腹鬲外，雪山三期的其它一些陶器也可直接在雪山二期或其它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找到相同或相似形式，如折腹盆见于任邱哑叭庄第一期文化（H7：6、7）^⑫、永年台口^⑬、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四期遗存（FZH1012：16）等，折肩鬲和敛口钵见于邯郸涧沟^⑭，无腰隔甗的造型和雪山二期一致。雪山二期的有些器物虽然在雪山三期



1. 雪山H66④：9 2. 镇江营FZH700：8
3. 雪山H109：7 4. 牛道口T2⑤：1
5. 围坊T2③：9 6. 围坊T3③：13 7. 张家园87H1：1 8. 张家园79T1③：3

图六 龙山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的锥形袋足鼓腹鬲



1. 雪山 H66 ④ :233 2. 塔照 FTH92:25 3. 大坨头 H2:15 4. 雪山 H109:16
5. 张营 H100:4 6. 张营 T2 ⑤ :6 7. T0305 ④ :13

图七 龙山文化和大坨头文化高实足鼓腹鬲

未见，但在其他遗址的大坨头类型遗存中可见到，如盘形盆（H66: 94、91）见于张家园（79T2 ②: 12），多种形制的罐见于围坊（T3 ③: 19）和张家园（87F1: 4、87T48 ②: 2）等（图八）。这些陶器和上述鼓腹鬲一起，构成大坨头类型陶器的基本器类组合。由于这些陶器中有一部分出土在略晚地层，因此不能认为是大坨头类型陶器的早期组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坨头类型的早期陶器必定经过基本面貌和此相似的阶段，然后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发展成为中后期陶器组合^⑥。大坨头文化陶器植根于当地龙山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色彩^⑧。

脱胎于雪山型龙山文化的大坨头类型，在嗣后的发展中曾受到相邻地区不同文化的影响，但一直保持着独立的传统，这一点在核心器物鼓腹鬲的发展变化中有清晰表现。

梳理鼓腹鬲的发展变化脉络，有一些地层关系可作为区分器物早晚的依据，主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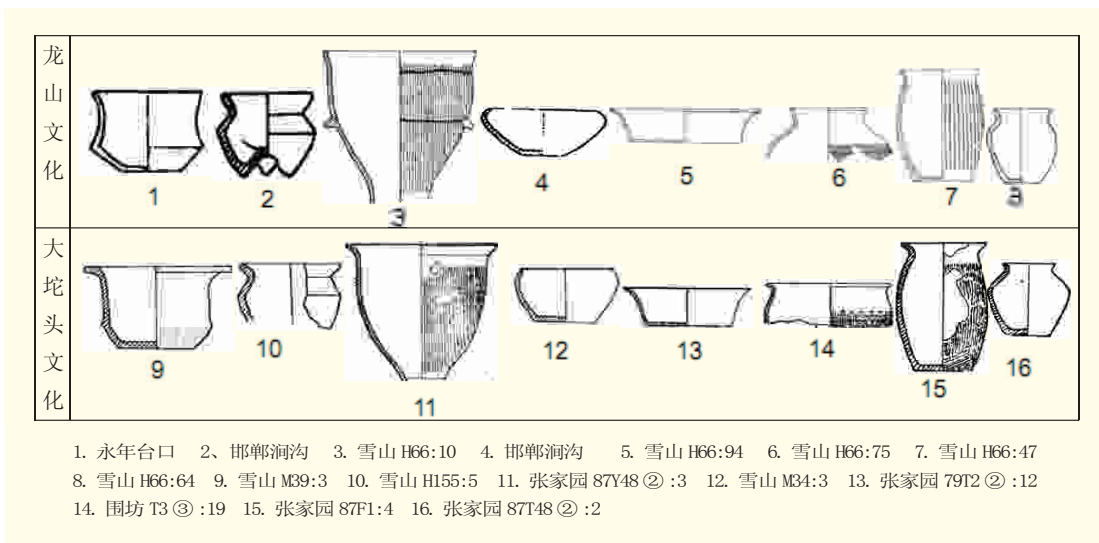
1. 围坊遗址出土鼓腹鬲六例，相关地层有灰坑 H2 开口在第 2 层下，故 T4H2: 2 鼓腹鬲应晚于前面说到的 T2 ③: 9 鼓腹鬲。

2. 1979 年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鼓腹鬲四例，地层为第 2 层叠压第 3 层，故 T2 ②: 8、T1 ②: 3 鼓腹鬲应晚于 79T1 ③: 3、T1 ③: 4 鼓腹鬲。

3. 1964 年大坨头遗址发掘，有鼓腹鬲三例，地层为 H1 打破 H2，故 H2: 14、H2: 15 两件鼓腹鬲应早于 H1: 5 等鼓腹鬲。

4. 1965 年张家园遗址第一次发掘有鼓腹鬲三例，分别属于灰坑 F4、第 4 层和第 2 层，故 F4: 1、T2 ④: 1、T3 ②三件陶鬲应有年代差别。

5. 1989 年和 2004 年发掘的张营遗址，报告公布鼓腹鬲资料约 50 余例，分别出土



1. 永年台口 2. 邯郸涧沟 3. 雪山 H66:10 4. 邯郸涧沟 5. 雪山 H66:94 6. 雪山 H66:75 7. 雪山 H66:47
8. 雪山 H66:64 9. 雪山 M39:3 10. 雪山 H155:5 11. 张家园 87Y48 ② :3 12. 雪山 M34:3 13. 张家园 79T2 ② :12
14. 围坊 T3 ③ :19 15. 张家园 87F1:4 16. 张家园 87T48 ② :2

图八 大坨头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

在依次叠压的第4、5、6层地层和房址、灰坑、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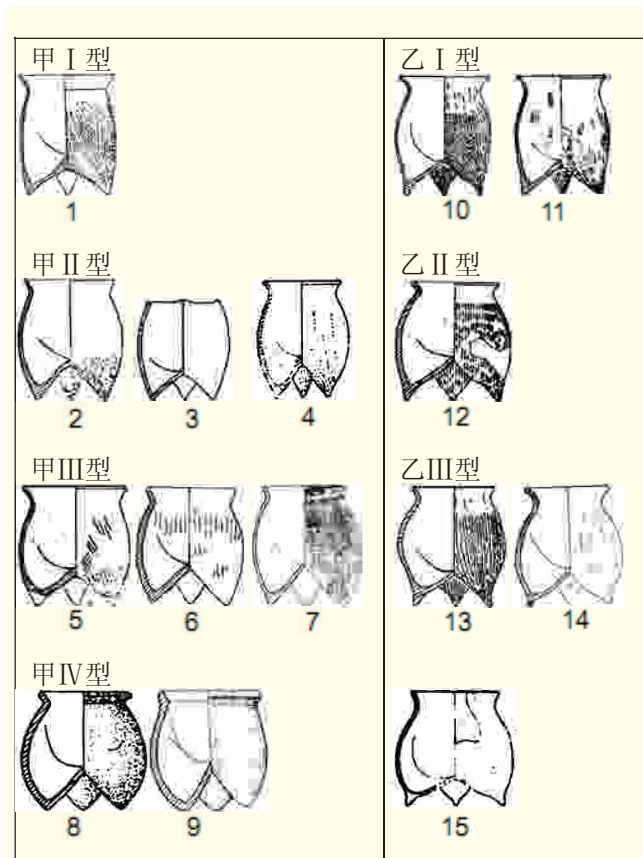
这些地层中涉及的主要是锥形袋足鼓腹鬲，早期阶段以地层上较早的围坊 T2③: 9、T3③: 13、张家园 79T1③: 3 等鬲为代表，形制和脱胎于龙山文化的雪山 H109: 7 鬲近似，但袋足细部特征有差别，围坊 T2③: 9 鬲的袋足和足跟之间无明确分界，而围坊 T3③: 13 鬲、张家园 79T1③: 3 鬲的袋足和实足跟分界明显，这两种袋足在嗣后的发展中不仅都有延续，而且各自形成体系，为叙述方便，故将其

分为二型，以前者为甲 I 型，后者为乙 I 型（图九）。

延续甲 I 型的甲 II 型，以围坊 T4H2: 2 鬲为代表，直接叠压在围坊 T2③: 9 鬲之上，和此形制相似的还有张家园 79T1②: 3、张家园 87 采: 3 等，造型和纹饰具有承袭甲 I 型的特点，但器形变小，口径明显小于腹径，鼓腹明显，袋足和实足跟浑然一体。此型陶鬲在大坨头文化中出土数量多，广泛见于大坨头类型以外的周围地区同时期遗存，如塔照 C、D 型鬲、易县下岳各庄（H23: 16、H23: 33）^⑧、庞家河（H1: 5）、任邱

啞叭庄（T74②B: 1、T65②A: 1）、前堡（F1: 7）^⑨、滦南东庄店（T2②: 54）^⑩等。其中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大坨头文化的类型，如塔照、东庄店（或称古冶类型）等，有的归属尚在讨论，如下岳各庄，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下七垣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⑪。不管类型如何划分，此型鬲的广泛传播充分显示出大坨头类型向周边扩展的势头，并形成了以此类型为主要特征的大坨头文化分布圈。

甲 III 型以张家园 87T25②: 1 鬲为代表，和甲 II 型相似，但袋足明显变肥，和此相似的还有雪山采: 1、张营 T12⑥: 1 鬲等。张家园 87T25②: 1 鬲和口沿有乳突状鬃耳的陶罐（87T25②: 2）共出，田广金先生认为此种陶罐是朱开沟文化代表性器物之一^⑫。张营 T12⑥: 1 鬲同地层出土有口沿带乳突状鬃耳的袋足鬲（T3⑥: 2），这种鬲也见于雪山（H80: 1）和涑水庞家河（H1: 5），其较早例子见于朱开沟遗址二段（T202④: 1）^⑬。有研究者将朱开沟遗存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早于乙组，甲组遗存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陕北和晋西北，乙组遗存较甲组偏北，



1. 围坊 T2③: 9 2. 围坊 T4H2: 2 3. 张家园 T1②: 3 4. 张家园 87 采: 1 5. 张家园 87T25②: 1 6. 雪山采: 1 7. 张营 T12⑥: 1 8. 大坨头 H1: 5 9. 张营 H100: 2 10. 张家园 79T3③: 3 11. 张家园 87H1: 1 12. 大坨头 H2: 14 13. 张家园 79T2②: 8 14. 张家园 65F4: 1 15. 张家园 87T18②: 1

图九 锥形袋足鬲的形制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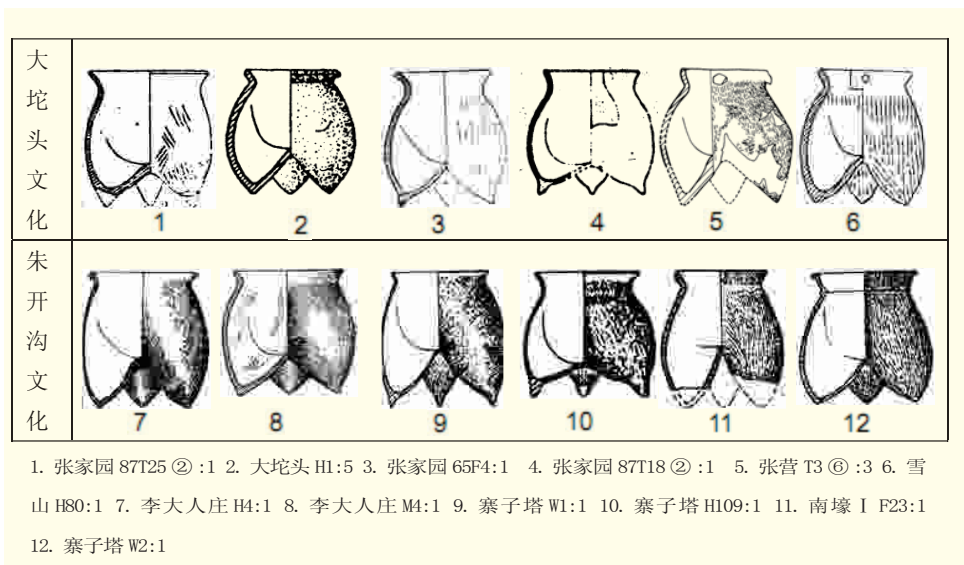
较多见于准格尔旗、凉城等地^④。这一分析是朱开沟文化研究的重要进展，显示出偏北地区的文化因素到朱开沟文化后期占有更大优势。属乙组朱开沟文化的准格尔旗南壕遗址^⑤出土的6件陶鬲，其中4件口沿上有此种鬲耳，其中IF23：1鬲造型尤其和张营T3^⑥：2、雪山H80：1鬲酷似，乳突状鬲耳的源头及发展趋势不言而喻。

甲IV型以大坨头H1：5、张营H100：2、T13^④：2等鬲为代表，袋足进一步变肥，实足跟消失，颇接近准格尔旗寨子塔^⑦、南壕和宣化李大大人庄^⑧等地出土的肥袋足鬲，表明甲III型时出现的朱开沟文化影响有增无减。大坨头H1和张营H100除出土肥袋足鬲外，还都出土折肩鬲，但张营H100出土陶器另有特点，除H100：2鬲口沿有波浪形花边外，H100：1鬲口沿不只有波浪形花边，还有乳突状鬲耳，H100：5鬲波浪形花边口沿下有矮领，后者既是朱开沟文化的因素，也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常见器物，大坨头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在此共存，表明以张营H100为代表的大坨头类型遗存，至此已进入到了从大坨头文化向围坊三期文化的转型期。

延续乙I型的鼓腹鬲是地层上和张家园79T1^③：3鬲直接叠压的张家园

79T2^②：8鬲，但形制差距较大，而大坨头H2：14鬲较为接近，故列大坨头H2：14鬲为乙II型，以张家园79T2^②：8鬲为乙III型。乙II型的特点是器高变矮，口径变小，鼓腹明显，但基本造型和张家园79T1^③：3鬲相近，和此鬲同出的陶器群可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列为乙III型的张家园79T2^②：8和张家园65F4：1鬲，特点是口径较小，鼓腹突出，袋足出现变肥趋势。乙IV型以张家园87T18^②：1鬲为代表，较乙III型略矮，肥袋足下三个锥形实足跟，易县下岳各庄H20：2鬲和此相似。这种形式的鬲在朱开沟文化乙组遗存的准格尔旗寨子塔出土最多，年代有早晚，分别接近乙III型和乙IV型两种形制，表明乙型鬲的变化也受到朱开沟乙组遗存的较大影响。

鼓腹鬲的发展变化过程，显示了大坨头类型形成发展的一个侧面，其基本特点是：第一阶段脱胎于当地龙山文化，因此较多呈现出与龙山文化相关联的特征；第二段开始形成大坨头文化特有的风格，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第三段开始受到朱开沟文化的影响，出现以袋足变肥为主要特征的变化倾向，同时出现的还有鬲、罐等口沿上的乳突状鬲耳，这种特征性标记也来自朱开沟文化；第四段时肥袋足鬲已和朱开沟乙组的肥袋足鬲颇近似（图十），同时又出现有朱开沟乙组的其它一些标志性因素，如花边口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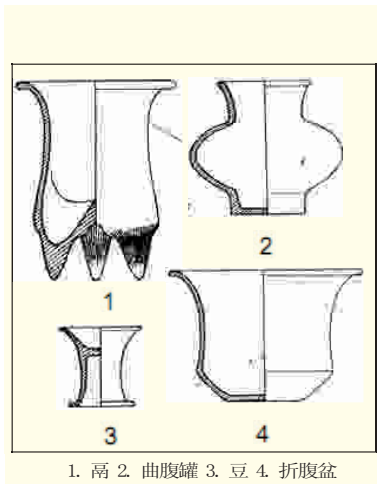
图十 大坨头类型和朱开沟乙组陶鬲比较

蛇形纹等，在大坨头类型晚期的张营二、三段流行。

来自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影响，除鼓腹鬲外还有其它一些例子，如张营晚期出现的有腰隔鬲（H34：1、89H19：2、T0504④：23、H62：10），和朱开沟文化陶鬲一致，平底鼎 H105：6 与神木新华遗址 99H4：16 鼎相近^④，张家园遗址的双耳罐也只能和西部地区的同类器物相联系。不过在此变化过程中，大坨头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改变，折腹盆、折肩鬲、无腰隔鬲等皆贯穿始终，即使是形制变化较大的鼓腹鬲，以其后期出现的大坨头 H1：5、张营 H100：2 鬲为例，在形制和器表处理上依然保持着大坨头文化的传统特色，与朱开沟乙组陶鬲有别。

在大坨头类型陶器中，确可看到大量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同的因素，如张家园的曲腹罐（65T2④：2）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雪山的鼎（H186：12、M16：2）和赤峰大甸子墓葬同类器物一致^⑤，大坨头 H1：8、张营 H58：6 等杯形三足器，和敖汉范杖子的 C 型鬲相同^⑥，庆功台墓葬出土和大甸子同样的钵形鼎（图十一）。凤凰山墓葬出土陶器，无论组合还是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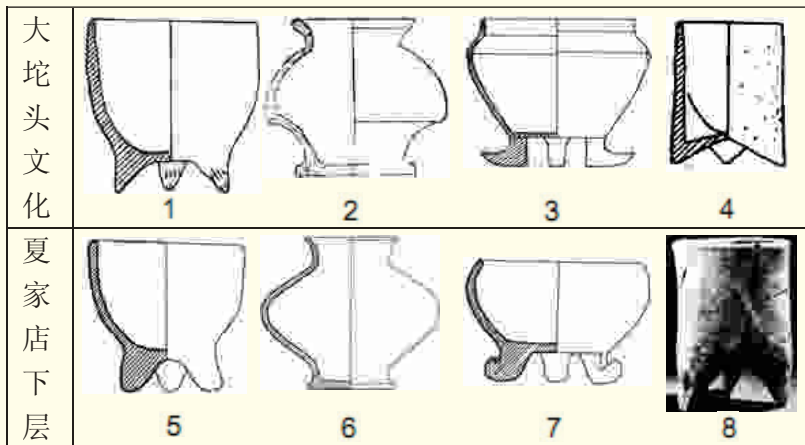
都具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特征（图十二）。当然最为突出的还是构成陶器群的基本器类，其中有许多器物，包括折腹盆、无腰



图十二 凤凰山墓葬陶器

隔鬲、折肩罐、深腹罐、深腹盆等，在大坨头类型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常见器物，形成文化面貌的“大同小异”。不过如果把这两支文化的形成过程，放到距今三四千年前燕山南北古文化演变的环境中作动态考察，便可发现这些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洞悉这两支文化的谱系区别。

雪山三期由龙山文化雪山二期孕育形成，在雪山二期龙山文化以前，这个地区分布的是和辽西地区小河沿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雪山一期遗存，根据其面貌特征，笔者认为将之看作小河沿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不为过^⑦。甚至有学者主张将此类遗存以雪山命名，并把小河沿文化也归入雪山一期文化^⑧。此说是否合适尚可讨论，但二者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的相似程度可见一斑，基本上属于辽西小河沿文化系统无疑。雪山二期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十分明确，和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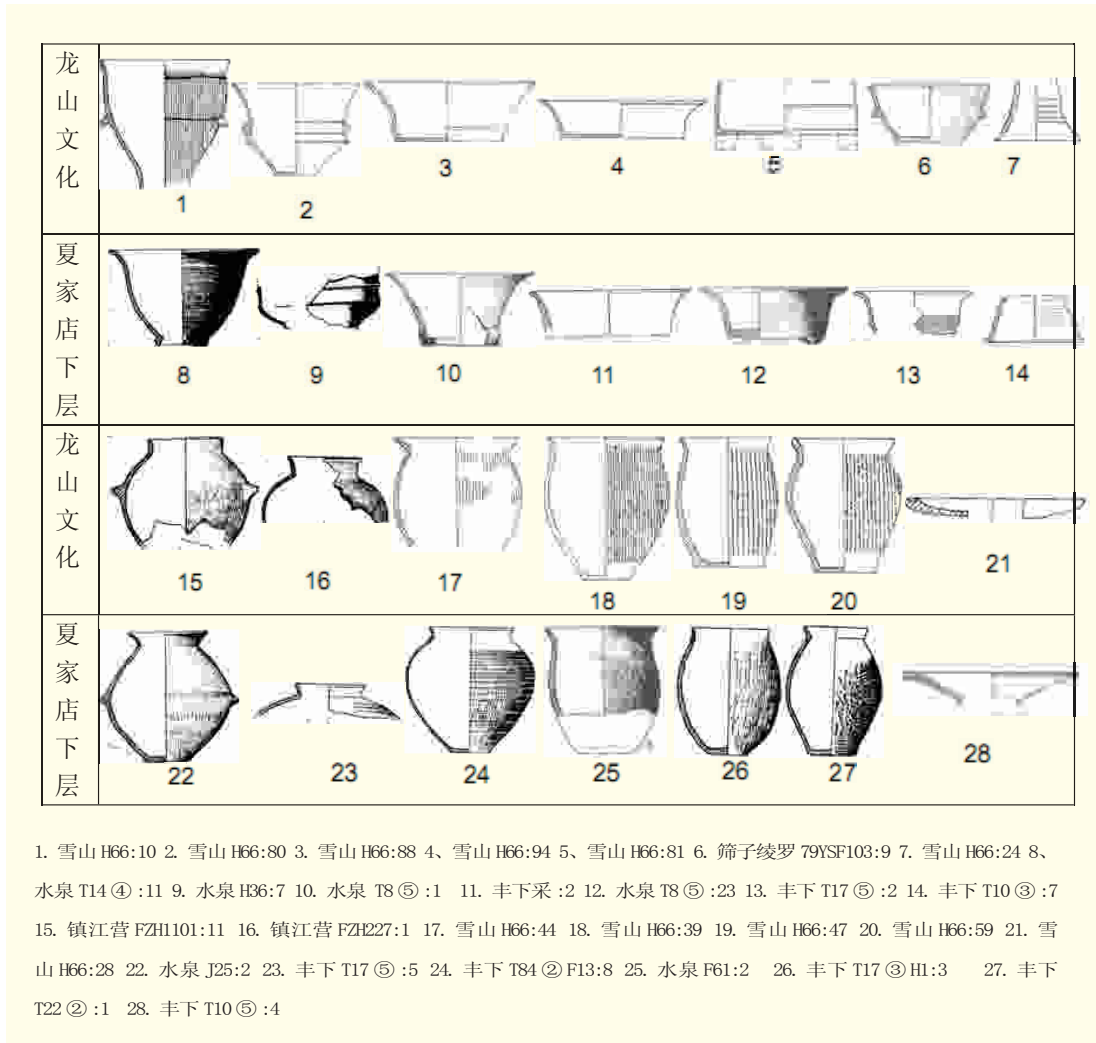
1. 雪山 M16:2 2. 张家园 65T2④:2 3. 庆功台 M1:10 4. 大坨头 H1:8 5. 大甸子 M321:1 6. 大甸子 M502:3 7. 大甸子 M816:2 8. 范杖子

图十一 大坨头类型中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一期谱系相异，由它取代雪山一期是不同谱系文化的更迭。从雪山一期经雪山二期到雪山三期，前后经历了三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二次性质不同的变化，雪山一期到雪山二期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更迭，雪山二期到雪山三期是传承性的文化蜕变。将此过程和辽西地区相比，便可发现在和此基本相同的时期内，两个地区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化明显不同，雪山一期和辽西小河沿文化相当，年代一致，可是到目前为止，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辽西地区，一直没有发现龙山文化遗存，直接取代小河沿文化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缺乏相当龙山文化雪山型这个阶段。所以郭大顺先

生认为：“辽西地区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存，应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最早阶段。”^⑤此说正确，问题是如何确定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阶段，及其和龙山文化、大坨头文化的关系。

察看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群，可以看到有大量器物 and 龙山文化雪山型相似，如无腰隔甗、瓦足盆、双腹盆、敞口浅腹盘、篮纹加划纹的大盆、篮纹双耳罐、深腹绳纹罐、浅盘豆、瓦棱圈足等（图十三），大多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包括北票丰下第5层^⑥、建平水泉下层^⑦、赤峰四分地^⑧等遗存。这些器物绝不见于辽西地区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却和燕



图十三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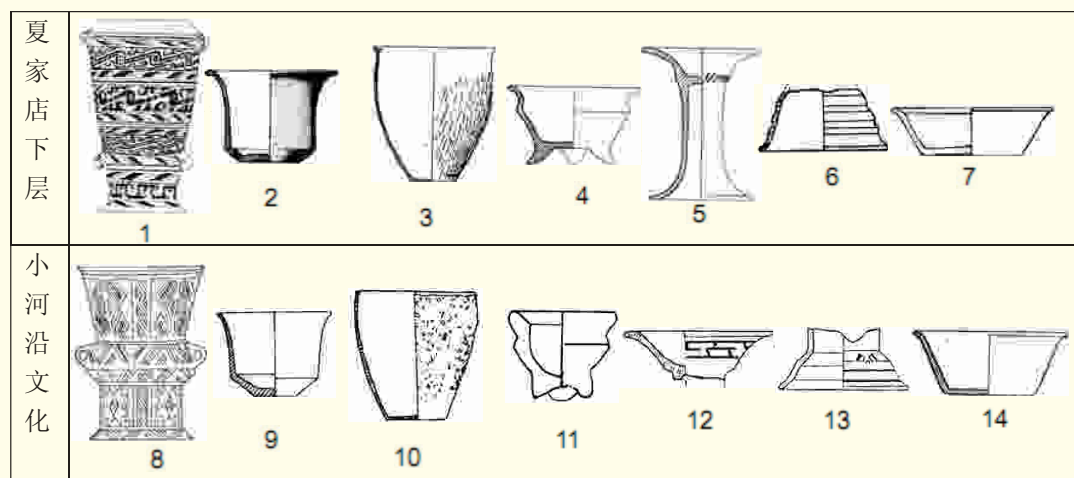
山以南的龙山文化陶器相同，说明其出现必和龙山文化有关。同时还可注意的是，其中有部分和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如瓦足盆、双腹盆、篮纹加划纹的大盆、篮纹双耳罐等，虽然见于龙山文化，但在脱胎于龙山文化的大坨头文化不见，表明这些器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之时尚存在，但到大坨头文化形成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只见于龙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而不见于大坨头文化的原因，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早于大坨头文化，在年代上确和雪山二期龙山文化部分相当。

但构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绝不仅仅只有和龙山文化相似的因素，王立新先生等全面分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多元谱系结构^⑧，举出了后岗二期文化、山东龙山——岳石文化、高台山文化、双坨子中层、羊头洼类型等多种成分，其中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后岗二期文化，即上面所说那些和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另一种是本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主要器物有折腹盆、钵形鼎、侈沿浅腹盆、浅盘高把豆等。有趣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器物之一筒腹鬲，在折腹盆下嫁接属龙山文化因素的三个袋足，生动体现出两个不同谱系文化的融合，夏家店下层文化即是由这样的模式形成。郭大顺先生说：“辽西地区从未发现过典型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表明，东北文化区为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融、保持和发展地区文化特色，提供了优良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不必再进行文化的替代。”^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正是基于这一广阔空间和悠久文化传统的东北文化区大环境。

不过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这支文化的谱系。据大甸子墓地的人种研究，其中一类居民可能与中原地区居民的关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但来自中原的居民在比例上要低于当地的原住民^⑩。由此便浮现这样一幕图景，在距今约四千年前，中原地区与后岗二期龙山文化相关的一支古文化，可能像历史传说中的共工氏^⑪那样

举族北上，在燕山南麓替代与辽西小河沿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雪山一期文化，形成以雪山一期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雪山型。同时又穿越燕山进入辽西，但遭到了该地区原住民的顽强抵制，虽然小河沿文化被冲垮了，可是在人口上占有优势的当地居民，仍然强韧地守护着当地固有文化传统，对新来的龙山文化只是部分地认同和接受，于是在原小河沿文化的分布区，出现了既非龙山文化、又非小河沿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正是这个原因，使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那些来自龙山文化的因素，在早期阶段特别突出，和脱胎于龙山文化的大坨头文化多有相似之处，成为两支文化间的“大同”，那些属于当地传统的因素和大坨头文化不同，成为“小异”。而正是这些“小异”成为这两支文化核心成分区分的标志，既不同于龙山文化，也不同于大坨头文化。原住民沿用小河沿文化的折腹盆，又用折腹盆嫁接袋足改造成鬲作为炊器，以拒绝使用龙山文化的鼓腹鬲，这两种器物都是陶器群核心，不仅在日常生活器皿中常见，同时也是墓葬的常见器物。墓葬中维系当地固有传统的色彩更加强烈，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的一件彩绘长筒罐（M713：7），和小河沿文化南台地墓葬出土的彩绘陶尊^⑫，从造型特征看应为同一类礼器，只是前者在折腹盆下又加一器座，两件器物都绘有繁缛的彩绘，显示出在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得到尊崇，具体体现前后礼制的承袭性。其他常见的随葬陶器如折腹盆、鼎、罐、豆等，也都是小河沿文化墓葬的常见器物，充分反映出外在文化形式包蕴下的内在文化心理，固有传统把前后两个文化紧紧相连，特有的文化谱系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与龙山文化、大坨头文化的区别明白无遗（图十四）。

夏家店下层文化先于大坨头文化形成，因此有学者认为大坨头文化是走向衰落的雪山二期文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影响下逐渐蜕变形成^⑬。此说和目前所见大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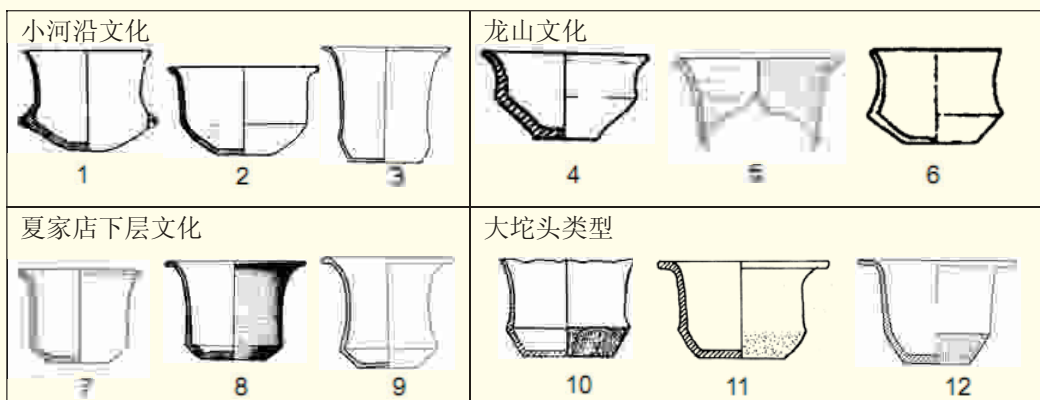
1. 大甸子 M713:7 2. 水泉 H49:1 3. 丰下 F13:8 4. 大甸子 M691:2 5. 大甸子 M472:1 6. 丰下 T10③:7 7. 白斯朗营子塔山 F1:11 8. 南台地 9. 石棚山 M23:7 10. 小河沿 H16:1 11. 三官甸子城子山采:1 12. 小河沿 T3:1 13. 小河沿 T1:2 14. 四分地 F11:8

图十四 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头类型陶器群的形成发展特征不符，因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那些属于辽西传统文化的器物，在大坨头类型较早阶段均不见，只见于稍晚阶段，如雪山遗址出土钵形鼎（H186:12）的灰坑 H186:15 年代较晚的肥型鬲足；出土曲腹罐的张家园 65T2 第 4 层，同出的 65T2④:1 陶鬲和较晚的张营第 4 层的 T0504④A:11、T0603④A:1 鬲相似，蒋刚先生也把这种曲腹罐归于大坨头文化五段分期的第四段^⑥。凤凰山墓葬出土的筒形鬲，杨建华先生认为“应排在三关之后”^⑦，蒋刚先生将其列在大坨头文化第四段，都是偏晚阶段。可见大坨头文化形成在先，夏家店下层文化影响在后，根本谈不上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影响下形成大坨头文化。不过这里需对折腹盆一项作必要解释，此类器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开始阶段都即出现，然而形制不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折腹盆上腹呈直筒形，源自小河沿文化的尊，见于赤峰大南沟石棚山（M32:11、M52:4）^⑧、四分地（F5:1）等遗址；大坨头文化的折腹盆上腹部外撇再内折呈尖角，如张家园 79T1③:5、围坊 T1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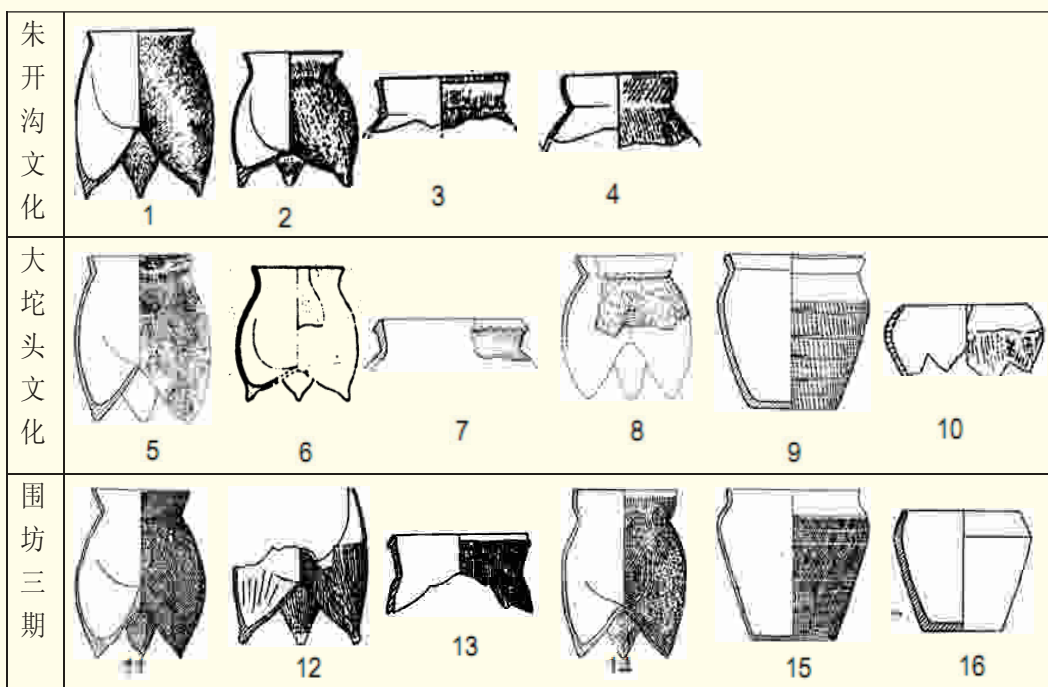
16 等，源自龙山文化，见于润沟、哑叭庄（H7:6）、镇江营（FZH1012:16）等遗址，二者各有源头。到大坨头文化稍晚阶段，折腹盆才开始多变成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相似的直筒形，如雪山 H32:1、张营 M6:5 等，应是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影响所致（图十五）。

大坨头类型后期同时受到来自西面朱开沟文化和北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两种影响的表现形式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不只有多种典型陶器，还有像凤凰山墓葬出土的典型陶器组合，筒形鬲虽然在大坨头类型诸遗址未见，可是在其它大坨头文化的方类型屡有出土，显示出进入大坨头文化分布区的迅猛势头。朱开沟文化则是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大坨头文化陶器逐渐变化，如鼓腹鬲袋足变肥，以及矮领花边口沿、乳突螭纽、蛇形纹等因素在大坨头类型晚期遗存中流行，甚至还出现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⑨，足见其强劲的影响力。大坨头类型晚期同时出现的这两种影响，都和当时发生的气候变化有关。朱开沟文化是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支古文化，



1. 大南沟石棚山 M32:11 2. 大南沟石棚山 M52:4 3. 四分地 F5:1 4. 哑叭庄 H7:6 5. 镇江营 FZH1012:16 6. 洞沟
7. 丰下 T17⑤:2 8. 水泉 H49:1 9. 大甸子 M377:28 10. 围坊 T1③:16 11. 雪山 H32:1 12. 张营 M6:5

图十五 两种不同来源的折腹盆



1. 寨子塔 W1:1 2. 寨子塔 H109:1 3. 寨子塔 T2①:1 4. 寨子塔 T2①:3 5. 张营 T12⑥:1 6. 张家园
87T18②:1 7. 张营 H100:5 8. 张营 H13:5 9. 张营 T13④:3 10. 围坊 T1③:19 11. 围坊 T5①:1 12. 围坊
T8②:7 13. 围坊 T8②:6 14. 围坊 T8②:5 15. 围坊 T5①:7 16. 围坊 T8②:4

图十六 朱开沟文化乙组、大坨头文化晚期和围坊三期文化陶器比较

一期遗存表现出晋陕高原龙山文化特征，从二期开始由于当地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冷，开始了经济生活从农业向农牧兼作转型。这种变化在长城地带都曾发生，但并不同步^⑥，当鄂尔多斯一带已进入转型过程的时候，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仍因相对暖湿而过着发达的农业经济生活^⑦。然而气候进一步恶化，到大坨头文化开始进入晚期阶段之时，夏家店下层文化被迫南移^⑧，致使燕山南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骤然增加。较早进入经济转型的朱开沟文化，随着农牧分界线南移亦向东向南扩大活动范围，在影响大坨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牧业对中原农区构成严重威胁。商朝政权试图用武力进行遏制，发动了一系列军事征伐，朱开沟遗址第五期出现的商墓，寨子塔第四阶段第三期出现早商陶器，蔚县夏商时期遗存第四段出现“酷似二里岗上层陶器”，张营遗址第三段出现中商阶段陶器，都应与商朝的遏制行动有关。然而商人只是取得了局部战役的短暂胜利，没有达到长期遏制目的，标志是作为朱开沟文化的花边鬲，此后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河北地区向南分布到唐河北岸的唐县洪城^⑨，山西柳林高红以花边鬲为标志的遗存竟出现城垣和宫殿建筑^⑩，足见其势力之强盛。燕山南北分别由魏营子文化^⑪取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由围坊三期文化^⑫取代大坨头文化，花边鬲也是这两支文化陶器群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只是此时朱开沟文化已经结束，花边鬲成为了广义上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相联系的陶器群代表性器物，沿长城地带东西分布，绵亘万里，显现万里长城出现以前的前长城文化带^⑬。

大坨头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基本如此，雪山二期和雪山三期的出土陶器显示出它的渊源，以鼓腹鬲为代表的陶器群展示其独立的发展过程。在龙山文化冲击小河沿文化后形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脱胎于龙山文化的大坨头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核心成分不同，开始的年代也不一样。

由于气候变冷，夏家店下层文化被迫南移，对大坨头文化后期产生较多影响，而真正推动大坨头文化向围坊三期文化转变的，是在适应气候变冷的经济转型中发展起来的朱开沟文化，比较朱开沟文化乙组、大坨头文化晚期和围坊三期文化的陶器，可清楚看到其变化的基本倾向和源泉所在（图十六）。

①向群：《在昌平县以西雪山山村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代遗址》，《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1日。

②③⑩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文化的初步认识》，《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张忠培、孔哲生、张文军、陈雍：《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⑧⑨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⑦⑪⑫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⑧吴鹏：《试论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兼谈燕南地区所谓“夏家店下层”性质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⑨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⑩王立新、齐晓光、夏保国：《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⑪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⑫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昌平张营“序”，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⑬⑭蒋刚：《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器文化的演进》，《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

⑭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六章“结语”，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⑮段天璟：《从塔照遗址看夏时期的燕山南部地区——夏时期燕山以南地区文化结构的形成》，《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⑯陈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综述》，《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2002年。

⑰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宝坻县歇马台遗址试掘报告》，《天津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⑱韩嘉谷：《昌平雪山H66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其它》，《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三辑。

⑲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7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⑳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㉒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宝坻县歇马台遗址试掘报告》，《天津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年。

㉓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文物春秋》1999年第6期。

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㉕杨建华、任小波：《北京昌平张营遗址青铜时代遗存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㉖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二编“青铜时代”，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㉗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㉘鲁琪、葛英会：《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78年第4期。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图九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韩嘉谷：《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

古》1993年第4期。韩嘉谷：《昌平雪山H66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其它》，《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三辑。

㉙张忠培、孔哲生、张文军、陈雍：《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赵宾福：《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㉛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㉜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2期。

㉝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㉞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年第4期。

㉟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㊱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㊲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滦南县东庄店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9期。

㊳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㊵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㊶王乐文：《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分析》，《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王乐文：《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

㊷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南壕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㊸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㊹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5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站：《敖汉旗范杖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⑦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⑧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⑨郭大顺：《丰下遗址陶器分期再认识》，《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⑩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⑪辽宁省博物馆等：《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宁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⑫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5期。

⑬王立新：《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源流及其与其它文化关系的再认识》，《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⑭郭大顺：《我对东北文化区的再认识》，《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⑮潘其凤：《大甸子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载《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⑯共工氏的传说故事充塞于“五帝时代”后期，内容多和夏代前夕由洪水引起的部落争斗有关。《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顷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帝王世纪》记：“尧流共工于幽州，以窜北狄。”《史记·五帝本纪》云：“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荀子·成相》云：“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括地志》“檀州燕乐县”下记：“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古老传云：舜流共工此域，居幽州。”唐燕乐县在今密云县。约是共工氏在争斗中失败，举族北迁。

⑰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2年。

⑱蒋刚：《燕山南麓夏至早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与文化格局》，载《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⑲杨建华：《试论冀北地区夏至早商时期的外来文化及其影响》，载《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⑳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10期。郭大顺：《大南沟的一种红山文化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㉑杨建华、赵菊梅：《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载《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㉒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㉓林沅：《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第十四期。

㉔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㉕保定地区文管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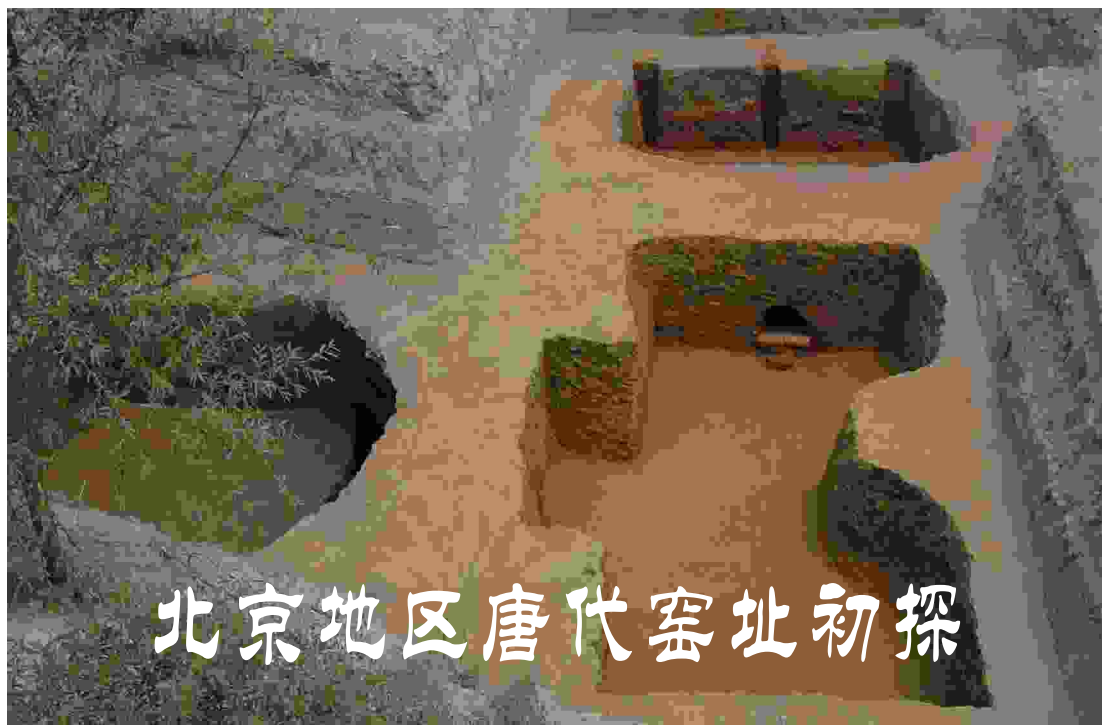
㉖《十大考古新发现：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9日。

㉗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县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第5期。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㉘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沈勇：《围坊三期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5期。

㉙韩嘉谷：《花边觅踪》，《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作者为天津博物馆研究员）



张智勇

北京地区唐代窑址最早见诸于报告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此后的考古发掘中，唐代窑址少有发现。近年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在延庆、大兴等区县清理了一批唐代窑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遗物，为研究北京地区唐代窑址的生产模式及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然而，北京地区唐代窑址的发现数量及出土遗物仍相对较少，资料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进行系统研究的条件，本文仅对其进行初步的归纳与探讨。

一、发现情况

据可以统计的资料，北京地区唐代窑址主要有以下发现：

1. 1971 年，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北发现唐代砖窑 1 座，出土一些残砖^①。资料未发表，窑址形制、结构不明。

2. 2007 年 4～6 月，在大兴区亦庄鹿圈发现唐代砖瓦窑 2 座^②。平面近葫芦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等组成。出土物有细绳纹砖、板瓦或筒瓦残片、残陶片等。

3. 2007 年 6 月，在延庆沈家营镇东王化营清理唐代砖瓦窑 1 座^③。由操作坑、窑室、排烟系统组成，火门、火膛因压于现代管道下未作清理。出土较多残碎砖瓦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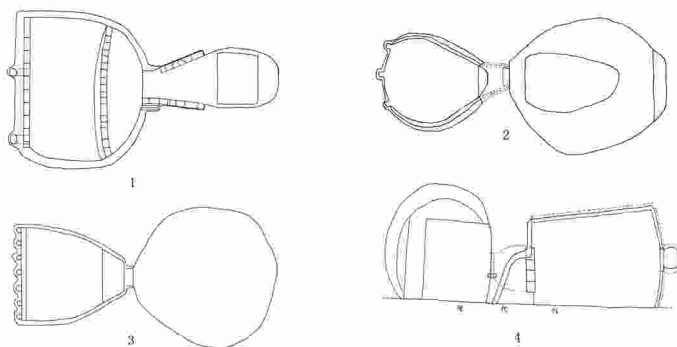
4. 2007 年 11～12 月，在丰台区王佐遗址清理隋唐时期窑址 8 座^④。平面近葫芦形，由操作坑、火膛、窑室等部分组成。出土物有砖块、残板瓦、瓷碗等。

5. 2008 年 10～11 月，在大兴新城 19 号地发掘唐代窑址 2 座^⑤。平面呈葫芦形，半地穴式，由操作坑、火门、火膛、烟室等组成。出土物有残砖块、板瓦残片。其中 Y1 的操作坑还设有青砖砌制的三步台阶。

6. 2009 年 12 月，在通州区马驹桥物

流基地 E-04 地块清理唐代窑址 11 座^⑥。平面呈“凸”字形或“吕”字形，由操作间、窑门、窑室、烟道等组成。出土物有残砖块、板瓦残片、陶瓷残片等。

7. 2010 年 10 月，在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清理唐代窑址 2 座^⑦。由窑门、火膛、窑床等部分组成。出土物有长方形砖、残板瓦等。



1. 通州马驹桥 Y1 2. 通州马驹桥 Y11 3. 通州马驹桥 Y12
4. 丰台王佐 Y8

二、形制、结构

从发掘情况看，北京地区所发现的窑址均为“穿掘为窑”^⑧的形式。其建筑程序为：先在生土中挖一方坑，然后在坑壁上掘出窑门，窑门进去再向四面扩展，挖成方或圆形的土洞，是为窑室，然后在窑室后壁挖数条沟槽，与外界相通而成排烟系统。也就是说，整座窑除烟囱外，皆在

图一 Aa 型窑

地下掏掘而成。这与西安、洛阳地区所见的唐代窑址构造方法基本相同。这种窑顶为生土顶，即窑室完全是在生土下开挖而成，窑室顶部在平时并不能敞开，产品的装窑或出窑皆是从窑门进出，这与西安、洛阳地区发现隋或唐初的绝大多数窑为生土顶相一致^⑨。北京地区发现的唐代窑址依组成形式，分为三种类型。

A 型 单体窑

该类型窑特征为：一座窑为一个整体，有独立的操作坑和窑室。依排烟系统的不同，分为二亚型。

Aa 型 烟道型，即直接在窑室后壁挖数目不等的条状沟槽作为排烟的烟道。这一类窑有丰台王佐 Y8，通州马驹桥 Y1、Y4、Y11、Y12（图一）。

Ab 型 烟室型，即在窑室后侧另建一烟室，两者之间以墙相隔，其底部有烟道使两室相通。这一类窑有丰台王佐 Y1、Y2、Y5、Y6，通州马驹桥 Y5、Y6、Y7、Y8，延庆东王化营 Y1，大兴亦庄鹿圈 Y7（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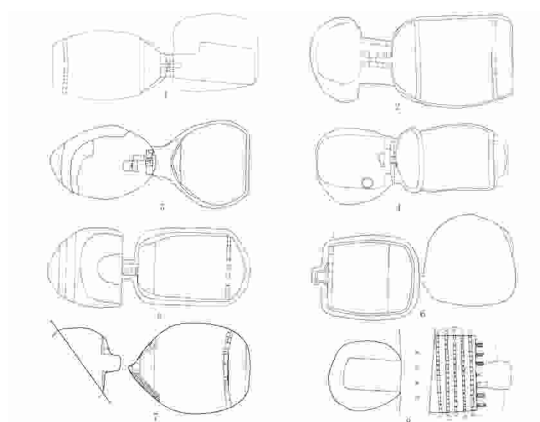
B 型 连体窑

该类型窑特征为：两个或以上的窑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共用一个操作坑。依形制结构分为二亚型。

Ba 型 两窑共用一个操作坑，窑门相对或彼此独立，属对子窑的一种类型。依形制分为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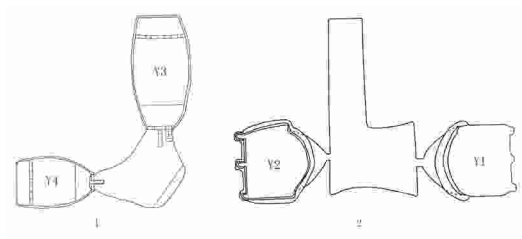


丰台王佐 Y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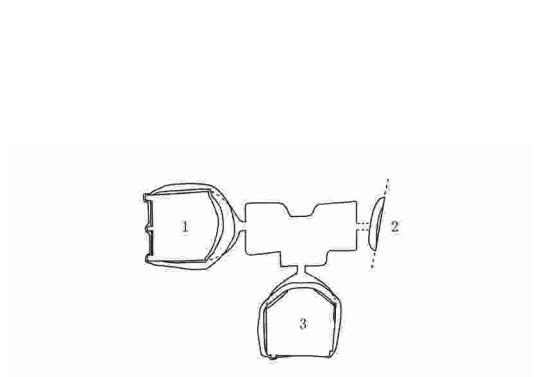
1. 丰台王佐 Y1 2. 丰台王佐 Y2 3. 丰台王佐 Y5
4. 丰台王佐 Y6 5. 通州马驹桥 Y5 6. 通州马驹桥 Y7
7. 大兴亦庄鹿圈 Y7 8. 延庆东王化营 Y1

图二 Ab型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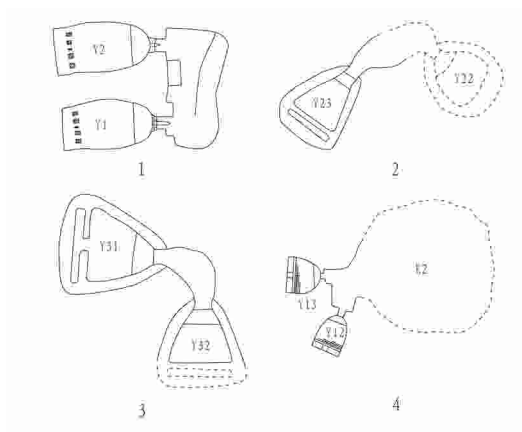
1. 丰台王佐 Y3、Y4 2. 丰台王佐 Y1、Y2

图三 Ba型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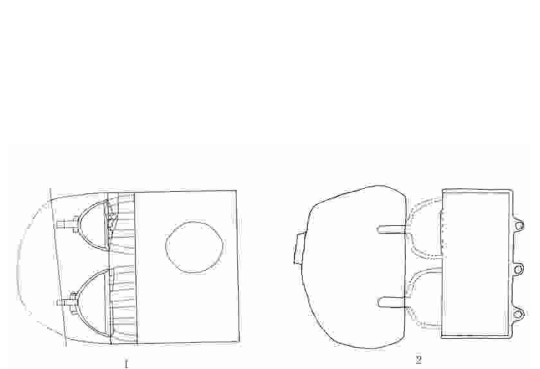
1. 房山长阳 Y3 2. 房山长阳 Y4 3. 房山长阳 Y5

图四 Bb型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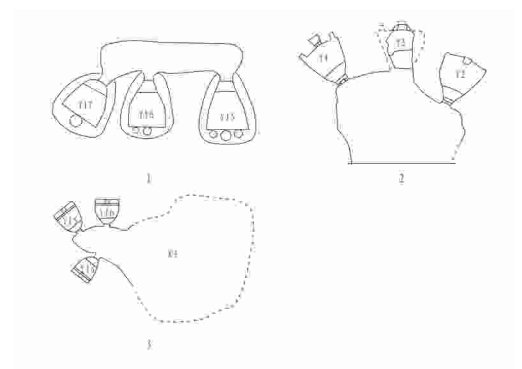
1. 洛阳城东城内窑 2、3. 洛阳城外郭城窑 4. 关林镇窑

图六 洛阳窑址



1. 丰台王佐 Y7 2. 通州马驹桥 Y10

图五 C型窑



1. 洛阳城外郭城窑 2. 洛阳东站内侧窑 4. 关林镇窑

图七 洛阳窑址



丰台王佐 Y7

I 式 两窑窑门相对,有共用的坡道。房山长阳 Y1、Y2 即属该式窑(图三, 2)。

II 式 两窑窑门独立,无坡道。丰台王佐 Y3、Y4 即属该式窑(图三, 1)。

Bb 型 三个或以上的窑为一组,共用一个操作坑,属组窑的一种类型。长阳 Y3、Y4、Y5 即为该类型窑(图四)。

C 型 双火门窑

该类型窑特征为:一座窑为一个整体,窑门与火膛分别有两个。丰台王佐 Y7、通州马驹桥 Y10 即为该类型窑(图五)。

以上类型烧窑多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组成。操作坑位于窑门之外,有的有供人上下的斜坡道,形状有不规则椭圆形和不规则长方形,长宽大小各不相同。窑门多数在操作坑与窑室的火膛之间,少数在操作坑与火道之间,平面为上宽下窄,有的有包砖和铺地砖。窑室由火膛和窑床组成,火膛在窑床的前面,形状多为半圆形,有的火膛内还残留有黑木炭灰、草木灰或秸秆灰,窑床平面呈长方梯形或

横长方梯形,窑床左右壁、后壁为弧形或直壁。排烟系统包括烟室、烟道、烟囱三部分。

单体窑 A 型数量最多,为北京唐代烧窑常见形制,在洛阳亦有较多发现。其平面形状多呈葫芦形或马蹄形等,该型窑规模相对较小,结构简单。

连体窑 Ba 型属对子窑的一种,其形制与隋唐洛阳城外郭城^⑥、东城内唐代砖瓦窑^⑦、洛阳市关林镇唐代烧瓦窑^⑧属同类型。但两地窑也有不同之处,房山长阳 Y1、Y2 南北相对,而洛阳城东城内 Y1、Y2(图六, 1)为南北并列,外郭城窑则多为南北并列,窑门独立,组成形式不同。丰台王佐 Y3、Y4 则为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窑近于垂直,其组成形式与长阳不同,而与洛阳城外郭城 Y22、Y23(图六, 2), Y31、Y32(图六, 3)相近。关林镇 Y12、Y13(图六, 4)紧邻,操作坑较大,形制与王佐略有不同。此外,房山长阳 Y1、Y2 有共用的长方形坡道,洛阳城外郭城、丰台王佐窑却不见坡道,亦

反映了形式上的不同。

连体窑 Bb 型中, 房山长阳 Y3、Y4、Y5 共用一个操作坑, 属组窑的一种, 该类型窑形制较为特殊, 在北京地区唐代窑址中尚属首次发现。隋唐洛阳城外郭城 Y15、Y16、Y17^⑬ (图七, 1), 洛阳东关南侧窑址 ZY2、ZY3、ZY4^⑭ (图七, 2) 及洛阳关林镇 Y14、Y15、Y16^⑮ (图七, 3) 窑址中发现有三窑共用一个操作坑的组窑, 但三处窑址组成形式与长阳窑址不同, 反映了两地窑址形式上的一些差别。

C 型双火门窑形制较为特殊, 与洛阳右掖门西侧窑群^⑯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 北京双火门窑中双火门、火膛属于同一个窑体, 而右掖门西侧窑群则属不同的窑体。

三、出土遗物

北京地区唐代窑址出土遗物大多为砖、瓦等建筑材料, 此外还有陶、瓷质的生活用器, 数量较少。遗物多已残破, 少有完整器。以下就各类遗物简单归纳。

1. 建筑材料

有砖、瓦两类。

(1) 瓦 有板瓦、筒瓦。

板瓦 均为残片。大兴亦庄鹿圈出有素面布里板瓦、内布外素瓦片、布纹板瓦。大兴新城 19 号地出有红色板瓦、布纹板瓦。

筒瓦 均已残。大兴亦庄鹿圈出有布纹筒瓦残片。通州马驹桥筒瓦内外面均为素面, 残长 16.9、高 7.6、厚 1.9 厘米。

(2) 砖 数量最多, 有长方形砖、方形砖等, 依纹饰特征分为三类。

绳纹砖 亦庄鹿圈细绳纹砖长 32、宽 17、厚 6 厘米。丰台王佐细绳纹砖长 32~35、宽 15~18、厚 5~6 厘米。大兴新城 19 号地细绳纹砖一面为素面, 一面饰细绳纹, 长 36、宽 17~18、厚 6 厘米。通州马驹桥绳纹砖一面为斜绳纹或直绳纹, 另一面为素面, 长 31~33.5、宽 15~17、厚 5.7~6.3 厘米。延庆东王化营部分砖表面有绳纹。

沟纹砖 丰台王佐沟纹砖长 34、宽 16、厚 5 厘米。通州马驹桥沟纹砖一面为沟纹, 另一面为素面, 残长 15、残宽 19、厚 5.7 厘米。延庆东王化营部分砖表面有细沟纹。

条纹砖 亦庄鹿圈条纹砖长 34、宽 17、厚 6 厘米。

2. 陶、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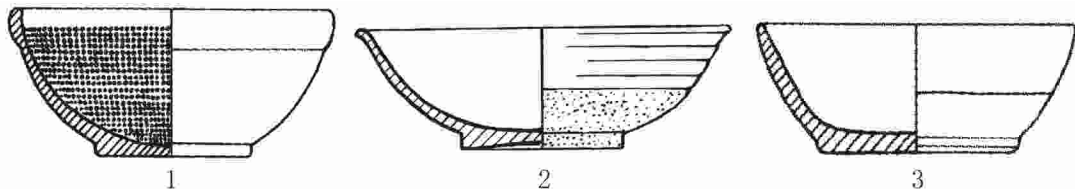
(1) 陶器

多为残片, 有泥质灰陶、磨光灰陶、夹砂红陶等。

陶盆 1 件。通州马驹桥 Y5:2, 泥质灰陶。口微侈, 圆唇, 弧腹, 平底带假圈足, 口沿内侧及底部有密集的点状纹饰。口径 23、底径 11、高 9.4 厘米 (图八, 1)。

(2) 瓷器

瓷碗 2 件。丰台王佐 Y2:1, 侈口, 撇沿, 尖圆唇, 腹弧收, 饼形足略上凹, 内底遗留有 5 个乳丁支垫痕。体施青褐釉, 釉色微泛黄, 内满釉, 外壁施釉不及底。口径 22、底径 9.6、高 7.2 厘米 (图八, 2)。通州马驹桥 Y9:2, 敞口, 圆唇, 斜弧腹, 小平底带假圈足, 内外施白釉。口径 16.5、底径 10.5、高 6 厘米 (图八, 3)。



1. 马驹桥陶盆 (Y5:2) 2. 王佐瓷碗 (Y2:1) 3. 马驹桥瓷碗 (Y9:2)

图八 窑址出土器物

四、相关问题

1. 窑址年代

北京唐代窑址出土器物较少，且多为砖、瓦等建筑材料，其年代只能根据出土遗物及窑址形制结构，并比照已有研究成果加以推断。

窑址中绳纹砖数量最多，此外有沟纹砖和条纹砖，这些与北京发掘的唐墓用砖基本相同，为典型的唐代遗物。板瓦、筒瓦虽多为残片，但从纹饰来看，与洛阳唐代窑址出土同类瓦片相同。窑址中陶瓷器亦多为残片，丰台王佐 Y2 出土有青褐釉饼形足瓷碗，而饼形器流行于六朝至隋唐时期。通州马驹桥 Y9 出土瓷碗器形亦具有唐代特征。

从形制来看，北京发现的几处窑址虽与洛阳等地唐代窑址在组成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整体结构及开凿方法上基本相同。

2. 窑址用途

北京地区唐代窑址出土遗物多为砖、瓦等建筑材料，陶瓷类生活用器极少出土，且多为陶瓷残片。由此可见，北京唐代窑址多为砖窑或砖瓦窑，其用途可能是为一些建筑提供建筑材料。此外，在一些窑址周围还发现有同时期墓葬，墓中用砖与窑址所出相似，由此，窑址功能可能与墓葬有关，或为烧制墓葬用砖或随葬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丰台王佐、通州马驹桥发现的窑址，周围虽有同时期墓葬发现，但数量均为 1 座，显然窑址不是为墓葬而建的，其用途或与周围建筑遗存有关，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予以证实。

社，2011 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庆县东王化营窑址、墓葬发掘报告》，《北京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丰台王佐遗址》，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⑤刘乃涛：《大兴区新城北区 19 号地考古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大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马驹桥物流基地 E—04 地块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0 年第 5 期。

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⑧（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条：“开元十九年六月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筑，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烧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十九年六月诏曰：京雒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固须修整，比闻取土穿掘，因作秽污坑塹，四方远近何以瞻瞩，顷难处分，仍或有违。宜令所司申明前敕，更不得于街巷穿坑及取土，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顿疏，决墙宇桥道亦当界渐修，不得广有劳役。”中华书局，1960 年。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白马寺唐代窑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 年第 3 期。

⑩⑬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东都洛阳城外郭城砖瓦窑址 1992 年清理简报》，《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12 期。

⑫⑮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关林镇唐代烧瓦窑址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12 期。

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瀍河西岸唐代砖瓦窑址》，《考古》2007 年第 12 期。

⑯洛阳博物馆：《隋唐东都洛阳城发现的几处砖瓦窑群》，《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 年。

①赵光林、马希贵：《北京地区古窑址》（下），《河北陶瓷》1993 年第 6 期。

②董育纲、刘乃涛：《亦庄鹿圈拆迁房安置用房工程（X10 号地）考古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亦庄卷），上海古籍出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

元代抱玉里文靖书院

杨亦武

文靖书院创建于元代初期，与燕京太极书院、昌平县的谏议书院并称为元代北京的三大书院。同时也是房山历史上三大书院之一，房山的另外两座书院分别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房山知县邱锦创建的云峰书院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良乡知县程仁杰创建的卓秀书院。

文靖书院的记载，初见于明代的《寰宇通志》：“文靖书院，在房山县西南七十里抱玉里。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尝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建书院，立祠祀之，因以见其学之所从来，元赐额曰‘文靖书院’，国子祭酒苏天爵为记。”^①

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文靖书院的详情一无所知。这段记载提供了解开文靖书院之谜的重要线索。据此，我们知道书院的创办人是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书院的地点在元代房山县的抱玉里。进一步考证研究，便得知创建人的身世经历和书院创建的大致年代、毁弃时间、具

体地点，及相关情况。

一、书院创办人赵密和贾壤

根据《寰宇通志》的记载，我们知道书院的创办人赵密和贾壤同为抱玉里人。

1. 文靖书院的襄赞者赵密

关于赵密，我们通过《元史·赵柔传》、赵密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赵密堂兄弟赵晟墓碑《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可以清晰得知其身世经历。上述两篇碑文都是出自元代苏天爵之手。苏天爵曾任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他的两位僚属高明、葛元哲整理他的平生所著，集成《滋溪文稿》三十卷，其中就收录了《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

据《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记载，赵密祖籍为奉圣州矾山县：“维赵氏奉圣州矾山人”。奉圣州，金为兴德府，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改奉圣州，属上都路，



村里老者指点文靖书院创建人贾壤墓的位置

领永兴、缙山、怀来、矾山四县。矾山县原本是以矾山得名的，矾山即地处北京门头沟区、河北怀来县、涿鹿县交界处的灵山，故元代的矾山县包括河北怀来、涿鹿、北京门头沟三区县灵山周边的地界。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存有《赵君墓碑》，文曰：“大元赠朝列大夫骑都尉天水郡伯赵君及夫人赠天水郡太君石氏之坟”。赵密家族金末投元，累世以天水郡为封号（详见后文）。《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记载，赵密当年曾重修矾山老家的祖茔：“先世丘陇在矾山者，侯复鏤石表之，列树翁仲，令子孙不忘其处。”^②《赵君墓碑》当为赵密家族在矾山的祖茔之碑。此碑既在门头沟，赵密祖籍地应在北京市门头沟。

赵密曾祖父赵世英，是金朝末期的易县县令。《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曾大父世英，仕金为易县令。”^③易县，即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赵密的祖父赵柔《元史》有传，《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亦有记载。

据上述文献记载，赵柔处在金末乱世，有胆略，善骑射，是个地方豪杰。

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屡败金兵，当年九月攻破居庸关，进逼中都（今北京），因城防坚固兼有重兵防守，暂且退兵。次年，成吉思汗再次亲征金国，一度包围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战争造成了中都周边的社会动荡，赵柔率领乡亲避兵西山，凭险结寨，自保乡土。附近的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各聚众数千，听说赵柔讲信义，相约投奔赵柔，共推赵柔为首领，听从他的统一指挥，赵柔的民军一时成为金中都的重要稳定力量，金封赵柔为易州总押都统。

金崇庆二年（1213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攻破紫荆关，赵柔审时度势，率十万之众归顺，受任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从此赵密家族定居易州涑水县。

元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趁成吉思汗亲征西夏之际，中都地区百姓纷

纷聚众起义，赵柔倚仗个人的影响和人脉，匹马单枪，前往说降，平定了骚乱，因此立下大功，升任龙虎卫上将军、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总管。

元太宗二年（1230年），窝阔台下诏，选拔降民3700人为猎户，设置打捕鹰坊总管府管辖统领，命赵柔兼任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仍锡元帅金符。太宗八年（1236年）加封金紫光禄大夫（从四品）。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天水郡公，谥庄靖。夫人张氏，赠天水郡夫人。

赵柔之子可考的有三：长子赵守赞，次子赵守政，三子赵守信。赵柔身后，子孙相继为官，极尽荣显，成为元大都西南、涿易之间涑水地方的赫赫大族。

赵密的伯父赵守赞，先是世袭了赵柔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的官职，后来“去为它官”（《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其弟赵守信之子赵晟竟“以伯父守赞阴入官”（《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做到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可见赵守赞在元代官场也非等闲人物，只是文献没有留下他更多的资料。

赵密的叔叔赵守信曾任广宗县尹。赠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天水郡公，谥康惠。夫人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广宗县，元属于顺德路，即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

赵守信子赵晟，由县主簿、县尹，一路做到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四川道廉访司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召拜监察御史，除山东道廉访副使，改燕南道，迁同知储政院事，拜燕南廉访使。晚年他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未被获准，拜翰林直学士。赠亚中大夫、集贤直学士、轻车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谥惠肃。夫人宋氏，赠天水郡夫人。

赵晟的四个儿子皆身居功名：赵道安，从仕郎、右藏库副使；赵礼安，承事郎、同知清州事；赵居安，从仕郎、宣政院照磨；赵志安，太保府知印。

赵守政即赵密之父，他继大哥赵守赞

接任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又以长子允贵，赠同知保定路遂州事”（《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可见，赵密的大哥也是一位元朝官员，赵守政过世，竟因他追赠官职。赵密母王氏，金吾卫上将军王义之女，追封宜人。

赵密，字仲理，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出生，父亲死后，顺理成章继任这个赵氏家族世袭的职务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赵密廉以律己，严以驭下。每年按照规定的时令打猎，如期向朝廷进贡猎物，从不扰民，所经之地，百姓争相备办酒食拦阻挽留，赵密谢而不入。总管府的衙役和部属，在他的约束下，也不敢扰民生事。

元朝立国之初，金和南宋未灭，民心不服，元太宗窝阔台设立打捕鹰坊总管府，命赵密的祖父赵柔任此职，率3700猎户，猎鹰犬马驰骋豪纵，目的是进行武力震慑。后来，大元牢牢掌握了江山，每逢打捕鹰坊出行捕猎，侵渔地方，乱世扰民，百姓不堪其苦，反而惹出民怨。赵密一革故弊，难能可贵。赵密任职两年，便“引病免归”（《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

赵密“从容城刘因游”，成为刘因的入室弟子。

刘因，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出身儒学世家，父亲刘述是学有所成的名儒，他刻意问学，尤精性理之学。在刘述的启蒙训导下，刘因3岁识字，6岁能诗，10岁能文，落笔惊人，20岁时就表现出超群的才华。他既承家传，又敦品力学，旷达高远，成为元代声闻朝野的赫赫名儒。元代欧阳玄称他是“继周公、孔子之学说，为来世开太平者”。刘因安贫守道，淡于荣利。在家开馆授徒，对前来求学的弟子，因材施教，皆学有成就。在众弟子中，就有来自易州涞水县的赵密。他的同窗中有来自涿州房山县怀玉乡抱玉里的贾氏兄弟贾璞和贾壤，抱玉里在涞水县北，两地只隔着一条拒马河。而赵密和抱玉里还有更深的渊源。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侯

生世家，喜狗马射猎。既长，闻容城刘公号称大儒，燕、赵多士咸往授业，侯亦趋函丈执弟子礼。刘公告以圣贤之训，岁余尽去豪习，故相何公玮数称其贤。”

当年，赵密听说刘因是当世大儒，立即修书与他，请求作门下弟子，幸获刘因接纳入馆，执弟子礼。刘因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训导他，一年多时间，赵密一改豪习，屡次受到何玮的称道。

何玮是赵密易州的同乡前辈，初袭父亲何伯祥，任易州知州。后来跟随元军围困襄樊，南宋将夏贵援襄阳，恰好与何玮接战，何玮率众死战，将夏贵击退。跟随丞相伯颜征宋，屡为先驱，累立战功。官至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刚直不阿。武宗时，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何玮父子两代知易州，赵密的祖父则在易州起家，是易州的首任军民太守，子孙相继，成为易州豪族。何、赵两家应为官宦世交。而何玮与赵密的老师刘因交谊非浅，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何玮刚好辞去两淮盐使的官职，奉亲家居，藏书万卷，请刘因前来教习他的儿子，30岁的刘因从容城来到何玮易县家中教家馆。刘因在何府教授3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何玮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入京，刘因辞馆，自易州还容城。此时，赵密21岁。

除《寰宇通志》外，赵密本人的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未见记载他和同窗贾壤在抱玉里建书院之事。而贾壤的墓碑《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上说贾壤是居家讲学的（详见后文）。那么，开馆讲学的应该是贾壤，赵密应是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影响及家族财力给予襄助。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国初兵荒之余，元帅（赵柔）度田数千亩分赐诸子，以给衣食，侯（赵密）守先业不坠，种木千章，岁计益饶。”赵密的祖父赵柔当年给他的子孙留下很厚的家底，加之赵家世袭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在当地有权有势，富甲乡里。

赵密虽未开馆临席，但襄赞之德亦不

可没。又因他的家族势力远大于实际开馆授业的贾家。所以，在文献记载中，赵密反而写在贾壤前面。

赵密墓碑《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记载他是涑水人，而《寰宇通志》为什么载为“元（抱玉）里人”呢？这是因为赵密家族世居涑水，而产业横跨拒马河两岸的涑水和房山，在房山县怀玉乡的抱玉里有大片田园庄产，是抱玉里首屈一指的豪门大户，也算是名符其实的抱玉里人。

元以后，历明至清直到民国时期，赵氏家族一向是北白带村旺族，至今北白带村还留下“赵半街的地名”，足见赵家的庄产之盛。民国晚期，赵家势衰，家产被子孙变卖。

值得注意的是，赵密的“总管”不是抱玉里的职务，而是对他曾任过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的尊称。“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应该这样断句：“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

2. 文靖书院的创办人贾壤

如果说赵密是文靖书院的襄赞者，而实际创办人则是贾壤。

关于书院的创办人贾壤，亦有较为详尽的资料。贾壤之父贾德全的《有元故医隐贾君阡表》现存于房山云居寺塔院、贾壤及兄贾和的墓碑拓片存于国家图书馆内，被收录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贾和碑为《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④，碑立于后至元三年（1337年）三月，贾壤碑为《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⑤，碑立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十月。这两篇碑文亦出自元代苏天爵之手，并收录在他的著作《滋溪文稿》中，高明、葛元哲在收录时改了碑题，贾和碑为《房山贾君墓铭》^⑥、贾壤碑为《处士贾君墓表》^⑦。碑文个别文字也稍有变动，如贾和葬所原碑为“葬房山怀玉乡抱玉里栗原先莹”，《房山贾君墓铭》改为“葬房山抱玉乡栗原先莹”；贾壤葬所原碑为“葬抱玉里栗原先兆”，《处士贾君墓表》改为“葬房山抱玉乡栗原先兆”。两侧均误把抱玉里改为“抱玉乡”。原碑有些碑

文漫漶不清，两相参照，便得知两篇碑文的全貌。为记述方便，下文在引述时，均用原碑名称。

贾氏两代三人的墓碑文字，为我们研究文靖书院的创办人贾壤的身世经历，进而研究文靖书院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贾壤是元大都涿州房山县西南怀玉乡抱玉里人，祖籍“降之伏翼”（《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降，即降州，金代属河东南路，元代属晋宁路。“伏翼”，县名。查《金史》和《元史》，金元两代降州均无伏翼县，但有翼城县，即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在降州治所降县之北。降县，今属山西省运城市，元代曾称降阳。从贾壤祖父和父亲的生活轨迹看，所谓伏翼县，应该就是翼城县，元代曾称伏翼，只是《元史·地理志》漏载而已。

《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上说，其“曾大考金尚医某”，“尚医”就是太医，元初一度改太医院为尚医院。那么，贾壤的曾祖父在金朝太医院供职，是一位太医，生活年代大致在金章宗、卫绍王至宣宗以后的一段时间。

祖父贾景山，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年）进士，在“伏翼”即翼城县做了县丞，宣宗南迁，中都失守，河北、山西相继沦陷，贾景山从此下落不明。

贾壤的父亲贾德全，字道弘，生于金代晚期的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在战乱中和父母离散，自幼被姑母贾氏抚养，十几岁的时候便自立谋生，贾氏的丈夫是金朝的一位地方官员，贾氏随夫到远地就职，贾德全未能同行，与姑母离散后，他一直感念养育之恩，20岁左右，他离开降阳（今山西省运城市降县），一路寻找姑母的下落，直到中都地区，却了无结果。他路过房山县西南的怀玉乡抱玉里，喜欢这里的山水风土，便在抱玉里买下田园，定居下来。在抱玉里，他继承祖业，行医为生，闻名房山、涿州、易县地方。

贾壤的母亲康氏，为涑阳招讨判官康委之女，生于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

小贾德全 10 岁。

康氏家族是当地豪门。关于康氏家族情况，《元故康公墓志》^⑧（立于元延祐七年（1320 年）二月）、《康氏先莹碣铭》^⑨（元泰定元年（1324 年）二月二十八日立）为我们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材料，这两篇文章皆出自贾壤之手。根据上述两则墓志、墓铭得知，康氏原来是涞阳（今河北涞水县）名族，世居赤土里（即今河北涞水县的赤土村）。康委娶上乐里（即今房山区大石镇南尚乐村）张氏为妻，自赤土北渡拒马河迁居上乐里。上乐里在抱玉里南，距抱玉里 12 华里。康委之子康仲全官居千夫长，在当地是位豪强人物，此人“劲勇刚烈，所谓虽万人吾往者。当金乱之际，保亲族邻里合千百家，得守坟墓安然无虞。”（《康氏先莹碣铭》）。康氏第三代康毓、康用、康信、康宁、康庆、康秀、康福、康瑀、康贇，弟兄九人雄居乡里，其中不乏身居功名者，第四代、康委曾孙康惠琮官居将仕佐郎金玉府石局大使（《康氏先莹碣铭》）。康氏家族之所以肯把康氏嫁给贾德全，应是看重他是世家子弟，又善医道。此外，以医道持家的他，在抱玉里的家业应是风声水起。

贾德全和康氏共生四子：贾和、贾闰、贾璞、贾壤。

贾德全 42 岁那年生长子贾和（字仲礼），由此分析，贾德全应是晚婚，结婚年龄应该在 40 岁前后，小他 10 岁的康氏应是 30 岁左右。其原因应是金末的战乱，致使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元朝定鼎，社会稳定下来，年介 40 的贾德全终于得以成家。

贾和，元海迷失后二年（南宋淳佑九年，1249 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主要生活年代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幼年曾在乡校就读，良好的家庭背景，加之读书人的身份，十几岁被编入打捕鹰坊总管府成为一名猎户，因做事廉谨，受到总管府赏识，抬举他主管钱粮。

贾和大赵密 11 岁，他在打捕鹰坊总管

府当差时，赵密才是四五岁的儿童，当时的打捕鹰坊总管府总管应是其父赵守政。这是贾、赵两家第一次搭上关系。

至元四年（1267 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了大都城和宫城、宫殿建设，贾和在采石提举司掌管文书，参与了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当宫城肇建，栏槛、陛础、舆梁、池台，悉资玉石，供亿浩穰，主者莫能支，辟君掌其文书，事集而工不扰。”（《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这一年，贾和 18 岁。至元十三年（1276 年）大都城垣建成，翌年，年仅 28 岁的贾和病逝。贾和短暂生命的后十年，是在大都城和皇家宫殿的采石王役中度过的，他是一个为大都城建设献出生命的抱玉里人。

次子贾闰，字仲泽，小贾和 4 岁，元宪宗蒙哥四年（1254 年）四月十六日出生。这一年贾德全 46 岁。贾和去世两年后的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 年）五月初九日，贾闰也辞世而去，年仅 26 岁。

贾德全 48 岁生第三子贾璞（字抱真），54 岁生四子贾壤（字巢夫）。

贾璞，出生于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 年）五月二十一日。

贾壤，生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 年）五月二十四日。

贾德全对贾璞、贾壤寄予厚望，送他们到容城县，就学于当世理学大师刘因。由此成就了文靖书院的因缘。

“弱冠闻容城刘公因以理学淑多士，偕其兄往从焉。”（《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铭》）。古人称 20 岁为弱冠。那么，贾壤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 年）和三哥贾璞一起远赴容城，拜刘因为师的。同学中就有赵密，贾壤比赵密小一岁。贾壤和赵密结谊刘因门下，成为日后在抱玉里共襄文靖书院的契机。

在刘因的学馆，贾氏两兄弟性静而乐学，深得刘因赏识，刘因亲自为两个起了名号，兄名曰璞，字抱真，弟名曰壤，字巢夫，足见对两兄弟的器重和期待。贾壤和贾璞只在刘因的学馆从师一年，至元

十九年(1282年)刘因应召入朝,升任承德郎、右资善大夫,两兄弟便返回家乡房山县抱玉里。而刘因为官时间不长便因母病归里,此后的一段时间,贾氏兄弟与刘因当有过从和授受。

学成归里,兄贾璞未以名闻,倒是贾壤学表乡里,被推举为涿州医学学正,调升宣德府教授。

元代的学校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从中央到各路州府,都这样布局。涿州医学学正,是涿州主管州医学教育的官员。而宣德府教授是主管宣德府学的官员。涿州,隶大都路,辖范阳、房山两县,即今河北省涿州市和北京房山区。宣德府,隶上都路。治所在宣德县(今河北宣化县)。领宣德、宣平、顺圣三县,即今河北省涿源、蔚县、阳原、宣化、怀安及山西省灵丘等县境。从任职医学学正看,贾壤亦得医学家传。

身为刘因弟子,贾壤的修为和学品为一时赞可,元朝的一些官员如翰林承旨郭贯、国子祭酒崔咏、燕南廉访使赵晟等,认为他足以传授朝中贵胄子弟,先后曾向朝廷举荐。不过,使贾壤名垂青史的,还是他在家乡抱玉里创办文靖书院,将刘因的学说教授于乡里子弟。

二、文靖书院立毁年代和地址

国子祭酒苏天爵曾撰写了《文靖书院记》,是一篇详细记载文靖书院史迹的文章,可惜佚失,文靖书院的创立年代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贾壤生平和苏天爵履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大致的年代。

1. 文靖书院的立毁年代

《寰宇通志》上说:贾壤“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建书院,立祠祀之。”

贾壤学成归里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那么,其创办书院当在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后,到他去世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贾壤前后在书院讲学53年之久。

其间曾一度出任涿州医学学正和宣德府教授。贾壤在元大德八年(1304年)二月为其父立的《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碑阴落款为:“涿州医学学正贾壤述并书。”可见,贾壤任涿州医学学正在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前后。而出任宣德府教授时间较晚,延祐七年(1320年)二月《元故康公墓志》署名“前涿州医学学正贾壤述并篆额”,而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康氏先莹碣铭》署名“静修先生刘文靖公门人贾壤述并篆”,既没再提前涿州学正的职衔,也没有提到宣德府教授的官职,无疑是因为涿州学正离职太久,而尚未任职宣德府学。那么,贾壤任宣德府教授当在泰定元年(1324年)以后。

元朝又是何时敕赐“文靖书院”的呢?文献记载,元帝赐额后,国子祭酒苏天爵撰写了《文靖书院记》。查《元史·苏天爵传》,苏天爵至正二年(1342年)任湖广参知政事,后升迁为陕西行台侍御史。至正四年(1344年)召回朝廷任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至正五年(1345年)便出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

苏天爵是以集贤侍讲学士的身份兼任国子祭酒的,且只兼任了一年就出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那么,元朝赐额“文靖书院”的时间必是至正四年(1344年)。

贾壤早于9年前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已经去世,而其师兄赵密又早于贾壤去世一年前的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去世。这两个创办文靖书院的同门都活了74岁。苏天爵时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

贾壤过世9年后、赵密过世10年后,元顺帝将贾壤在自家创立的书院赐额,纯属为表彰贾壤敷教办学,传播刘因的学说,教化乡里,同时也是表彰赵密的襄助功德。而顺帝为书院赐名赐额的至正四年(1344年)恰是苏天爵兼国子祭酒的一年,又是苏天爵撰写的《文靖书院记》,由此看来,元顺帝对贾壤和赵密的旌扬,和苏天爵似不无关系。

苏天爵生于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

(1294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密、贾壤的恩师刘因原居真定，刘因的父亲刘述辞武邑县令，曾一度家居真定，刘因在真定接受启蒙教育，后随父刘述回到保定容城，所以苏天爵和刘因有同乡之谊，虽无缘谋面，和刘因却有很深的干系。苏天爵的恩师安熙，字敬仲，号默庵，藁城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少慕刘因之名，想前去求学，未料刘因病逝，于是便求助刘因弟子乌冲得到刘因的学说思想，尊信力行，世称刘因的“私淑”弟子。苏天爵堪称刘因的再传弟子。作为刘因的传人，赵密长安熙8岁，贾壤长安熙7岁，算是苏天爵的两位师伯。苏天爵与赵、贾两家均有交谊，赵密兄弟、贾壤兄弟的墓碑皆出自苏天爵之手。贾壤第三子贾彝，为苏天爵同辈，同为刘因再传弟子，他与苏天爵同在顺帝朝为官，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两人交谊非浅，苏天爵之所以为贾和、贾壤墓撰写《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便是受贾彝的请托。

在师兄赵密的襄助下，贾壤开办书院传授刘因学说几十年，包括贾彝在内的一些书院弟子在科场的出色表现，在大都产生了相当影响，进而引起朝廷的重视。从苏天爵所撰《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看，他素钦贾壤居家办学、教化乡土的义行。所以贾壤去世9年后、赵密终老10年后，应是兼国子祭酒的他，建议顺帝以刘因的谥号“文靖”为赵密、贾壤创办的书馆赐名，并御赐匾额，以示褒扬。

又，贾壤过世后书院应由他的后人继续开办，这才有顺帝赐额“文靖书院”之举。文靖书院的继承人是谁呢？相关文献没有记载，但应该是贾氏家族三代或四代中的人物。三代人中，贾壤第三子贾彝是学中翘楚，至顺元年(1330年)进士，但为官在外，无暇顾及。四代人中，惟有贾诚出众。据《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贾诚是贾伯俭之子、贾璞之孙。贾璞与弟贾壤同为刘因弟子，未闻有什么做为，其子伯俭亦无

名声，倒是其孙贾诚成了族中人物。有两件事，足以证实贾诚在家族和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

其一，贾壤过世，贾彝拜托苏天爵为其父撰写墓碑，贾彝未亲自出面，代为出面的并非别人而是贾诚，一同前往的则是贾壤的得意门生任享祚，苏天爵根据任享祚的口述为贾壤撰写了墓碑。《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铭》：“彝以奉常太祝丁内艰，免丧，调官新乐。其父卒，乃命犹子诚来告曰……谨稽门生所述状而为之书。”

贾诚跻身贾彝、苏天爵及贾壤门生任享祚之间，代表贾彝和家族为贾壤的丧事出头，足见其在这个诗书传家的贾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其二，至正九年(1349年)二月，贾诚参与了上乐里(今大石镇惠南庄)人杨弘善的《元故杨生墓表》书碑事。该碑上款署名“进士从仕郎保定路容城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房山贾彝述，奉训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王惟麟书，房山抱玉处士贾诚篆额”^⑧。此碑由贾诚篆额，述事的贾彝、书碑的王惟麟，都是顺帝朝的官员。贾诚有资格与这些有身份地位的官员共襄地方文事，必是地方上颇具文化声望的人物。可见，贾壤故世后继续文靖书院讲席的当是贾诚。

元明交替，文靖书院应没有停办。记载文靖书馆的《寰宇通志》始修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成书于景泰五年(1454年)。这说明，明初的一段时间文靖书院尚在。

清康熙三年(1664年)佟有年《房山县志》记述文靖书院时这样载道：“今圯毁无存。”可见，清初文靖书院已经不存在了，而圯毁年代应在此前的某个时期。

到了清代晚期，文靖书院的地址成疑。咸丰八年(1858年)，房山知县高骧云编修《房山志料》，探求文靖书院的情况，志书上的记载令他满腹疑团。他看到《畿辅通志》上记载修自本朝雍正年间，而康熙三年(1664)佟有年《房山县志》上分明



抱玉里古槐

说已“圯毁无存”。他根据文献记载到县西南七十里寻访，来到北尚乐村，村民杨葆元告诉他在拒马河对岸的涞水县赤土村，且言之凿凿，声称赤土村还有书院的遗址，而赤土已在县西南界外十里，这位勤政的知县信以为真，以至于怀疑志书记载有误。

清末房山县城东饶乐府人刘清绶著《房山景物略》称：文靖书院在县东大石河边的徐村遗址，这个村由于大石河泛滥而消失，但当年的故址尚存古塔一座。刘清绶理由很牵强，因这座古塔叫文笔塔，所以认定文靖书院就在这里。

民国十七年（1928年）《房山县志》给了明确的答案：“地已无存，不能考矣。”

2. 文靖书院在北白带村

文靖书院在哪里？依照《寰宇通志》的记载，在房山县西南七十里抱玉里。贾壤为其父所立的《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碑阴的《宗派之图》，载明了贾壤的乡里：“大元大都涿州房山县西南怀玉乡抱玉里医隐贾君宗派之图”，由此我们知道，文靖书院所在的抱玉里，在元代属房山县的怀玉乡。

对于怀玉乡，人们并不陌生，唐代云居寺碑刻上就是“涿州范阳县怀玉乡”的字样，研究发现怀玉乡的核心，就是包括云居寺在内的大石窝镇，而其实际范围，

比大石窝镇还要大一些。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设立万宁县，明昌二年（1191年）改奉先县，包括怀玉乡在内的涿州西北部地区划归奉先县，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改奉先县为房山县，而怀玉乡的设置和名称从唐代沿袭未变，直到明代。

抱玉里既在怀玉乡，一定在大石窝镇附近无疑。

大石窝镇的云居寺建在白带山麓，而大石窝镇西确有三个以“白带”命名

的村子，即南白带、北白带、西白带。而这三个村，现在属于张坊镇东境，三个以“白带”命名的村子留下了这一带与云居寺及所在的怀玉乡的历史渊源的影子。果然，贾德全的墓碑《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就发现在西白带村，国家图书馆存贾壤的墓碑《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其兄贾和的墓碑《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的拓片，也拓自西白带村。西白带村北有块墓地叫贾家坟，贾氏两代三人的墓碑原来就立在这里。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还有砖砌圆围、三合土棚顶的坟丘，贾氏后人还来这里上坟祭祖。上世纪70年代墓地被平毁，墓碑散落遗失，其中的《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被云居寺工作人员收集在云居寺保护起来，其他两块墓碑下落不明。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九月十一日，79岁的贾德全终老，三天后“卜所居西北二里许为莹以葬”（《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成为贾家坟的第一位葬者，随后葬于此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贾和、贾壤。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其长子贾和在病逝20年后“葬房山怀玉乡抱玉里栗原先莹”（《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至元元年（1335年）八月，贾德全四子、文靖书院创办人贾壤终老，“葬抱玉里栗原先兆”（《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

原来，贾氏家族的墓茔在元代是抱玉里的栗原。

至此，抱玉里的位置水落石出。元代怀玉乡的抱玉里就在包括西白带在内的张坊镇东部，这一带在元代原本属于怀玉乡。由于历史的变迁，原来的抱玉里所在，和当年的怀玉乡管界脱离，不再属于大石窝镇，而属于西临的另一个镇——张坊。

抱玉里的大体位置确定了，那么，抱玉里聚落在哪里？文靖书院的具体地点在哪里？

《寰宇通志》上说，赵密、贾壤是在自己的家乡创立书院的，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因为他们传授刘因的理学，刘因死后谥“文靖”，元顺帝御赐“文靖书院”：“元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尝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建书院，立祠祀之。因以其学之所从来，元赐额曰‘文靖书院’。”

《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更加明确地记载贾壤是在自己家里办书院的：“敷教于家，远近学徒恒百余人，君恳恳为陈经义，大抵祖述刘公之训为多。学者寒饥或不能存，又从而振给之。绘孔子像，旦望帅里人祠之，盖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

贾壤得到同窗好友里长赵密的支持，在自己家里开馆讲学，招收远近百余名学生，传授刘因的学术思想，家庭贫寒的学生缺衣少食，贾壤则舍家财接济，使他们继续学业。他在自家的学馆绘制孔子像悬挂起来，每逢初一、十五亲自率领乡亲祭祀参拜，以此风化乡里，淳美乡俗。由此看来，贾壤家就是文靖书院之所在。

贾德全既是“卜所居西北二里许为茔以葬”（《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贾宅暨文靖书院一定在贾家坟东南二里处，那里也就是元代的抱玉里聚落。

北白带村东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以东，是一片南北长、东西宽的平地，自东向西原有两条古路将此地自然分为三段，每段中间，各有一口古井。北白带村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地名就叫抱玉里。原来这里是北白带老村所在，后来老村毁弃，村子西移到现在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北白带村。

当地人称北白带为老白带，南白带为大白带，西白带为小白带。这说明，在三个白带村中，北白带历史最为悠久。北白带村中有座古庙叫慧化寺，遗址上有一口明万历三年（1575年）的古钟，古钟铭文称古庙所在为“白带村”，铭文上也有“南白带”。这表明北白带原本就叫白带村，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在白带村南、西南各形成一个聚落，村南的就叫“南白带”，偏西的就叫“西白带”。有了南白带和西白带，原来的白带村因为在两个白带村的北面，后来便叫北白带。



笔者现场调查抱玉里古井

如今人们来到这块抱玉里故地，仍然能看到当年抱玉里的影子，千年古道自东边的野鸡口而来，横穿过古村遗址，向西而去。原来的三口古井，两口已被掩埋，仍有一口诉说着抱玉里的七百年沧桑。

站在抱玉里遗址的南端西望，贾家坟正处在西偏北的方向，距此恰恰在一公里左右。那么，这里就是当年的贾宅。贾壤既是“敷教于家”，这里便是文靖书院所在。

如果说这里是贾宅所在，那么这里正如村民所说，的确是元代的抱玉里。贾壤为其父贾德全所立墓碑《有元故暨隐贾君阡表》明确记载，贾德全当年“买田园于抱玉里，遂占籍焉”。古碑历历，记录了贾氏家族金末元初的迁徙史，从而确凿见证着这块曾开办过文靖书院的抱玉里故地。

北白带村东的元抱玉里故地曾有文靖书院，对北白带年长的人来说不是什么秘密，笔者曾走访现年80岁的名医周志波先生，得到他的亲口印证，他从小就从长辈那里知道祖辈人曾在村子里建文靖书院。

抱玉里是什么时候废弃的呢？北白带有关慧化寺遗址，尚存古钟一口，古钟的年代为明万历三年（1575年）。这说明，明万历三年前，北白带村已经由村东的抱玉里故地移到现在的位置。从明代记载文靖书院的《寰宇通志》成书的景泰五年（1454年）到慧化寺古钟铸造的万历三年之间的121年间，应该是北白带老村在抱玉里故地废弃西移的时间段。就此，文靖书院随之毁废。

实地考察发现，在抱玉里故地东部边缘，有一条河流自西北而来，穿行而南。老村的废弃是否与当年的水患有关，亦或兵匪之祸？如今已经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村民在往年的农田劳作中，不时在抱玉里故地挖出砖瓦条石。

如今，贾氏家族成为北白带村大户，尽管他们对先人创办文靖书院的故事多已淡忘，但前往贾家拜祭祖先贾德全、贾和、贾壤，在他们心里仍然留下清晰的记忆，直到1974年，贾家坟被平。

三、文靖书院造就的人才和文化影响

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算起，到贾壤去世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贾壤开院讲学50余年。《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说：“远近学徒恒百余人。”意思是，常有百名弟子在文靖书院就读。在700年前的元代，这个规模实在不小，即使是在太极书院讲学的赵复，他当初在北京讲学，也不过百余弟子。以学制五年计，50余年间，文靖书院培养的人才不下千人。

由于时代久远，文靖书院多数书院弟子已无从凭考，所幸元代的碑刻留下了几名贾壤弟子的姓名。延祐七年（1320年）二月《元故康公墓志》署名“前涿州医学正贾壤述并篆额，门生任亨祚书。”泰定元年（1324）二月《康氏先莹碣铭》署名“静修先生刘文靖公门人贾壤述并篆，门生焦叔庸书。”而贾壤的《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铭》，是苏天爵“谨稽门生任亨祚所述状而为之书”（《元故俭斋贾先生墓碣铭》）。由此可知，任亨祚、焦叔庸师从贾壤门下，为文靖书院弟子，此外，见于《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元故房山贾君墓碣铭》、《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所载，赵密之子及贾壤的子侄辈均就读于书院。

《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上说，赵密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赵伯仁，次子叫赵伯辅。对于襄助创办文靖书院的赵密，其师弟贾壤在书院讲学，赵密绝不让亲儿子入学的道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赵伯仁、赵伯辅都应该是文靖书院的弟子。后来赵伯仁官居隆祥使司宣使。

贾壤弟兄四人，贾和、贾闰早卒。贾和无子，贾闰留下二子贾仲良和贾仲恭。《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说：“兄亡，抚诸侄尽恩义，教之读书，皆克树立。”贾壤让两个侄子贾仲良和贾仲恭在书院得到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人自立。贾壤与三

哥贾璞同师于刘因，贾璞有一子叫贾伯俭，也应该在书院就读。

然而学有所成的，还是贾壤的三个儿子：贾叔让、贾季常和贾彝。贾叔让、贾季常都在皇家机构当差。贾叔让提领金玉府采石山场。金玉府，全称“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是元代皇家的御用机构。元时，朝廷为都城和宫殿建设需要，由金玉府在怀玉乡即今大石窝镇开办采石厂，金玉府官员委任贾叔让做采石厂主管。

贾壤的二子贾季常则是“司石局库”（《元故俭斋先生贾君墓碣铭》）。石局即采石局，掌管役夫匠营，造内府殿宇、寺观、桥闸石材之役。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元朝开始营建大都城及宫殿，设置石局总管。十一年（1274年），拨采石役夫二千余户，到怀玉乡等处采石工地常年服役，设采石提举司。二十六年（1289年），改立采石局。贾季常则在采石局负责管理库房。元代大都城建设旷日持久，贾氏家族从贾和到贾叔让、贾季常，两世三人，担任采石要职，参与宫廷汉白玉开采，为大都城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贾氏家族两代人参与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是元代抱玉里人为大都建设参与汉白玉开采的一个见证和缩影。而为元代大都建设培养地方人材的，恰恰是文靖书院。

文靖书院培养的抱玉里贾氏第三代中，最有成就的是贾壤的三儿子贾彝。贾彝至顺元年（1330年）三月赐同进士出身。元代科举经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参加御试（又叫廷试或殿试），御试录取者统称为进士，依成绩名次的先后分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贾彝金榜题名，明宗皇帝授官将仕郎、太常太祝（正八品）。五年后的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父贾壤辞世，贾彝丁忧免官。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孝满，调新乐县知县。序满，调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正八品）。至正八年（1348年）任容城知县，其职衔全称是“从仕郎保定路容城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至正九年（1349年）《元故杨生墓表》）。

容城是其父贾壤老师刘因的故里，贾彝是刘因的再传弟子。刘因早于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去世，贾彝到任后，立即率僚属拜谒刘因墓并建静修祠，捐俸立碑，奉敕篆额。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贾彝再为刘因墓立碑，请苏天爵撰写了《静修先生墓表》。

贾彝还续编了刘因的著述。刘因早年所作诗文，才情驰骋。曾手订《丁亥诗集》五卷。卒后，门人故友搜集其遗稿，编纂《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杨俊民又搜集编纂《续集》二卷，贾彝又增辑《附录》二卷，合前后所编而为二十二卷，名《静修先生文集》。

文靖书院教化一方，至今遗风犹存。书院附近村庄的名字很有厚重的文化感，如广禄庄、广润庄。这一带出现了一批地方书法家，如石岩、卢景辉、侯振海、赵志清，这一带的村民也多以书法见长，一些人的书法造诣甚至超过某些书法家，只是逸处村间，不现于世。这方乡土还养育了一批领导干部，如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中将董占林，局级干部有三四个，善政有为的处级干部殊不胜数。

文靖书院最大的贡献和影响还是它传播的刘因学说。刘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传承了程朱理学，并加以传播阐扬。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奠基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而两宋理学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遭到压抑和打击，南宋末年理学受到朝野的尊奉，其时赵宋王朝已行将就木，流行的范围又不过拘于江南一隅。理学真正在全国范围成为统治思想是在元朝实现的。元朝在政治、经济上使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在思想上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终于奉程朱理学为正统。

南宋亡国后，赵复来到大都，“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赵复，字仁甫，南宋末元初理学家，德安（今湖北安陆）人。由于历史上的南北分治，程朱等人的理学著作未能传播到中国北方。姚枢

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敦颐）祠，以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人配享，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赵复教授。刘因有机会得到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及吕祖谦等人的著作。他“闻风妙契，能自得师”，为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扬，为理学普及于民间并最终被确定为统治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因寿命不长，只活了45岁，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便过早地辞世，开馆讲学仅仅在元初忽必烈至元年间的二十几年。如果说元代理学的传播滥觞于赵复和太极书院，继起阐扬的则是刘因。而文靖书院继刘因之后，“大抵祖述刘公之训”，将理学思想继续传播50余年，直至终元之世，在元代理学传播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迹。元末的至正四年（1344年），顺帝妥懽帖睦尔赐额“文靖书院”，正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威对书院贡献的肯定。

结 语

在元代的三大书院中，文靖书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三大书院中惟一皇帝敕赐的书院。

其创办时间稍晚于燕京太极书院，窝阔台十二、十三年（1240—1241年）姚枢协助杨惟中创建太极书院。书院以伊洛道学为宗，“推本谨始”。其后的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涿州房山县怀玉乡抱玉里人赵密、贾壤建文靖书院，传播刘因学说。谏议书院比文靖书院晚42年，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

燕京太极书院虽早，随着元代官学的陆续开展，作为官办书院的太极书院逐渐衰落，以至于了无声息。而文靖书院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创立，直至元末明初，由贾氏家族几代人主持讲席。

700年后的今天，燕京太极书院和昌平的谏议书院的踪迹，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靖书院成为惟一能找到确切地址的书院。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书院文化是北京文明的重要内容。从弘扬首都古老的书院文化出发，有必要对文靖书院深入研究，在遗址上恢复重建。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舒小峰局长的大力支持。舒局长对房山元代的文靖书院十分关注，此前在担任《前线》杂志社社长期间，提供了文靖书院的重要线索，希望笔者能对文靖书院的具体位置和详细情况进行研究。他担任市文物局局长后，继续关注文靖书院，笔者又得到舒局长惠示，并提供文靖书院创立者之一赵密家族的关键文献《元故鹰坊都总管赵侯墓碑铭》、《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特做说明，并致谢忱！

①（明）陈循等修：《寰宇通志》卷1，《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②（元）苏天爵著：《滋溪文稿》卷15，《适园丛书》本。

③（元）苏天爵著：《滋溪文稿》卷11，《适园丛书》本。

④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贾和墓道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75页。

⑤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贾壤墓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35页。

⑥⑦（元）苏天爵著：《滋溪文稿》卷19，《适园丛书》本。

⑧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精华”《康信墓志》。

⑨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康氏先莹碣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98页。

⑩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杨氏先莹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88页。

（作者为北京市房山区政协文史干部）

明清时期通州城垣修建考

李伟敏

城垣及其附属设施是封建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作为城防设施，在捍卫民生、保障地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同时城垣又是反映城市规模的主要指征，直接关系到城市形制和空间格局的变迁。明清时期是通州城市发展史上最主要的阶段，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南粮北调的集散地，“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所往来，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①。明清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通州城垣的修建与修缮，明初城垣的修建、景泰和成化年间新城的兴建、正德六年（1511年）增修新城及敌台、万历年间修缮新城及护城河的开挖以及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旧二城合而为一，对通州城市形制格局的变迁影响较大。研究明清时期通州城垣的发展变迁，对揭示通州城市规模、形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代通州城垣的修建

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北上汴梁，与征虏大将军徐达等计议北伐元大都。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率兵三千攻打通州，全歼元军并占领通州。八月，明军夺取大都，明太祖朱元璋随即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由徐达部将孙兴祖领大都督分府事，镇守北平。元顺帝北逃上都开平后，不甘心失败，多次派军攻打北平府，妄图卷土重来。通州作为北平府的东大门，是明军抵御蒙古残余势力、捍卫北平府的重要门户。而元末因“隳城郭”，通州城仅“编篱寨为城”，这样的城垣显然难以发挥其“以资捍卫”的作用，通州城垣的修建势在必行。洪武元年闰七月，

孙兴祖督帅军士修其城，整修后的城垣位于潞河西岸，整座城池由砖石砌筑，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六尺^②。城门四座，东门名通运，西门曰朝天，南门曰迎薰，北门曰凝翠，城门上各有城楼。整座城池“峻整严固，屹然为京东巨镇”^③。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后，由于“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④，为了供给数十万将士以及北京居住人口的食粮，每年都要从南方征集大批粮米输运北京，漕运量大增，作为漕运尾间的通州地位日渐重要。为了储存巨额漕粮，明朝政府在通州设置了众多粮仓。永乐五年（1407年），因“淮安、河南漕运皆至通州”，特命增设通州左卫，“建仓庾以贮所漕运之粟”。永乐七年（1409年）设通州卫仓（西仓）^⑤。宣德以降，为了扩大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通州粮仓。如宣德六年（1431年），增置北京及通州仓^⑥。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五卫仓名，在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仓，并令修通州等卫仓143间^⑦。

但洪熙、宣德年间，明政府对于定都北京还是还都南京未能决断，因此仅对通州城垣进行了局部修缮。宣德六年六月，因通州西门通京师，仓廩亦在门外，“而月城角门旧砌窄狭，止通小车单行，今行者多，常壅塞不便，故奏请更而广之”，行在工部遂奏请修通州西门，宣宗仅命俟农闲时加以改作^⑧。宣德八年（1433年）闰八月，都指挥刘斌重修通州城楼^⑨。宣德九年（1434年）八月，通州城垣及北门坝道均遭大雨损毁，行在工部奏请令通州左卫等修葺通州城垣及北门坝道，宣宗命农闲时予以修治^⑩。正统元年八月，修通州城

垣坝道^①。

随着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正式下诏定都北京后，通州地位益加重要，不仅为“仓庾都会”，且因地“密迩京师”，逼近都阙，号为“畿辅咽喉”。明朝中央政府对通州仓储十分重视，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和监督制度，“其漕运之廩仓也，在京通者则有总督太监、户部尚书或侍郎，巡仓则有御史，拨粮则有员外郎，监收则有主事，以至仓使、攒典各有人焉”^②，通州城修建了不少管理仓储事务的衙署。明初通州城池的规模已与其“左辅雄藩”、“天庾重地”的地位不相适应，通州地位的日渐上升与众多衙署的修建对城垣的拓展提出了迫切要求。

通州新城的展拓是在明景泰、成化年间完成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通州城外的大运西仓。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大举南犯，八月于土木堡重创明军并俘获明英宗后进逼北京城下，监守通州大运西仓的官员以粮仓位于城外无以保障为由，悉数逃去。为保通州粮仓所贮粮食不落敌手，景泰元年（1450年）九月，户部奏请以镇守及巡仓官在通州城外修筑城堡以保护粮仓。因筑城事起仓促，加之明政府忙于北京保卫战，故仅在通州城外兴建土堡一座以护大运西仓^③。景泰二年（1451年）正月，因担心土堡不够坚固，未能持久，廷臣集议在土堡外砌筑砖石，景泰帝诏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寿前往通州负责砌筑砖石工程^④。

在土堡基础上兴建通州新城的工程由总督粮储太监李德、镇守都指挥陈信负责实施，新城完工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嘉靖）《通州志略》记载，新城高三丈二尺，周围八里^⑤，东连旧城西南面，西面为门二，一曰南门，一曰西门，亦各有楼^⑥。至此，通州遂形成了新旧两城并存的状况，其平面呈“吕”字形。

通州新城是在也先大军进逼京师的危急情况下仓促修建的，城墙、城门等主要设施均未按照规制修建。而通州因为密迩

京城的地理位置，加之四方贡献、南北粮运皆往来贮积于此，城池的防御不可不谨严。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一月，镇守通州的都督同知陈逵、监察御史徐镛奏请拆除旧城西面，拓展新城北角与相连接，“增其丈尺，使上下齐一”，同时增建瓮城、敌台，于城北开一门以通河道。明宪宗仅命陈逵会同巡抚右佥都御史汪霖审核后奏闻^⑦。因未见有关此次增修通州新城的史料记载，故而增修工程是否最终实施不得而知。

通州新城及敌台的增修最终是在正德六年完成的。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蒙古鞑靼部小王子乘孝宗逝世之机侵犯宣府，朝廷先后派都指挥陈雄、张澄及都督李俊、神英各率京军前往，小王子部大掠后退去。同年八月转掠大同，十月以数万骑犯固原。蒙古小王子屡次入边，直接威逼京师安危。在此背景下，弘治十八年，太监张永奏请改筑通州新城，工部以民穷财尽，兴役为难为由复奏，武宗命户部官员会议复奏。是年十月，工科都给事中王缙奏称：“营卒停止工作已有成命，今兹之议，得非欲诏旨之行，以愜輿情乎？夫新城之筑已久，未闻他虞，乃无故而劳费，诚非急务，况泰陵之役方举，京营士卒未得息肩，乞寝其请为便。”工部覆奏从王缙所请^⑧。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监察御史杨仪奏称，万一蒙古小王子部深入，通州所积仓粮徒遗之食，奏请在京官军人等预支数月的俸禄米，同时尽撤通州粮仓并迁置京城之隙地。武宗命下廷臣集议，廷臣复奏称，通州粮仓共七百余间，仓促之间不可全迁，通仓粮共六百余万石，亦非旦夕支放可尽，不如增筑新城以为保障粮储之计，同时奏请增修垛口角楼以防不测。武宗从廷臣所请，下诏增修通州新城^⑨。

通州新城的增修由都察院右副督御史李贡负责。正德五年（1510年），都察院右副督御史李贡任顺天巡抚，他视察通州时见“城池卑隘，砖石剥落，内外出入可登而越也”，深以为忧。正德六年，李贡以通州乃“国储所在”为由奏请增修通州城池。武宗命户部左侍郎邵宝、兵部左侍郎李浩、工部右侍郎夏昂率僚属前往通州协助增修。此次兴工不数月即已完成，“新城旧基，增筑五尺，其外为砖，内实以土，上复为垛墙六尺有咫，而长广皆如其数。又为敌台，其西南为瓮城，重门悬桥，皆旧所未有”^②。正德十六年（1521年），通州东门楼毁于火灾，直至嘉靖年间仍未修复^③。

嘉靖、隆庆年间，通州城池有小规模修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月，从右佥都御史王忬所请，世宗诏命修通州新城^④。嘉靖三十年（1551年）六月，增修通州城垣竣工^⑤。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从御史蒋机奏请，穆宗诏命增筑通州月城，以加强通州城垣的防御^⑥。

万历年间，通州城池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修缮，不仅新城、旧城得到修葺，而且疏浚了护城壕，并引通惠河水注之。万历十二年（1584年），知州张士奇修旧城^⑦。万历十五年（1587年）四月，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奏请修通州城，他认为通州乃“京师咽喉”，且“内拥京畿，外薄夷虏，边城之尤要者”，而通州旧城倾圮，修葺约需三四万金，可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通州输往太仓银中分量留几万^⑧。顾九思的奏请得到神宗皇帝同意。万历十九年（1591年），密云兵备副使王见宾以通州城圯难守为由，奏称急宜修筑通州新城以严保障，并在奏本中详细陈述了修筑新城的原因：通州为畿辅咽喉，新城为粮储重地，非他郡城可比。而通州新城因陋就简，規制单薄，以致未久坍塌。今警报频仍，修筑委不容已。经过大加拆修后的通州新城，“连垛墙高三丈五尺，厚丈余，长一千三百四十丈有奇。南门题曰望帆云表，西门题曰五尺瞻

天”^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户部郎中于士廉监督通州仓政，巡视通州护城壕时发现壕沟内无水，他认为可引通惠河水进入护城壕，这样护城壕不仅变成护城河，还可通漕舟，以省陆挽之劳，遂将此事上报户部尚书杨褚。杨褚又将此事奏请朝廷，神宗同意杨褚等人的提议。疏浚工程始于万历二十二年三月，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竣工。完工后的护城河“长三千三百余丈，加深二尺许，广视深四倍之，建闸一，桥四”^⑩。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通州霖雨连绵，城四关均圯塌无可防守，城垣损毁达一千二百余丈，合并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久塌的城垣，共一千七百三十余丈。知州梅守极及直隶巡按邓溪奏请及时缮修^⑪。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八月，工部从直隶巡按邓溪等修缮通州之请^⑫。万历三十七年（1610年）二月，知州陈随以通州城垣圯塌为由申请修葺。密云兵备副使等官员查勘通州新旧二城，统计城垣坍塌情况，砖城坍塌四百九十余丈，垛口一百七十余丈，里面土城一千余丈，提议将天津营军夫二千五百名，协同本州营军一千五百名共同修筑通州城池。至本年九月，修筑工程竣工^⑬。

崇祯年间，通州城池亦进行了几次修缮。崇祯三年（1630年），总兵杨国栋增修新城，城墙较此前加高若干尺，厚度亦有所增加^⑭。崇祯四年（1631年），兵部左侍郎范景文于通州练兵之际与通州道张春、总兵杨国栋阅视通州，他认为通州旧城东北受冲，新城西南晒米厂可容万马，更受敌冲，提议于旧城东北增建敌台一座。增修后的敌台形状如扇面，自左至右长十二丈，高三丈七尺，分中、下、上三层，俱有炮门^⑮。

二、清代通州城垣的修缮

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后，通州作为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没有改变，且通州粮仓主要用于发放在京王公贵族、文武百

官的俸禄米和八旗兵丁的甲米，因此通州城垣的修缮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朝通州城垣的修缮主要集中于康熙、乾隆二朝，尤以乾隆三十年（1765年）拆除旧城西墙，新旧二城合而为一最为重要。

康熙九年（1670年），因通州新、旧二城共坍塌二十余处，知州宁完福申请顺天巡抚修葺通州新、旧二城，两月竣工。修缮后的通州旧城周长一千六百二十六丈五尺，新城周长一千二百六十三丈，城根宽三丈四尺，顶宽二丈三尺，城身外高三丈四尺，内高二丈二三尺至三丈不等^③。康熙十八年（1679年）通州发生地震，垣墙坍塌数处，因未能及时修葺，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通州城东南隅一带尚未修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知州朱英曾修葺通州新城南门月城一段。乾隆二年（1737年）通州新旧二城坍塌，加之护城河道常年河沙淤积以致河道变浅，知州韩亦诗奏请疏浚护城河道，同时以挑挖河道之土为修城土方之用，“且筑且浚，更于运务有济”。他的奏议经仓场总督、户部侍郎塞尔赫奏准后，开始动项兴修，同年还疏浚了城壕^④。

乾隆年间，乾隆帝认为“城垣捍卫民生，所关綦重”，因此不惜帑金，多次晓谕各省督抚地方督抚“上紧兴修，以资巩固”，同时要求各地将土城改建砖城，以“壮观瞻而资巩固”^⑤。在此背景下，乾隆三十年（1765年），通州城垣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改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乾隆帝就各省城垣是否完固发布上谕：“城垣为地方保障之资，自应一律完固以资捍卫……着各省督抚飭令该管道府，将所属城垣细加查勘，如稍有坍塌，即随时修补，按例保固。仍于每年岁底，将通省城垣是否完固之处照奏报民谷数之例缮摺汇奏一次”^⑥。乾隆三十年，经直隶总督方观承奏准动项重修通州新、旧二城。此次改建中将旧城西面城墙拆去一百八十二丈，周围实长二千七百七丈五尺，并添建女墙高一丈六尺。旧制城根宽二丈三尺，将城顶减

去三尺，净宽二丈，形势相称。所有裹皮城垣，全行改砌沙滚砖墙。墙外皮粘补系通永道玉神保、知州万廷兰承修。改建后的通州新、旧城合而为一，共为五门，各建重楼^⑦。旧城通运、迎薰、迎翠三门名，新城望帆云表、尺五瞻天二门名，俱仍其旧^⑧。自此，通州城池改变了自明景泰年间形成的新旧二城并存的格局，形成了“刀”字型的城市格局与规模，这种城市格局一直延续至清末。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十六年（1771年），通州大雨，城墙续有坍塌，知州龙舜琴续修^⑨。

道光十七年（1837年），御史李熙龄奏修通州城，因未能筹集足够的维修款项暂停。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因通州城垣坍塌过多，且敌楼门扇亦有损坏残缺之处，仓场侍郎全庆等奏请整修城池。经查勘，其时通州城垣周围计长二千七百余丈，里外城身倒塌共计一千一百余丈，已占整个城垣周长的十分之四。如果一律修整，工程浩大，需费甚巨，非仓卒之间所能办理。因此全庆等奏称将里坏坍塌处所及城楼海墁、垛口等工程暂行缓修，谨择其外坏坍塌段落及裹外倾圮缺口，统计三十余处，约计三百余丈并损破城门二十四扇及甕口等工一并修整。修缮工程由通州士绅程杰、李右文、丁鹤皋、李焕文董其事，兼管府尹贾楨筹款兴修。重修后的通州新南门题曰灌辅，西门题曰神京左辅^⑩。

清朝末年，南北大运河失修，加之漕运体制弊端重重而至漕粮转运困难。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试行海运，漕粮由海船运到天津卸岸，自天津用小船沿北运河运至通州，再经通惠河入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京津铁路竣工，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漕粮改用火车运入北京，不再转道通州。通州遂失去了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随着漕运的停止，清政府对通州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减弱，城内大量漕运衙署、官僚机构裁撤，通州市井萧条，人户锐减，经济凋敝，通州城垣亦日渐破败。

明清时期通州城市规模及发展变迁，因其位于大运河最北端及临近都城的重要地理位置，始终为国家力量所强力掌控，城垣的修建与修缮皆是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的政府行为，完全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与特征。无论是明初为抵御蒙古残余势力、捍卫北平府整修通州城垣，还是景泰、成化年间为保护通州城外的大运西仓而兴建新城以及正德年间为保障粮储而增修通州新城，无不体现出其服务于京城和漕运的从属性。入清后通州城垣的历次修缮亦多因其“粮储重地”、“畿辅咽喉”的特殊地位。清末，伴随大运河的失修和铁路运输的兴起，通州失去其漕粮入京转运枢纽的地位，城垣修缮陷于停滞，城市亦日渐衰败。

①（明）杨行中纂辑、刘宗永校点：《嘉靖》《通州志略》卷一《形胜》，中国书店2007年版。

②关于明初通州城垣的规模，史料记载不一，主要存在两种说法：其一，（嘉靖）《通州志略》、《钦定日下旧闻考》等载：（通州）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六尺；其二，（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等载：（通州）周围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

③⑬⑭（嘉靖）《通州志略》卷二《建置志·城池》。

④（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八《漕运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明太宗实录》卷七三，永乐五年十一月戊辰；卷九四，永乐七年七月丁丑、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⑥《明宣宗实录》卷八十五，宣德六年十二月庚戌。

⑦《明英宗实录》卷十四，正统元年二月丁未；《明英宗实录》卷十五，正统元年三月甲戌。

⑧《明宣宗实录》卷八十，宣德六年六月乙巳。

⑨《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五，宣德八年闰八月戊午。

⑩《明宣宗实录》卷一百十二，宣德九年八月壬子。

⑪《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一，正统元年八月丙子。

⑫（明）谢纯撰：《漕运通志》卷六《漕仓表》，

据明嘉靖七年杨宏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⑬《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废帝郕戾王附录卷十四），景泰元年九月癸卯。

⑭《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废帝郕戾王附录卷十八），景泰二年正月甲寅。

⑮关于通州新城的规模，史料记载亦存在两种说法：其一，（嘉靖）《通州志略》、《畿辅通志》等载：（新城）高三丈二尺，周围八里；其二，李东阳：《重修通州新城记》、（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等载：（新城）周围七里有奇，高止丈余。

⑯《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壬戌。

⑰《明武宗实录》卷六，弘治十八年十月辛酉。

⑱《明武宗实录》卷九，正德元年正月丁未。

⑲李东阳：《重修通州新城记》，载（嘉靖）《通州志略》卷二《建置志·城池》。

⑳《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乙丑。

㉑《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嘉靖三十年六月癸未。

㉒《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酉。

㉓⑳㉔㉕（清）高天凤修、金梅纂：《乾隆》《通州志》卷二《建置》。

㉖《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万历十五年四月戊寅。

㉗⑳㉘㉙㉚（清）吴存礼修、陆茂腾纂：《康熙》《通州志》卷二《建置》。

㉛《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八，万历三十五年九月癸巳。

㉜《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九，万历三十六年八月丁巳。

㉝《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五十一，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丁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㉞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二十四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版。

㉟（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八《京畿·通州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㊱（清）高建勋等修、王维珍纂：《光绪》《通州志》卷二《建置》；《光绪》《通州志》卷十《艺文》。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论正阳门禁灵柩通过之规制

李 晴

正阳门始建于元代，在明清两代为京师内城的正南门。清顺治朝实录有记载：“谕民间丧葬毋出正阳门。着为例。”其意为禁止民间丧葬的灵车经过正阳门。这样的记载，源于正阳门不但具有一般城门城墙军事防御的功能，还是一座重要的礼仪之门。

一、礼仪之门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营建京城的过程中将元大都南城垣南移一公里，上面开辟三门，居中者为丽正门，即后来的正阳门。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①，以完善各门的“楼铺之制”。正统四年（1439年），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楼正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

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②虽然明代和清代早期关于正阳门的建筑资料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难以查询，但从上述实录记载中不难看出，正统四年修建后的京师九门中，正阳门城、箭楼的高度、规格以及整体建筑的规模均高于其他城门：正阳门不仅箭楼开辟城门，还在瓮城东西城垣上开辟城门，并建东西闸楼各一座，而其他八门箭楼均不设门，瓮城上也仅开辟一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抵御北方蒙古部落的袭扰劫掠，保民众平安，明世宗朱厚熜诏令修筑北京外城，修建后的外城七门无论规模还是规制均逊于内城城门。由此，在京师诸门中，正阳门以其“宅中定位，气象巍峨，所以拱仰宸居，隆上都而示万国”^③的位置和作用，所以



正阳门瓮城

“规模制度，究未可稍涉庠隘，致损观瞻。”^④因此，正阳门自建成伊始，就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隆崇的形制，成为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和国家威仪双重作用的礼仪之门。

礼仪之门最独特之处在于其箭楼开设的门洞，《宸垣识略》中记载：“正阳门外门设而不开，惟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⑤。明代《酌中志》也记载：

“凡冬至圣驾躬诣圜丘郊天，并耕藉田。崇祯辛未年五月初一日，今上因旱诣圜丘步祷，咸由正阳门出也。”^⑥说明正阳门箭楼开辟的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经过时才开启使用，而商贾官兵及普通百姓只能通过东西瓮城的闸门，再经由城楼之门进出正阳门。民间流传的“九门走九车”的故事：朝阳门走运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安定门、德胜门分别走出征打仗和德胜归来的兵车，西直门走运水车，阜成门走运煤车，宣武门走囚车，崇文门走酒车；正阳门走轿辇或宫车等所谓的“龙车”，即是取材于此。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正阳门城、箭楼在战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城台以上的部分几乎全部毁坏。即便如此，清政府与侵略者议和后，慈禧太后回銮京师依然要从正阳门入城，留下了清廷在来不及修缮的城台上搭起纸牌楼充数的故事。

清初著名画家王翬所绘《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⑦，以及乾隆朝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的《乾隆南巡图》（第一卷“启蹕京师”）^⑧两部历史画卷，均展示了皇帝仪仗经由正阳门进出京城的威仪和排场。

除了箭楼专为皇帝出行和回銮而开启使用的仪式，正阳门城楼也举行过其他特



乾隆南巡图（第一卷局部）

殊的仪式。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已在西安建立政权的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一路北上，逼近京畿。时任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李建泰自愿输家财以饷军，率兵出城平定起义军。崇祯皇帝为表彰他，效仿古人行推毂礼，在正阳门城楼举行仪式，为李建泰把酒饯别送行。

因为特殊的地位和礼仪作用，所以“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而“余皆不禁”^⑨，至清初，顺治朝实录也有了本篇开头“谕民间丧葬毋出正阳门。着为例”^⑩的记载。

二、正阳门禁走灵车

如果说百姓丧葬的灵车不得出正阳门，那么基于正阳门的礼仪作用，在清代，皇帝梓宫出城是否以通过正阳门而彰显其特殊的身份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大清会典》中相关的清代礼仪制度，对清代皇帝死后梓宫停放、出城奉安山陵的过程做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清朝皇帝去世后，通常先停棺于皇宫正殿，供皇亲国戚和各路官员进行祭奠。然后要移梓宫于殡宫停放，之后再出殡奉安梓宫于山陵。这其中，有一系列繁杂的仪式和规章制度。清朝十二位皇帝中，太

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去世于清入关之前，《大清会典》等史籍中关于太祖努尔哈赤灵柩停放的详细地点没有明确记载，仅记载停于沈阳宫中。太宗皇太极则停灵于沈阳皇宫的崇政殿。其他十位皇帝均去世于清入关之后，除宣统皇帝外，他们去世后先停棺于乾清宫（道光皇帝梓宫停于乾清门正中），之后梓宫移至殡宫，世祖顺治帝和圣祖康熙帝的殡宫设在景山寿皇殿，世宗雍正帝因登基前居住于雍和宫，死后殡宫设置在雍和宫永佑殿，高宗乾隆帝、仁宗嘉庆帝、文宗咸丰帝、穆宗同治帝和德宗光绪帝死后殡宫均设在景山观德殿，宣宗道光皇帝的殡宫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实际上，梓宫出城是发生在灵柩从殡宫到陵寝的过程中的，于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存在灵柩是否进出正阳门的问题。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清世宗实录》等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是，康熙帝梓宫由朝阳门出城，安葬于清东陵之景陵；雍正帝梓宫由安定门出城，安葬于清西陵之泰陵；乾隆帝梓宫由朝阳门出城，安葬于清东陵之裕陵；嘉庆帝梓宫由阜成门出城，安葬于清西陵之昌陵；道光帝梓宫从城外圆明园起灵，安葬清西陵之慕陵；咸丰帝梓宫由东直门出城，安葬于清东陵之定陵；光绪帝梓宫由阜成门出城，安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梓宫出城所经由城门的选择上，依据的是其具体安葬地点是东陵还是西陵。清代皇帝的陵寝，主要是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西南方向河北省易县的清西陵。通过查阅史料，在清朝的典章制度中对于梓宫进出城经由的城门，并没有任何明确的限制和规定，而是以方便为前提的。实际上，安葬于东陵的皇帝灵柩出城主要以朝阳门为主，而安葬于西陵的皇帝灵柩出城主要以阜成门为主。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例如，雍正皇帝虽然安葬在清西陵，但出殡时经由的是东北方向的安定门，这是因为在清代北京各城门中，安定门是距离雍正帝殡

宫雍和宫最近的城门。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清实录》等史籍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帝王的隆重复杂的丧葬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不但要对去世的皇帝按规定进行祭奠，甚至要像对待他们活着时一样按时进行三餐、茶点等的侍奉。同时，对于不同身份的宗室成员、文武官员、百姓等进行了包括戴孝着素服时间、不允许嫁娶的时限、禁止娱乐活动的时限、甚至每天要求哭丧的次数和时间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清代帝王死后，其尊贵的地位是由完备的丧葬制度和复杂、隆重的葬礼仪式所表现的，与经由哪个城门出城并无实际关系。由此，正阳门不走灵车的制度虽然只是对寻常百姓的要求，实际上皇帝也没有打破这个限制。那么，正阳门这座礼仪之门究竟是否有灵柩通过呢？

三、旧规制的打破

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由北京迁葬南京，奉安南京中山陵，民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奉安仪式，灵柩出北京城，经过的正是正阳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共和体制，随之而来的是旧礼制的逐渐废止，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先生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灵柩出正阳门的照片，也为多数人所熟知，于是这一举动往往被认为是旧制度被打破的象征，而孙中山先生则被认为是灵柩第一个通过正阳门打破了旧制的人。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有迹可考的是也有人的灵柩从正阳门经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太后——隆裕太后。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清帝逊位换得了民国政府给予清皇室的优待条件。签发《宣统帝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因此被民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在1913年2月22日46岁的隆裕太后去世后，时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立即派要员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副总统黎

元洪更是唁电称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其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民国政府为隆裕太后举办了包括“国民哀悼大会”在内的隆重葬礼。期间，不仅各政府机构降半旗致哀，各使馆也降半旗。

隆裕太后去世后梓宫安放在紫禁城皇极殿内，供前朝皇族和王公大臣们祭奠。哀悼会过后的1913年4月3日，在民国政府仪仗队和满族传统仪仗的引导下，隆裕太后的梓宫被抬出宫，经由正阳门城楼被送往前门火车站，搭乘当时最为先进快速的交通工具火车，前往河北易县清西陵梁各庄行宫安放，等待修建中的陵寝完工后，与光绪皇帝一同下葬。这里还要提一句，隆裕太后的姑母兼婆婆、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死后，梓宫是经由东直门出城，安葬于清东陵的。隆裕太后的一生充满了悲剧的色彩，特别是退位诏书的签署，使她在人生最后岁月里时时感到愧疚和悲伤。她被迫顺应时代潮流，拥护共和的行为让她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她死后葬礼的隆重程度恐怕是她难以想象到的，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她实际上成为打破祖宗旧制，灵柩第一个通过正阳门的人。

如今，正阳门仅存的城楼、箭楼两座建筑，早已不再具有城市军事防御的功能，

也不再专为封建王朝具有最高社会地位的皇帝经过而开启使用，但它承载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历经沧桑依然屹立，成为一座完全意义上的礼仪之门，是北京城的标志之一。

①《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钞本明实录》第五册，线装书局，2005年9月，第131页。

②《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四，《钞本明实录》第五册，线装书局，2005年9月，第281页。

③④朱批奏折：“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尹陈壁奏为正阳门楼原建丈尺无案可稽谨会同酌拟办法请旨事奏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63页。

⑥（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26页。

⑦《康熙南巡图》描绘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从离开京师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以及人文风光等。其中第十二卷描绘康熙一行结束南巡，经由正阳门，回銮紫禁城的情景。《康熙南巡图》共十二卷，其中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⑧《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南巡沿途大江南北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貌。其中第一卷“启

辟京师”描绘的是乾隆皇帝经由正阳门、宣武门、广宁门出城，过宛平县拱极城、卢沟桥等，前往良乡县黄新庄行宫的情景。《乾隆南巡图》共十二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40页。

⑩《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五，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1627页。

（作者为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馆员）



孙中山先生灵柩通过正阳门

国子监辟雍池桥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

姜玲

古都北京有大量的文物建筑，文物建筑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文物建筑的安全不仅关系到文化遗产的传承，而且关系到旅游开放和使用中的公众安全。2008年国子监辟雍池桥的石桥板突然出现断裂，给游客和文物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本文通过对池桥的外观检查、基本材性检测、桥板底面损伤情况检查、超声波探测石桥板内部缺陷等，分析研究了国子监辟雍池桥的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方案，有效地保护了文物建筑的安全。经过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后的池桥，正常使用至今（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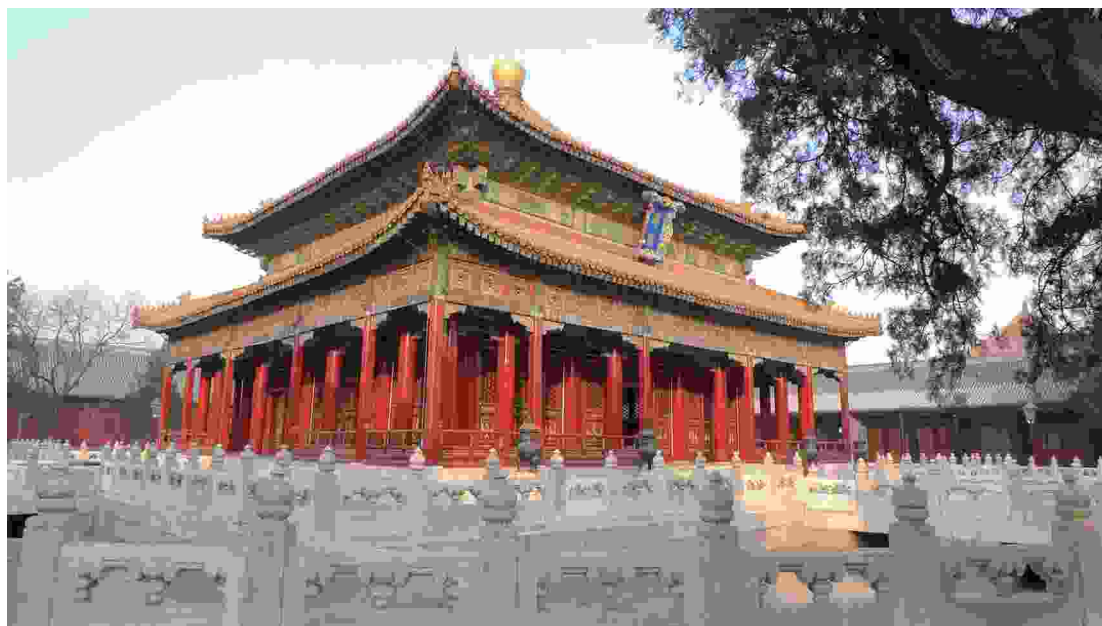
一、国子监辟雍简介

国子监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北京市的名胜旅游景点，辟雍大殿为北京“六大宫殿”之一，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我国现存最高等级的古代“学堂”。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从清康熙帝开始，皇帝一经即位，必须在此讲学一次。辟雍按照周代的制度建造，坐北向南，平面呈正方形，四周以回廊和水池环绕，池周围有汉白玉雕栏围护，池上架有石桥通向辟雍的四个门，构成周代“辟雍泮水”之旧制。

二、池桥概况

东南西北四面的池桥是通往辟雍的必经道路。桥体为三孔石平桥式，桥墩为花岗石砌筑，桥面为青白石铺就，两侧汉白



图一 辟雍池桥



图二 南池桥桥面板断裂状况

玉制三幅云净瓶石榴头禅杖栏杆与池岸栏杆交圈。在两百余年的使用中，桥板石材逐渐老化，出现了安全隐患。2008年6月，南池桥的一块桥板突然断裂，坠落池中。桥板的断裂提醒我们，池桥的安全隐患可能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

南池桥断裂的桥面板位于中跨西数第二（图二），该面石断裂前无明显先兆，是在一队游客通过此处后突然发生的。石桥板断裂后落入水中，南半段落底后又摔成两块。初始断裂截面上有明显的陈旧断

碴，面积已达石桥板横截面的50%，为早已存在的安全隐患。

四座池桥已建成使用200余年了。石桥板材本身材质不均、存在裂隙，风雨侵蚀、反复冻融等自然力破坏，以及常年的通行使用，都可能使石桥板先天的不足日益恶化、石桥板内部裂缝持续加宽加深。

现场初步勘察发现，南池桥桥面其他部分和东、西、北池桥的全部石桥板、压面石都普遍存在裂缝。石桥板本身也存在着材质不均、有带状间隙等的先天问题，如表1。

表1 石桥板、压面石勘察结果

位置	总数	有裂纹	比例	材质不均	比例
南池桥	27	15	55.6%	8	29.6%
东池桥	27	11	40.7%	17	63.0%
北池桥	27	8	29.6%	12	44.4%
西池桥	27	16	59.3%	16	59.3%
总计	108	50	46.3%	53	49.1%

根据此次石桥板断裂的情况勘察，可以推断其他各处石桥板断裂的危险是存在的，仍然有可能再次发生突然断裂。但仅从外观还不能直接判断石材是否会断裂，还需要进一步查明构件内部隐蔽性的损伤。通过对辟雍四座池桥的桥体结构的承载状况进行技术检测后，提出池桥结构安全性鉴定和合理加固与保护方案。

1. 池桥结构外观检查：

抽干池水后，对池桥的结构进行了外观检查。四座桥结构大体相同，池桥侧貌见图三。实测结构详细尺寸为：中跨净跨

尺寸2.5米，边跨均为2.0米；桥面宽度6.6米，各跨均由11块天然石面板组成，桥墩用矩形花岗岩块体砌筑。池水深0.5米，水面至桥板底面高度0.5米。

因南石桥桥板断裂后，及时增设了保护木地板。为不阻断进入辟雍的主通道，将检测工作分成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主要检测评估北、东、西三座石桥，并提出加固方案。第二阶段为南池桥的检测评估及加固工作。本文主要分析研究了第一阶段北、东、西三座石桥的检测评估与加固。

全面检查了北、东、西三座桥的结构



图三 池桥侧貌

现状。各桥墩整体性完好，承载状况正常。

石桥板属于主要承重构件。石桥板宽均为 0.6 米；中跨的长度 3.0 米，边跨 2.5 米；厚度为 0.3 米左右。石桥板两端支承在桥墩上，相邻两跨石桥板支座之间设压面石填平。石桥板受力状态属于简支板，承受的荷载为自重和桥面活荷载。

石桥板由天然毛石料加工而成，顶面和两侧经磨平处理，底面为毛糙劈面。各石桥板的原始厚度并不一致，历经 200 余年的使用和自然风化作用，很多石桥板底

面产生了严重的剥落损坏，有效厚度明显减小。首批采用激光自动扫平仪测量的北、东、西三桥各板实际厚度如表 2。

表中的 99 块板平均厚度为 321mm，与平均厚度相比，6 块板厚度小约 10%，11 块小约 20%，2 块小约 30%，1 块板小 42%。桥板厚度减小，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桥板的承载力。

石桥板的受力状态为简支板。在荷载作用下，桥板顶部受压，底部受拉，同时还受剪。板跨中部拉，压力大，靠支座部

表 2 实测三座池桥桥板厚度（单位：mm）

桥板编号	北 桥			东 桥			西 桥		
	边跨	中跨	内跨	边跨	中跨	内跨	边跨	中跨	内跨
1	332	338	297	352	349	305	300	315	356
2	340	363	332	347	367	317	350	315	224
3	325	338	337	324	330	367	262	370	375
4	327	293	257	237	332	317	250	340	280
5	322	358	337	307	255	379	391	360	304
6	305	253	267	337	320	362	342	330	335
7	322	345	347	302	356	365	348	330	293
8	258	363	257	302	330	240	345	325	325
9	185	308	335	362	340	326	290	330	325
10	379	263	212	305	335	285	305	342	280
11	350	350	307	337	315	345	370	350	330
平均厚度	313	325	299	319	330	328	323	337	312

位剪力大。

天然石材属于脆性材料。桥板石材的抗压强度很高。在现有使用条件下，板顶部受压区不会先于其他部位破坏。这类青白石的抗弯强度比一般脆性材料高。在标准中，房山白的抗弯强度为 15MPa。但石材对裂缝很敏感，带有裂缝的石材在拉力的作用下，强度比无裂缝者明显降低，并脆性破坏。因此，石材底部存在严重竖向裂缝或斜向裂缝的石桥板，直接评为危险构件。

厚度明显减小，或因板底剥落层减小了有效厚度的桥板，其承载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为定量评估厚度减小对承载力的影响，计算分析了 6 种厚度（150 ~ 320mm）桥板的极限抗弯承载力。计算条件为：简支板；桥中跨板的跨度取 2.5 米，边、内跨板取 2.0 米，板宽 0.6 米；石材容重 $2.9\text{g}/\text{cm}^3$ ；恒载为自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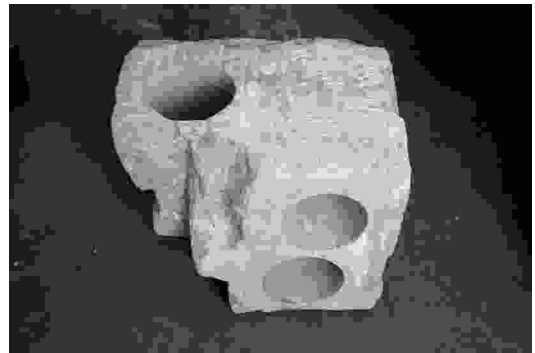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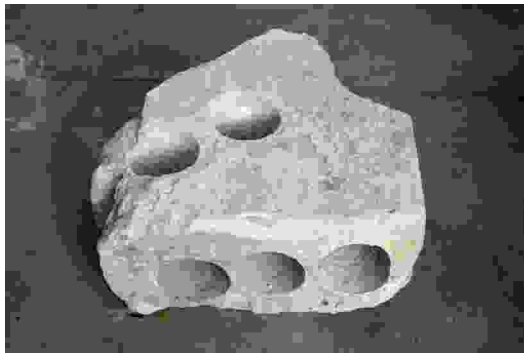
载 $3.0\text{kN}/\text{m}^2$ 。参照砖石结构的可靠度系数，安全系数取 2.2。分析结果表明，保证桥板安全使用的最小厚度为 200mm。考虑桥板底部很不平整，实测厚度存在误差，偏保认为桥板有效厚度不宜小于 260mm。

2. 石材基本材性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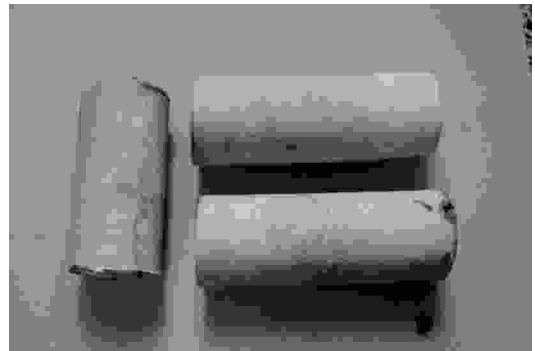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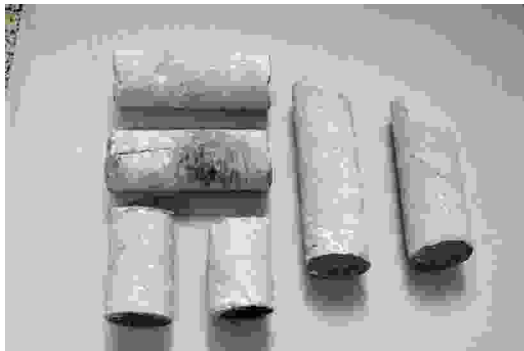
桥板石材为大理石。清朝皇家建筑的大理石多取自北京房山。与现行的石材分类图谱比较，桥板石属于房山白或相近的类型。主管单位帮助我们找到了 2 块过去遗留的同类残石料。为了解桥板石的材性，钻取直径 100mm 的芯样进行材性试验。石材样品和芯样试件见图四和图五。

碰巧，这两块石材具有这类天然石材的典型性。一块石料的材质均匀密实，内部无裂缝。另一块石料内部自然纹理很多，微裂密集，并有几条长裂缝从不同的方向贯穿石料。

从无缺陷石材取了 4 个芯样试件，检



图四 同类残石料



图五 钻取的试验芯样

表 3 房山白石材芯样试件试验结果

试件 编 号	容 重 (g/cm ³)	抗压强度 (MPa)	超声波探测		
			波速 (km/s)	波幅 (dB)	
1	2.8	173	4.5	105.8	102.2
2	2.9	164.8	3.7	105.8	101.4
3	2.8	176.6	4.1	104.3	99.8
4	2.9	166	4.3	105.1	100.9

注：上表波幅栏中，左行值的界面剂为黄油，右行为牙膏。

测其容重和抗压强度。检测结果见表 3。该石材的平均容重为 2.85g/cm³，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170MPa。采用 ZBL—U510 型数字超声波探测仪，对测法测定了超声波穿透石材的声时和波幅。4 个无缺陷石材芯样试件的超声波速平均值为 4.15 km/s，波幅平均值为 105.2 (dB)。检测值汇于表 3。

有缺陷石材的芯样与无缺陷芯样相比：超声波探测微裂缝密集部位时，波速变化不明显，波幅衰减明显；探测大裂缝时，波速变化明显、波幅衰减明显。试验表明，可以根据波速、波幅探测石料内部的缺陷，但测试结果离散性较大。

试验表明：超声探伤法可用于检测桥板石材内部的缺陷，但由于以往缺少石材探伤的工程经验，还需要结合实际工程应用总结经验。

超声波在现场应用时，必须解决好探头与被测体之间的声耦合方法。模拟实际情况，分别检验了黄油和牙膏两种耦合剂的效果，试验表明二者的耦合效果基本相近，见表 3。二者相比，声速相同，牙膏

的波幅比黄油略小，偏差 5% 以内。黄油粘稠，适于板粗糙底面。牙膏易清洗，不会污染桥面。

3. 桥板底面损伤情况检查：

外部作用对石桥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表及里的损伤。逐块检查了北、东、西三座桥的板底表面，发现的板底损伤主要有两种情况：

(1) 结构裂缝：裂缝由板底沿竖向或斜向向板顶延伸。这种裂缝主要与桥板受力有关，属于石材的弯曲或弯剪裂缝（图六）。南桥的断板即属这类情况。检查时，还发现西桥岸边有过去替换下的半块断板，从断口看，也是由这种裂缝导致断裂破坏（图七）。由于石材是脆性材料，扩展到一定深度时会造成桥板突然断裂。这种裂缝的危险性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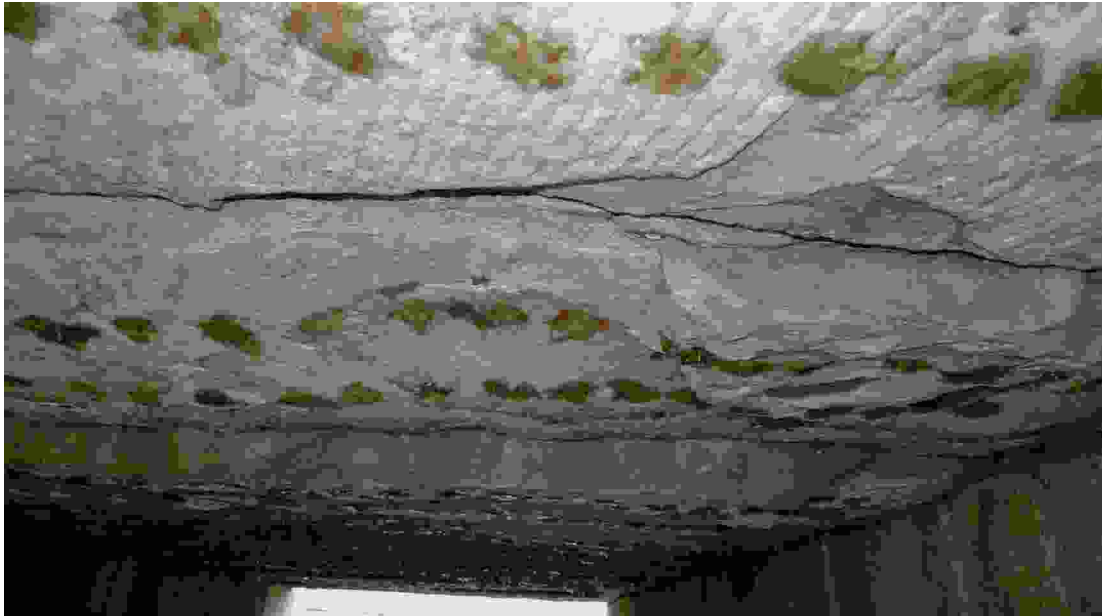
(2) 剥落裂缝：裂缝沿板底水平发展，严重的由几条水平缝在板底形成一个酥松剥落层（图八）。剥落层明显减小了桥板的有效厚度。剥落层脱落，是造成桥板厚度减小的直接原因。剥落裂缝由石材风化



图六 桥板 Bz 2 (板底斜、横裂缝严重)



图七 西桥旁的断桥板



图八 桥板 Bz 3 (板底局部剥落)

引起，桥板内力加剧了裂缝的发展。剥落裂缝缓慢侵蚀桥板厚度，直到桥板失去承载力。

4. 超声波探测石桥板内部缺陷

天然石材内部难免存在先天的材质缺陷。历经 200 余年的使用，原始轻微缺陷可能因外部作用而发展成严重的缺陷，成

为降低石桥板承载性能的安全隐患。

超声波法探测石材内部缺陷，以往无经验。参照《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 21: 2000)方法，对石桥板内部的材质进行无损检测。根据石桥的受力状况，重点检查会削弱板材纵向受力性能的裂缝或缺陷。在每块桥板底面、表面



图九 超声波探测桥面现场



图十 超声波探测桥板下接收情况

的横向三分点处,沿板纵向设置两行测点,测点间距为 100mm。检测时采用斜交叉法,水平测距 300mm,逐行扫描。测点布置及检测方法见图九、图十。

池桥的第 1 块和第 11 块为桥沿边板,板面设置了石栏杆,无法检测。故每桥跨检测 9 块板,为 2~10 号板。东、西、北三座桥总计检测 81 块板,总计数据 7000 多个。

表 4 列出西桥各桥板的声速、波幅的平均值,声速差异范围。数据差异表明桥板整体质量的差异程度。

缺陷评估比较复杂,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

(1) 局部测区的声速很慢,表明板内存在严重的断裂裂缝。

(2) 比较同一块板各测区声时和波幅测值之间的差异,用“规程”(CECS 21:2000)数理统计方法判别异常值。当某些值超出了置信范围,可判为异常值。异常值测区内部的材质疏松,故声速的异常值偏小,波幅的异常值偏小。

(3) 分析数据时发现,桥板之间的测试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统计声速慢的桥

板,板内缺陷相对严重。

超声波测缺评估,表中桥板的安全状况大致分为三类:基本完好构件,超声统计波速不明显低于无缺陷石材试件的波速平均值 4.15km/s;存在明显缺陷构件,统计波速和波幅明显偏低,表中用绿色表示;严重缺陷构件,统计波速和波幅明显很低,或局部测区的声速很慢,表中用黄色表示。

三、池桥结构安全鉴定

根据几种不同方法的检测和评定结果,石桥板存在的结构安全隐患为:

1. 底部大面积脱落,板厚度已减小 10%~40%。
2. 底部产生严重的竖向或斜向裂缝。
3. 底部产生严重的风化剥落层。
4. 局部区段存在内部严重质量缺陷。
5. 桥板整体质量较差。

东、西、北三桥石桥板安全性检测评估结果汇总于表 5~7。表中明确说明了评定为危险或已不适于继续安全承载的构件。B 类构件存在影响承载性能的缺陷。A 类构件承载状况基本正常。

表 4 西桥超声波检测结果

板序	外 跨		中 跨		内 跨	
	波速 (km/s)	幅度 (dB)	波速 (km/s)	幅度 (dB)	波速 (km/s)	幅度 (dB)
2			2.79	44.07	3.97	47.68
			2.60	41.87	3.87	48.30
3	3.93	48.41	3.34	44.85		
	4.22	51.97	3.28	42.56		
4	3.45	43.56	3.61	44.67	3.04	39.43
	3.45	45.71	3.34	38.89	3.12	40.08
5	5.69	58.53	3.33	46.77		
	5.63	47.52	3.74	45.31		
6	4.62	46.46	3.55	43.90	4.04	44.12
	4.15	53.63	3.75	43.53	4.15	42.69
7	4.07	47.94	3.75	45.87	3.66	44.37
	4.19	48.45	3.49	45.15	3.41	47.10
8	4.72	49.15	3.50	48.34	3.83	49.97
	4.86	54.13	3.34	45.05	4.15	42.77
9			3.82	45.76	3.36	25.53
			3.63	45.03	3.04	21.73
10	3.90	52.30	3.58	45.06	3.67	45.46
	3.67	46.85	3.50	45.02	3.41	43.09

表 5 北桥桥板安全性检测评定结果

桥名	外跨		中跨		内跨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北桥	Bw1	A	Bz1	Bw	Bn1	Bw
	Bw2	A	Bz2	板底裂缝严重	Bn2	A
	Bw3	A	Bz3	Bw	Bn3	A
	Bw4	A	Bz4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Bn4	Bw
	Bw5	A	Bz5	Bw	Bn5	A
	Bw6	A	Bz6	A	Bn6	Bw
	Bw7	A	Bz7	A	Bn7	A
	Bw8	A	Bz8	A	Bn8	A
	Bw9	Bnw	Bz9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Bn9	板支座斜裂缝严重
	Bw10	A	Bz10	A	Bn10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Bw11	A	Bz11	A	Bn11	Bw

表 6 东桥桥板安全性检测评定结果

桥名	外 跨		中 跨		内 跨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东桥	Dw1	板底裂缝严重	Dz1	A	Dn1	A
	Dw2	Bw	Dz2	A	Dn2	Bw
	Dw3	Bw	Dz3	Bw	Dn3	A
	Dw4	Bnw	Dz4	A	Dn4	Bw
	Dw5	A	Dz5	Bn	Dn5	A
	Dw6	A	Dz6	Bw	Dn6	A
	Dw7	Bw	Dz7	内部缺陷严重, 板底局部剥落	Dn7	板支座斜裂缝严重
	Dw8	Bw	Dz8	Bn	Dn8	板底剥落严重, 内部缺陷较严重
	Dw9	Bn	Dz9	Bnw	Dn9	板支座斜裂缝严重
	Dw10	Bn	Dz10	内部缺陷严重	Dn10	板底剥落严重, 内部缺陷较严重
	Dw11	A	Dz11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Dn11	A

表 7 西桥桥板安全性检测评定结果

桥名	外 跨		中 跨		内 跨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板号	坏损状况
西桥	Xw1	Bw	Xz1	A	Xn1	A
	Xw2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Bz2	内部缺陷严重	Xn2	板底剥落严重
	Xw3	Bnw	Xz3	Bn	Xn3	板底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Xw4	内部缺陷严重, 板底局部剥落	Xz4	Bn	Xn4	内部缺陷严重
	Xw5	A	Xz5	Bn	Xn5	板底局部裂缝, 内部缺陷严重
	Xw6	A	Xz6	A	Xn6	A
	Xw7	A	Xz7	Bn	Xn7	板底剥落、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Xw8	A	Xz8	Bnw	Xn8	Bnw
	Xw9	板底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Xz9	Bw	Xn9	内部缺陷严重, 板底剥落
	Xw10	Bw	Xz10	板底裂缝严重 内部缺陷严重	Xn10	Bnw
	Xw11	A	Xz11	Bw	Xn11	A



图十一 加固后的池桥（桥洞下增设了钢托梁）

存在局部缺陷或整体质量差的构件，承载安全性和耐久性显然不如材质基本完好的桥板。属于已不适于继续长期承载的构件。

检测表明，三座池桥的 99 块石桥板中 24 块属于危险构件，34 块属于不适于继续长期承载的构件，应进行结构加固和缺陷修缮。其余 41 块石桥板承载状况正常，可安全使用。

四、加固与保护方案

为保护文物原状，按最小干预原则对石桥板进行加固。结构安全性加固方法简述如下：

1. 在被加固桥板下增设两根型钢托梁。托梁两端支撑在桥墩钢牛腿上。托梁应能承受全部桥板荷载。

2. 钢牛腿用型钢制作，用植墙钢螺栓紧固在桥墩侧面岩石上层砌缝处。钢牛腿应能保证传递钢梁支座的荷载至桥基，并具有足够的刚度。

3. 在钢梁与桥板之间，在梁三分点处插入两个起重千斤顶，顶升千斤顶，准确卸载 50% 的石桥板自重至钢托梁。

4. 用预制混凝土块和高强干硬性混凝土间隔填充、顶紧钢梁与桥板底的间隙。混凝土支顶部位在桥板净跨的四分点处，

可根据板底实际损伤情况加密。

5. 混凝土达到强度后，拆除千斤顶。

6. 全部钢件应做强化耐锈蚀处理。

石桥板裂缝修补方法：

宽度大于 0.2mm 的裂缝，静压灌注优质树脂胶。

宽度小于 0.2mm 的裂缝，树脂胶泥嵌缝。

板底平整的裂缝部位，可间隔粘贴碳纤维布拉接。

桥面施工时，树脂胶不应污染石材。

通过对桥板进行钢梁托换加固，可显著减小原桥板底部的拉应力，减小裂缝受力扩张的趋势。有助于板底的抗裂，抗风化。图十一示池桥加固后的现状。各桥使用状况良好。

结 论

北京现存大量的古石平桥，这些石平桥是历史留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本文通过对国子监辟雍池桥的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一套古石平桥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的方法，得到了文物部门认可，为以后古石平桥的安全性检测评估和加固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13 年三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7月2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等专家对大运河“申遗”现场考察评估进行预演检查。检查组认为西城区、东城区总体情况良好，通惠河通州段环境状况仍无法满足大运河“申遗”的要求，下游河道驳岸仍未完成整修工作，并对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地区两岸正在进行的施工工程提出了整改意见。

7月3日 舒小峰局长主持会议，与圆明园管理处协商部署今后一段时期圆明园的保护展示工作：一是进一步抓好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考古调查发掘等基础工作；二是继续推进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等保护抢险工作；三是加大研究力度，充分运用三维数字等新科技手段，加强圆明园历史文化内涵的展示工作；四是在各项基础工作扎实的前提下，按照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稳步推进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

市文物局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印发《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开展文物安全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切实做好文物安全工作。

7月6日 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地区辽代矿冶遗址调查与研究”立项。

7月9日 市文物局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应急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汛工作预案，全面排查和整改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加强汛期值班和巡查工作，按时上报防汛工作情况，确保安全度汛。

7月10日 通州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崔志成主持召开大运河通州段环境整治工作会议，王丹江副局长参加会议。会议针对专家现场考察评估预演中提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逐项落实责任单位和时限，确保月底前全部完成通州通惠河“申遗”段的环境整治及水治理工作。

7月11日 市文物局邀请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以“佛像及佛像艺术”为主题，对全市文物拍卖企业及文物商店等文物经营单位的专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7月12日 启动并开展2013年上半年

年行政许可工作案卷评查工作。

7月22日—23日 组织召开2014年度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会议，集中审议、表决申报书稿2项。

7月23日—26日 市文物局分两批在大觉寺培训中心开展机关公务员及局属单位党政领导一把手参加的法制培训。

7月24日 市文物局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局领导、机关全体党员和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共106人参加会议。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就全局系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了动员部署。市委第二十五督导组组长孙向东在充分肯定我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前期准备工作的同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前，参会人员就局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进行民主评议。

7月25日 舒小峰局长带队到大运河北京段通州遗产区检查指导环境整治工作，对通州区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申遗”工作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对通州区开展遗产区环境整治工作的力度和成果表示满意。

市文物局到清华大学现场调研，听取清华大学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中有关问题的汇报，对文物建控调整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对清华大学提出的重点推进项目，如静心斋加固、生物学馆修缮等重点工程提出了修改建议，为方案编制创造了条件。

召开首都博物馆承担的市科委课题“馆藏文物温湿度环境控制关键技术研究”验收会。

7月26日 舒小峰局长带队到大兴区调研文物保护工作，现场查看了德寿寺遗址挖掘、大渠村汉墓考古以及团河行宫文物修复工程的进展情况，听取了大兴区政府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具体汇报。舒局长对大兴区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市文物局将积极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对涉及“城南行动计划”和“第二机场航站楼建设的各项文物保

护工作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7月30日 市文物局与海淀区政府联合召开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工作现场考察评估会。与会专家和学者现场考察后充分肯定了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工作的成果，遗址原貌得到保护且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也存在一些技术细节和管理层面的不足，应按专家的指导意见完成整治工程后续收尾工作。

7月份 依法按程序准予铁道兵纪念馆注册登记。

组织局属单位保卫人员共90余人次，历时5天，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无理滞留的租户进行了清退，并拆除了相关违章建筑。

组织4家在京科研单位参与申报第五批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7月31日—8月1日 召开2013年学术委员会，集中审议、表决了申报2014年度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的书稿。

8月1日 召开军转干部座谈会，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巡视员巴爱民参加座谈。军转干部围绕角色转变、岗位转换进行了交流发言，畅谈文博工作感想体会，并就信息化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提出了建议。舒局长对军转干部提出希望和要求。

8月2日 舒小峰局长前往国家文物局，向励小捷局长汇报专家和媒体反映的圆明园西部整治工程中的问题及现场考察评估会的情况。励局长肯定了圆明园西部整治工程取得的成果，并同时要求圆明园文物管理部门对于在整治工程中存在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尽快按专家的意见进行整改，抓紧编制圆明园考古工作规划，进一步做好圆明园遗址保护工作。

8月3日 市文物局前往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现场查看险情，布置抢险工作，要求管理使用单位委托专业安全检测单位进行安全评估，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险情，疏导人员，同时要求区县文物部门配合做好抢险加固工作，明确责任，

确保文物开放区域的人员和文物安全。

8月7日 市文物局与市文物研究所到圆明园管理处调研,就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规划的编制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市文物研究所将抽调业务骨干成立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小组,配合编制圆明园考古工作规划,在大力推进圆明园考古工作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圆明园整治工作的成果,加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并深入挖掘圆明园的文化内涵,通过科学规划将遗址保护与展示、教育等功能有机结合。

8月9日 市文物局组织召开大运河保护“申遗”工作会,学习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局大运河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会的精神。王丹江副局长表示,各单位为迎接大运河现场考察评估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再接再厉,抓紧做好整治的后续工作,特别是接待工作、管理机构、讲解资料、保护措施等方面要更加注意细节,圆满完成九月份国际专家来京考察大运河“申遗”任务。

8月12日 市政府组织召开大运河、中轴线保护“申遗”工作会,杨晓超副市长出席、侯玉兰副秘书长主持会议。杨晓超副市长指出,大运河保护“申遗”是当务之急,现场评估考察环节非常关键,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和市政府的部署做好落实工作。中轴线保护“申遗”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要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将中轴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8月14日—15日 市文物局举办领导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班,局系统近100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关内容。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若妮同志主持学习班。

8月16日 舒小峰局长带队,联合市消防局检查拈花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单位的安全工作,督促隐患整改。目前,拈花寺产权单位市佛协与使用单位人民大学达成一致意见,力争年底前完成文物保护单位腾退工作。

8月19日 审议通过2014年度局科研成果出版项目名单,《北京市大葆台汉墓发掘暨博物馆建设亲历者口述史访谈录》等7部书稿获得出版资助。

为协助武警北京总队二师十四支队营房翻建工程顺利实施,落实国家文物局对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示要求,北京市文物局现场办公,在充分听取支队领导对支队现状情况的介绍后,针对国家文物局批复要求,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8月29日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陆琼副司长复查大运河“申遗”准备情况,重点检查了7月2日预演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陆琼副司长对整改情况和“申遗”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并现场研究了接待细节,确定了详细的考察行程。

组织召开北京市文物拍卖企业座谈会,探讨上海自由贸易区相关法规草案中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允许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等事宜。

8月份 为全面推进局属单位安全保卫工作,采取结对帮扶、共同进步的方法,协调组织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与团城演武厅、大觉寺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与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开展交流学习及对检互查工作,实现“一帮一、一对红”的工作目标。

为落实市政府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完成《关于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中文物保护的指导意见》、《关于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进一步简化文物审批工作的意见》两个意见的编制工作。

启动并开展局系统经济类合同大检查工作。

9月9日 市文物局与市司法局座谈,研究今后一段时间法制宣传工作计划,确定共同制作普法宣传挂图。

9月12日 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使用单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单位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深入开展安全大检查，切实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中秋节、国庆节安全。

9月22日 组织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征求意见环节工作推进会暨理论学习报告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国民同志主持会议。局领导班子成员、局属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局机关全体党员100余人参加会议。

9月23日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安康杯”安全保卫工作“应知应会”知识技能竞赛，局系统各单位17个代表队、90余人参加。竞赛分知识竞答和技能比赛两部分，取得了满意效果。

9月23日—27日 为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征求意见工作，了解和掌握区县文委在文物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局领导班子成员分为10个组，到各自联系区县召开恳谈会，征求各区县对局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和局机关相关处室的意见建议，并将意见汇总上报局党组。

9月24日 白塔寺管理处与中国佛协签订交接协议，至此中国佛协正式接管白塔寺西路区域。

9月25日—26日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工作，市文物局分别召开局机关和局属单位中青年干部座谈会，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参加座谈。

9月27日 市文物局组织召开局系统国庆假期安全维稳工作动员部署会，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保卫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有关国庆假期安全接待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假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精神，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就国庆期间局系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部署。

9月29日 市文物局、市公安局在前期摸排线索的基础上联合行动，打掉了两

个盗窃田野文物团伙，抓捕犯罪嫌疑人9名、收赃人员2名，同时起获被盗文物25件及作案工具。经专家鉴定，起获的被盗文物中三级文物6件，其余为一般文物。

9月份 市文物局举办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活动，共成交标的16523件(套)，实现成交额9.45亿元人民币。

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开展《文物保护法》修订“文物流通管理”章节的课题调研工作，完成了报告初稿。

市文物局办理行政诉讼2件；受理行政复议申请1件。

市文物局继续推进北京市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组建了普查办公室、修改了实施方案、编制了经费预算、制定了宣传方案、开展了北京地区博物馆藏品管理数字化现状调查、制定了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调查工作方案，全市可移动文物普查电视电话会议筹备工作准备完毕。

三季度 市文物局共完成全市67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54923件(套)标的的依法审核工作，确定国家一级珍贵文物4件，撤拍文物标的52件，总成交额13.72亿元，同比下降25.79%。

完成2013年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馆”90%的招展招商工作。完成2013年“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85%的招展招商工作。完成2013写实画派九周年展的前期筹备工作。

完成2013年第二季度北京文物拍卖市场报告，继续开展2013年度文物拍卖数据录入工作。

共举办北京市文物局青年学术交流活动3次，市青年文博业务人员90余人次参加，先后参观了房山刘济墓考古发掘现场、神玉艺术馆，邀请杜永梅介绍了“大葆台汉墓发掘暨博物馆建设亲历者口述史”课题。

完成2013年第十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文博赛区的组织及评选工作，首都博物馆“北京民俗街景”等作品获奖。

2013年第三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346547	0	346547	44768	50808
大觉寺管理处	49848	30030	19818	2077	3678
正阳门管理处	139864	136702	3162	353	531
徐悲鸿纪念馆	0	0	0	0	0
北京文博交流馆	2801	1407	1394	143	147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16639	0	16639	4742	5071
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10437	0	6366	2471	1600
北京艺术博物馆	8690	4995	3695	1342	990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0	0	0	0	0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0	0	0	0	0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0	0	0	0	0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11374	2233	9141	4455	3466
白塔寺管理处	0	0	0	0	0
老舍纪念馆	13133	0	13133	4239	3302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	8328	5993	2335	335	2000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3457	1116	2341	369	677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261280	225267	36013	43431	14221

注：部分博物馆闭馆，故参观人数为0。

启 事

各位读者、作者：

自2013年5月1日起，我编辑部已开始启用新的投稿邮箱：
bjwb1995@126.com，原有雅虎邮箱停止使用。

《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文丛》2013年总目录

● 文物工作

- 迎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战略转型
..... 单霁翔 (2013.1)
- 对加快首都文博工作创新发展的几点认识
..... 孔繁峙 (2013.1)
- 浅谈古建筑的消防安全..... 赵彦升 (2013.1)
- 北京市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工作探索与实践
..... 刘保山 李响 (2013.2)
- 浅谈适时加强文物鉴定机构准入管理
..... 王彤 (2013.2)
- 高山景行 京都守护神——悼念侯仁之老先生
..... 北京市文物局 (2013.3)
- 创意时代的博物馆文化创意... 于平 (2013.3)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战略思考
..... 刘保山 (2013.4)

● 博物馆学

- 博物馆：文化记忆的家园..... 齐密云 (2013.1)
- 临时展览在创新型博物馆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为例
..... 解小敏 (2013.1)
- 浅析表演艺术题材展览的策划与运作
..... 常硕 (2013.1)
- 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立意与展陈亮点
..... 穆红丽 (2013.1)
- 试论博物馆国际性临时展览的跨文化沟通
..... 薄海昆 (2013.2)
- 中国国家博物馆电化教育工作回顾
..... 王京 (2013.2)
- 六十年薪火相传 见证复兴之路——首都博物馆与祖国共成长..... 魏宇澄 (2013.2)

- 民族文物登录标准的思考与探索
..... 周婷婷 (2013.2)
- 蜡像艺术展示的思考与实践
——以国家博物馆“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蜡像艺术展”为例..... 蒋潇 杨燕 (2013.2)
- 博物馆策展人制度研究..... 赵梅 (2013.2)
- 利用古建筑展厅举办展览的一点思考
——以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基本陈列为例
..... 焦晋林 (2013.3)
- 谈藏品原始信息的收集——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国礼为例..... 王鹏远 (2013.3)
- 建设高效率的博物馆理事会
..... 宋向光 (2013.4)
- 论当今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的困境与机遇
..... 黄雪寅 (2013.4)
- 收藏身边的历史 留存城市的记忆
——谈首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资源的调查与征集..... 章文永 (2013.4)

● 考古简报

- 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村唐代窑址、清代房址
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3.2)
-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明清墓葬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3.2)
- 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北齐、唐、明、清墓葬
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3.3)
-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旧村明清墓葬
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3.4)

● 文物研究

- 京津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燕系铁器及冶铁遗存

总目录

- 郭京宁 (2013.1)
北京地区仿木构墓葬初论..... 于璞 (2013.1)
碧云寺塔外壁的石雕内容辨析
..... 邢鹏 (2013.1)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马面裙分析
..... 胡桂梅 (2013.1)
民国时期的“画中九友”..... 倪葭 (2013.1)
元代大都路造四体铭文铜权及相关问题研究
..... 于力凡 (2013.2)
唐故蓟州司仓参军李洪墓志考
..... 张云燕 (2013.3)
金《武德将军幢记》相关问题再辨
..... 王玉亭 (2013.3)
白塔寺诸天造像名称考辨..... 孙涛 (2013.3)
明朝川扇进贡宫廷珍品
..... 刘精义 刘燕平 (2013.3)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唐云麾将军李
思训碑”拓本浅识..... 韩建识 (2013.3)
首都博物馆藏《西陂六景诗卷》文物名称辨析
..... 李文琪 (2013.3)
明代服饰文献举要..... 谢大勇 (2013.4)
雍正二年“敕谕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匾额小
考..... 庾华 (2013.4)
- 北京史地
- 北京初为王都——燕昭王以蓟为燕上都
..... 陈平 (2013.1)
辽代燕京地区的手工业..... 章永俊 (2013.1)
北京故宫西连房遗址再认识
..... 王世仁 (2013.1)
民国财政部印刷局旧址工业遗产调查
..... 刘文丰 (2013.1)
民国末年法海寺的古树被盗案
..... 苗天娥 (2013.1)
箕子朝鲜与周代燕冀..... 葛英会 (2013.2)
金中都再认识..... 王世仁 (2013.2)
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在北京的十余次迁居及其
学术生涯..... 刘仲华 (2013.2)
雪泥鸿爪 恢弘将作——读《当代中国建筑史
家十书》之《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
..... 宋大川 (2013.2)

- 慧思与静琬“师徒”关系考辨
..... 张爱民 尤李 (2013.3)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读后
..... 于德源 (2013.3)
前公用胡同15号调查记——兼谈四合院调查
和分析方法..... 李卫伟 (2013.3)
清末各省捐资修正阳门之始末
..... 贾若钜 (2013.3)
天津街至景山前街沿路古建拆除纪实
..... 孔庆普 (2013.3)
探索建筑文化的力作——《王世仁中国建筑史
论选集》读后..... 晋宏逵 (2013.3)
从雪山三期陶器看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
化的异同..... 韩嘉谷 (2013.4)
北京地区唐代窑址初探..... 张智勇 (2013.4)
元代抱玉里文靖书院..... 杨亦武 (2013.4)
明清时期通州城垣修建考..... 李伟敏 (2013.4)
论正阳门禁灵枢通过之規制... 李晴 (2013.4)

● 文物保护

- 故宫藏“贴落画”修复纪实
..... 周海宽 (2013.1)
首都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简介
..... 何海平 (2013.3)
国子监辟雍池桥安全性检测评估与加固
..... 姜玲 (2013.4)

●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2012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尹君 (2013.1)
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尹君 (2013.2)
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尹君 (2013.3)
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尹君 (2013.4)